

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

通讯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2 期）

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秘书处编

2024 年 2 月 28 日

目 录

一、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新著提要.....	1
二、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论文提要.....	44
三、史学理论与史学史重要会议.....	135
四、史学理论与史学史重要讲座.....	156
五、史学理论与史学史重要项目.....	164
六、逝世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领域学者.....	168

编者按：本通讯为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的内部交流刊物。该期刊发 2023 年度国内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最新著作、论文、会议、讲座及项目等情况，并纪念 2023 年逝世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领域的著名学者，供学界同仁参考指正。

一、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新著提要

一、国内著述

(一) 通论性著述

乔治忠：《中国史学的考析与评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 年。

内容简介：本集收录论文、访谈计 32 篇，主要选取关乎中国史学史研究有所发现、有所创新的学术论文，重点收录对史书、史家、史学事项否定旧说、建立新见解的批判性之作。作者明确树立中国传统史学中具有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两大组成部分的理念，对中外史学的异同进行系统比较，对中国史学界的一些似有定论的认识提出自己的看法。

乔治忠：《史学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中华书局，2023 年。

内容简介：本书汇集作者对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部分论述，分为四章，即“史学理论探析”、“史家史书考析”、“史学专题考考论”、“中外史学比较”。各篇文章在把握史学史总体脉络的基础上，能够提出创见，成一家之言，考证扎实周密，富于理论思维。第一章深入考查了中国史学的起源问题，又阐述了中国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学术体系。第二章考订《世本》、《越绝书》的成书问题。第三章，主要指出中国传统史学具有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两条相互联系的发展轨道，其间互动、互补也互有排抑，这是古代中国史学得以异常繁荣的主要原因之一。第四章通过中西、中日史学的比较研究，认为并历史学的内在矛盾是记史求真与治史致用的矛盾，焦点在于孰为第一宗旨。日本、朝鲜半岛的史学得自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中国众岛之国之所以很早形成统一政权和出现天皇“万世一系”的局面，皆由于早期接受和改造了中国传统史学理念和纲常伦理思想的结果。

王德昭：《史学研究法讲义》，香港商务印书馆，2023年。

内容简介：本书是王德昭教授旧时讲义，重新整理成书。内容包括史学与史学方法、史料的搜集，史料的本身鉴定、史料的内容鉴定、史事的综合、史事的表达几部分。填补王德昭教授学术思想出版的一处空白，并得以将王德昭教授的宏富学识和精辟见解尽量充分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汪高鑫：《中国史学思想史十五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中国史学思想史十五讲》即是作者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中国史学思想史的最新成果。本书采取历时性的纵向讲述和专题式的横向讲述相结合的方式，在梳理中国史学思想发展脉络的同时，对中国史学思想的重要论题进行深入探讨，点面结合，系统反映了中国史学思想史的基本内容。全书选取十五个重大论题，依次为“五经”的历史观与史学观、先秦诸子与私家史著的历史观、易学视野下的汉代史学思想、“究天人之际”：传统史学的整体思维、“通古今之变”：传统史学的通变思维、“成一家之言”：传统史学的创新思维、求真与求道：传统史学的二重性思维、史鉴与资政：传统史学的经世致用理念、传统历史编纂学的理论与实践、“才学识德”：传统史学的史家修养论、“六经皆史”：明清史学的经史关系论、晚清经世致用史学思潮、20世纪的“新史学”思潮、近代新历史考据学的理论与方法和民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等。论题大体按照史学发展脉络标列，具体论述则不拘泥于时间界限，这样既反映了从远古到民国时期中国史学思想发展的基本内容，又深入探讨了中国史学思想的具体内涵和民族特性，是中国史学史和史学思想史研究的又一力作。

汪高鑫：《中国史学思想史教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中国史学思想史在学科属性上属于中国史学史的分支学科，它以中国史学思想自身的发展以及影响其发展的诸要素为研究对象。本书对先秦至民国中国史学思想发展史进行了系统探究，对其发展规律与阶段性特点作出了揭示：先秦传说时代的原始历史意识、甲骨文明确的时间和世系观念、“五经”丰富的历史思想、诸子百家的历史变易思想，萌生了最初的中国史学思想。秦汉史学思想的发展形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与宣扬大一统的主潮，以及既讲直书又重神意的二重性史学思想特征。魏晋南北朝史学思想重视历史兴亡论，强化

民族认同意识，在玄学和佛教影响下出现玄化与佛化倾向。唐代史学思想出现了“以隋为鉴”思潮，重视史学总结与批评，强调史学“经邦致用”。宋元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史资政思想的彰显、天理史观的流行以及会通思想的出现诸方面。明与清前中期史学思想有对经世致用、历史考证和史学理论的总结，有对“六经皆史”、史家主体修养和学术思潮的反思。近代以来史学思想的发展依次出现了新式经世致用思潮、资产阶级“新史学”思潮、新历史考据学思潮，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从而将中国史学思想的发展领向了新时代。

胡逢祥、王传编著：《历史文献学方法运用训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本教材内容以集中讨论历史文献学的方法运用为主，旨在引导历史专业的本科高年级和硕士研究生尽快了解并学会搜集、阅读理解和运用历史文献的基本方法。目前尚未见此类教材。全书近20万字，比较以往出版的文献学教材，其内容主要突出了以下几点：1. 除扼要简述原有文献学基本知识外，将着重系统说明近20年来历史文献的新发现、重要史料集，以及文献收集和利用的新趋势。2. 所述历史文献除古文献外，还根据近年历史研究发展的趋势，较多涉及中国近现代史文献、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资料、口述史料和新发掘出版的档案资料及其处理方法等。3. 从注重培养学生专业技能和实际工作能力出发，在教学中加大注入实践训练的比重，以边教边学边练习的方法推进这一目标的实现。

葛兆光：《声回响转：讲稿八篇》，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本书收录了葛兆光教授八篇完整清晰的历史学讲稿。全书贯穿着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开阔视野和客观态度，具体可划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一篇，讲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的设想；第二部分是三篇，谈关于中国、文化与学术的一些宏观看法；第三部分的两篇，是对于儒家学说和禅宗历史的具体介绍；最后第四部分的两篇，则是借用图像来观察历史的试验。

李红岩：《阐释生成与历史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本书稿立足于建构当代中国历史阐释学的视角，作者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内容集中于历史学与阐释学，采用跨界方法，追求古今中西的融通。全书共分为十二章内容，主要探讨了“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阐释·诠释·解释·说明、Hermeneutik的汉语译名、从语言起源到文本出现、阐释、“绝地

天通”与人类传话活动的肇始、中国古典阐释学的语文学形式、关于“读书必先识字”、历史学的原生形态与质文递变等内容。

李红岩：《史学的光与影》，甘肃文化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本书为“雅学堂丛书”之一，是一部学术随笔集，其中收录作者多年来以“史学”为核心的随笔短文二十余篇，如《历史需要怎样的“理性”》《严复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史学四十年：样态、潜流、走向》《说一说胡秋原先生》等，不仅对一些历史理论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也对一些未被广泛重视的史家及其史学思想等做了深入考察，观点鲜明、文笔畅达，“史”“论”兼具，呈现了作者在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领域的独到见解和学术贡献。

杨奎松：《如何认识历史人物的“历史问题”？》，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23年。

内容简介：本书为著名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专家杨奎松教授关于知识分子、特别是历史学者如何评价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的文章合集。全书共收录四篇文章。第一篇为代前言，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引出对特殊年代漠视人权现象的反思，进而引出全书主题。第二篇《历史研究中的人性取向问题》是全书的中心论点，提出看待历史人物和历史问题的根本标准应为“人性”，历史学本质上是一种“人学”，其任务是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特有的人文关怀和现实关怀，历史学家尤其应该“讲人性、重人道、倡人权”。第三篇《爱“国”还是爱“人”》是一个具体事例，通过论述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共同选择难题，提出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以人为本的，即始终坚持人性的标准，而不为民族主义的悲情或亢奋所左右。第四篇《如何认识历史人物的“历史问题”》是另一个具体事例，以美国2017年的“夏洛茨维尔事件”为例，指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渐进的，历史人物无法脱离其所在的历史时空，我们既要认识到历史人物的局限性，也要看到其积极的历史作用，绝对不能因其时代的局限性而用现代社会的价值尺度去完全否定他们。

杨天宏：《心通意会：历史研究中的虚证》，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史无定法”，本书作者整理了自己多年来有关史学理论的研究，在认同“实证”价值的前提下，总结了许多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本书涉及的领域与研究范围较宽，将不同知识领域的文章编排在同一本书中，可以引起更多

读者的兴趣。

郭长刚等著：《中国特色历史学话语体系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包括中国历史学的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叙事体系。话语体系的建构首先对上述三个体系中的西方中心论因素进行讨论、反思，然后围绕国家制度、国家与社会、民族国家与民族关系、经济制度、中国与世界等议题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建构，以期突破并超越西方话语下关于东方专制主义、威权政治、经济社会长期停滞等历史叙事体系。本书还将反思西方话语中有关民族国家与民族关系的理论建构，力图建构和合共生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史观，并以“文明新形态”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对传统的朝贡体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行理论梳理和建构。针对不断扩展的历史学研究领域，本书将以上海史为切入点，致力于形成有关城市史研究的话语体系。

徐志民、李政君主编：《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本书重点选取新时代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主要成果，分为历史理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中国边疆学、世界史这六编，既回顾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历程和成就，也总结其经验和方法，更思考其前路和方向。

夏春涛主编：《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前沿丛书》（全五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该丛书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所文集，是从该所期刊《史学理论研究》中选取重要文章结集而成，共为五卷，分别为《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史家》《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历史理论研究的新问题·新趋向》。该文集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在发掘总结中国史学传统中的理论遗产，介绍和总结中国国外史学理论发展经验和当代趋势，促进中国国内外史学理论交流，培植史学理论人才，促进符合中国情况的史学理论体系建设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沈桂龙、周武：《世界中国学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本书较为全面、系统、深入地论述世界中国学缘起与发展、内涵与外延、理论与方法、现状与前景，分综论篇、区域/国别篇、主题篇、学派篇、

大师篇和互鉴篇等 6 个部分，共 33 章，每章即为一篇小论文，针对某个具体的主题进行阐释。本书内容丰富，对于世界中国学研究的既有宏观的叙述，如世界中国学的发展演变历程、现状和前景分析；也有微观的讨论，如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学研究、不同主题的研究情况，以及对不同学派和人物的具体研究。

沈桂龙、张焮等：《“一带一路”视野下的中国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 年。

内容简介：“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迄今已有十年。十年间，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革，各国关于中国的研究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本书致力于在“一带一路”视野下，重新阐释中国学的历史、现在与未来，探索构建新时代的“世界中国学”理论框架。基本思路是以古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的发展变迁为线索，将中国学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古丝绸之路与传统汉学、近代丝绸之路与现代中国学、“一带一路”与世界中国学三个阶段，以此来重新叙述中国学的历史进程，把握中国学的当代发展，研判中国学的未来趋势，最终探索形成一种不同于传统汉学和现代中国学的、面向未来的世界中国学，以期实现中国学立足中国道路、胸怀世界发展和关照人类未来之愿景。

周樾楷：《克丽欧的转世投胎：影视史学与大众史学》，台湾师大出版社，2023 年。

内容简介：本文集含影视史学、大众史学及历史文化评论三大单元。全书的主题在反思及超越学院派的专业史学，进而主张历史的意义在于历史意识、社会意识和生命意识的不断锤炼升扬。同时，本着有意摆脱文字中心论，探讨影像视觉和数位媒体对历史表述的影响。

杨祥银、陈鸿超主编：《多学科视域下的当代中国口述史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 年。

内容简介：作为一种以人类历史活动的主体——“活生生的人”为核心对象的研究方法与学科领域，口述史学由于其研究（实践）主体、研究对象、研究目标（用途）与传播（呈现）形式的多元性与丰富性，它在当代的发展呈现出日益明显的跨学科特征与趋势。正是如此，尤其是在进入 21 世纪以来，口述史学在中国的发展也引起众多相关学科的重视与关注。基于此，本书精选了近 20 年来已在国内公开发表的 41 篇与口述史学主题相关的学术论文，希望以此呈现当代

中国口述史学研究的多学科视角与趋势。

黄宗智：《实践社会科学的方法、理论与前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本书是黄宗智教授关于中国研究的主要理论与方法的总结，足以代表黄宗智教授 50 余年来学术研究的主要经验发现和基本理论概括。本书首先从“中国经验的悖论性”出发，进而探讨“选择与综合西方不同理论传统”的可能，并在此基础上“探寻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概括”，最终期望能够在中国研究中“融合中西方的学术”，为此，黄宗智教授做了“进一步的前瞻性探索”。总之，本书各编与各章之间层层推进、互为呼应，从中国乡村社会经济史和法律社会史研究的实际经验出发，检视中西方不同理论之间的价值与不足，进而提倡融合中西与二元合一的研究进路，倡导扎根于中国实际的社会科学研究。

马军主编：《〈史林〉杂志目录(1986—2010年)及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截至 2010 年，《史林》已刊发文论二三千篇，共计数千万字，它的轨迹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确切地说是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缩影。从手写时代到电脑时代，从人工查资到网上搜检，从囿于所内、国内学界到被海外学者广泛关注，完全可以用“换了天地”来加以形容。《史林》也是一部史学界的“百科全书”，就形式而言，有论文、文章、译文、札记、书评等等；就学科而言，无论是中国史还是世界史，无论古代史还是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各类专题均有深厚而广泛的涵盖，是专门研究不可绕开的宝库；就作者而言，除本市、国内外，还遍及英、法、美、德、港、澳、台等海外各地，可谓交相辉映，灿若星辰。作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正式出版的所办刊物，《史林》也是该所最重要的所史资料之一。在其他材料有所缺失，而档案又不宜公开的情况下，它对于重拾 1986 年以来的办所方针、学术旨趣、同人行述、出版信息、会务活动和海内外交往等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陈其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何以通向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本书认真贯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新飞跃”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时代主题，努

力探讨传统学术的精华通向唯物史观的内在逻辑和剖析典型性命题，展现中国智慧的光彩。本书探讨了如下三大主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贯通的内在逻辑；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和特性；为了大力弘扬传统文化所应具有的使命情怀。为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作者通过创造性阐释，系统深入而又亲切有味地论述了展现传统文化独特魅力的新视角、史学经典与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锻造、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变的内在动力。

杨共乐：《不尽的江河不断流：比较视野下的中华文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本书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与北京师范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合作推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丛书”的开端之作。该书立足人类文明的发展大势，通过对世界文明的分析比较，从世界文明视域理解中华文明的独特性，以新的视角阐发了中华文明突出连续性的时代意义。本书视野开阔、逻辑严密，经由大量一手史料的深入研读和对国内外既有研究的精准把握，对有关“文明”“文化”等概念的意涵、中西文明观的变易、世界各古文明的脉络特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特征及其成因等中外历史中的关键问题和难题，一一给出探索性解答，推进了对中国文明多角度的客观认识，切实解决了“从世界文明视域理解中华文明的独特性”这一核心问题，由此明确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位置。本书出版后，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广获各方好评，入选“新华荐书”第十九期推荐图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编：《历史理论研究再出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成立五周年学术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为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成立五周年，汇编了该所学人五年来在历史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特组织编辑此论文集。论文集分“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理论概念与史学理论研究”“历史思潮与学术争鸣”“史学传承发展与学术转型”“史学视域下的国家治理研究”五个部分，特精选本所同仁的代表性学术论文53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所同仁五年来的学术研究与学术转向。希望在此基础上再接再厉，积极关注重大历史

理论与现实问题，关注历史理论学术前沿与学科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理论“三大体系”，不断推动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的繁荣发展，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历史学的智慧与力量。

朱洪斌主编：《南开史学百年文存·专门史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本卷收入29篇论文，依论文内容分为四个专题：“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中国政治思想史”“历史文献学”和“科学技术史”。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史学史最初的旨趣都是以历史学科的产生、发展及其演变规律为主题，以史家和史著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后又进一步拓展至历史思想、史学思想、史学思潮、史学流派、史学建制、史学批评、中外史学交流、比较史学等诸多领域。本卷中的“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专题收入南开大学学者的11篇论文，大体上涵盖以上各个方面的专题研究。

朱绍侯：《朱绍侯史学评论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本书主要分为两大部分，分别为“朱绍侯先生的学术访谈录”和“朱绍侯先生史学评论集”。“朱绍侯先生的学术访谈录”收录了朱绍侯先生学术访谈的文章，详细记录了朱绍侯先生在治学方面的探讨、见解与态度。“朱绍侯先生史学评论集”收录了朱绍侯先生在史学研究方面、历史教材编写方面的经历、思想和经验。各篇长短不一，事理、行文皆称晓畅。阅读此书，既可从中了解朱绍侯先生在中国古代史领域的一些独到的学术主张，也可据以揣摩一些研治历史的经验。

（二）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著述

陈嘉礼：《谁是中国人？大禹传说与华夏民族的建构》，商务印书馆，2023年。

内容简介：神话传说的创造和对史实的理解，是古史学研究两种并存的趋势。古代社会留下了很多历史化的神话，成为后世神话化历史的基础，这是中国历史文化中对古史神秘化、神圣化的理解。本书基于此尝试运用多学科以重整大禹传说演变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华夏民族如何利用大禹传说的演变来变成民族的集体回忆从而建构和凝聚民族。文中广泛利用古籍、官方或民间的资料，并配合神话、传说、民间野史、四部资料、古文字学、非物质资料等，希望能为大禹研究提供全新的面貌，既可为中国上古史学有关帝王圣贤传说收补益之效，也能引导中国史学发展的新认识。

徐兴无：《早期经典的形成与文化自觉》，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本书为《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第二卷，专论先秦两汉时代早期经典形成的历史语境和形成条件。本书既注重从文明史的角度讨论中国“前轴心时代”和“轴心时代”的经典文化，又重视从经典文化的角度讨论早期中国经典的意义体系及其文化转变。从早期经典的发生，到诸子文献的形成，从先秦两汉经学文献体系的形成，到西漢末年讖纬的兴起，系统论述了经典的宇宙化、历史化和神秘化过程。

张永路：《不主于经：〈国语〉与经学史的演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本书以《国语》为切入点，通过对《国语》学史的梳理来呈现经学史的演变历程。作为一部经学序列中的边缘文献，《国语》是观察经学边界变动演化的浮标。因此，本书将《国语》置于经学史发展的宏大背景中，通过梳理《国语》在经学史演变过程中各个重要节点的不同境遇，特别是历代学者对《国语》不同的认知定位，寻找《国语》在经学史中的变动轨迹，并探求这种认知差异背后的经学史演变根源，以此确定历代经学的边界，进一步归结出经学史演变的内在机理，从而把握整个经学史的发展脉络。

曹强、凌朝栋、赵前明主编：《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2018年卷），商务印书馆，2023年。

内容简介：该研究年鉴包括“学术前沿、研究综述、考古发现与研究、版本整理与研究、著作简介与论文摘要、港台地区及海外研究、学术组织与专家、论文著作索引、研究动态、后记”等板块。整理本年关于司马迁、《史记》的研究综述；本年有关《史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史记》版本和校勘研究、词语考证与语法研究；重要研究著作与论文集简介、重要论文摘要；还涉及《史记》在港台地区及海外的研究；聚焦有关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某位专家及学术组织的论文和著作并展开研究；关注该领域的研究动态和学术前沿，是中国年鉴全文数据库全文收录年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赵生群：《史记导论》，中华书局，2023年。

内容简介：《史记》作为“二十四史”之首，奠定了中国史学的基本格局。在史学、文学等诸多方面，都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本书从《史记》的成书过程、内容、体例、取材、史料运用与价值、述史框架、书法、史学理论、编纂、《史记》纪传与传记文学等方面，探讨《史记》的创作方法和过程等。在熟稔《史记》的基础上，作者对相关史料进行了详细梳理与认真辨析，于前人旧说去粗存精，于己立新说详明其故，自成一家之言。本书为作者在《〈史记〉编纂学导论》（凤凰出版社2006年初版）的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本次再版，对正文进行了修订，增写了绪论，重新核校全书引文并完善出处，另相应添加了部分图片，以使本书臻于完善。

曹强、凌朝栋、赵前明主编：《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2019年卷），商务印书馆，2023年。

内容简介：本书在继续延续往年栏目框架的基础上，对2019年度关于司马迁与《史记》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爬梳和汇总，对当年包括司马迁研究、《史记》版本与校勘研究、《史记》相关考古研究、《史记》词语和语法研究等方向的新场域、新发现、新成果进行了全面的展现。其中比较重要的成果，当属对司马迁生年争议以公元前145年说作为阶段性定论，为这一项千年疑案、百年论争作出了拍板定案。本书是《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的第十六辑，排比成列，现当代学人对司马迁与《史记》的研究历程和脉络，便可一览了然。

张宗品：《〈史记〉的写本时代——公元十世纪前〈史记〉的传写与阅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史记》从成书到初次刊刻已历千年，从其初刻至今亦有千余年。从公元前一世纪问世到公元十世纪，《史记》的文本内容发生了极为关键的变化：两汉时期的删削与续补，晋唐之际注本的形成乃至唐代定型的三家注都大致出现在这一时段。本书关注的正是这一历史阶段《史记》的经典化问题。全书以《史记》的多种古写本为重要文献来源，将写本内部及写、刻本间的文本变化作为切入点，详细梳理了汉代以来《史记》的传写、阅读史。同时，本书还对《史记》日藏古写本及敦煌本进行了深入研究，并衍及日本《史记》学的变迁。本书持论严谨，资料详实，探研深入，心得独具，从书籍史、阅读史角度，为学界的《史记》研究提供新的着眼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韩昇：《从封建到大一统：〈史记〉中的历史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

内容简介：本书为韩昇教授在中读录制讲授“阅读《史记》”课程的文字整理版。作者多年研读《史记》，有颇多心得，此次通过讲授，作者系统整理了自己对《史记》的认识。今天重读《史记》决不能完全按照原著来读，而必须读懂司马迁的历史哲学，看清楚哪些是历史的建构，还要看穿这些建构的人文理念、各个历史时代的思想意识，乃至通过历史建构树立起来的文化传统的导向和目的，洞彻思想的来龙去脉和文化遗产的历史依据，才能去伪存真，提取适应现代社会的文化要素，重建当代中国的文化。一言蔽之，必须通过理性的批判重读《史记》，而不能照本宣科，这样才能读活《史记》。

王保顶：《前四史解读》，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被称为“二十四史”的纪传体史书最为重要，号称“正史”，而其中的前四部《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最受后人推崇，被称为“前四史”。“前四史”是纪传体史书的卓越代表，也是史学家研究先秦、两汉至三国时期历史的重要史料依据。本书就是对“前四史”的解读，主要内容包括作者介绍、成书过程、体例特点、内容特征、注释评价、文献价值、流传过程等，为准确、全面研究前四史提供了帮助。

谢贵安：《中国实录史学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本书是作者近些年关于宋、明、清等历朝实录的思考和研究。以宋、明、清等历朝实录为研究对象和基本史料，对这些历朝实录进行了由点及面

的深入研究。在观照民国以来学者关于实录研究的学术路径基础之上，一方面，研究实录本身的编纂及体例，对实录的作者群体、文本形式等进行剖析；另一方面，对实录所见政治视阈、边疆视野和外交记录等作了探讨。此外，还深入考察了作为史料的实录对历史书写的改写，以及对明、清实录和中、越实录进行了历时和共时的比较研究。

王嘉川：《〈史通〉学术史》，济南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史通》是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幾撰写的中国古代唯一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从整个世界范围来说，它既是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因而它的问世，就是在世界史学的发展历程中，也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本书从思想史的角度，简要考察这部著作自产生以来，对中国史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不同历史时期对它的研究情况及其发展脉络，力求写出一部动态演进和螺旋式发展的元典阐释史，梳理其学术发展的线索。

苗润博：《文献清源与史学问径》，中华书局，2023年。

内容简介：文献的正本清源与史学的开拓创新，有着天然的血脉关联。每一文献系统、不同文本层次的源流脉络都可能牵涉到历史叙述的复杂衍变，揭示出多元丰富的历史图景；文献学所蕴含的贯通视野与纵深思维，也是史学研究跨越断代藩篱、实现整体关照的重要依凭。本书作者精研宋元史籍与四库文献，从历史文献学入手，立足实证，力求新知。此次收录近作24篇，以扎实的个案研究和宏通的阐释解读，一以贯之地探究由文献入史学的路径与方法，摸索历史研究的新范式。本书亦可看作一部青年学者的养成史，《自序》以及本书后五篇（《〈辽史补注〉与史注传统》至《〈辽史探源〉题外话》），从作者的亲身实践，就“由文献入史学”的方法做了系统阐述，对于历史学、文献学等领域的研习入门，定多启发与共鸣。

程源源：《吕祖谦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吕祖谦是南宋著名史学家、理学家和教育家，他一生著述颇丰，在历史编纂学、历史文献学、历史教育和史学思想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这些成就使得他在南宋乾淳之际的学术争鸣，以及浙东学术特色的形成中占有重要地位。以往对于吕祖谦的研究，多从其学术特色方面来谈，对于他的史学成就、史学思想等方面关注不够全面，缺乏系统和深入的论述。有鉴于此，本书对吕祖谦

史学进行了系统阐述，揭示其史学特色与价值，以期深化对吕祖谦以及南宋史学的认识。

贾慧如：《元代类书研究》，人民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元代类书上承唐、宋，下递明、清，是元人应时代、社会和文化需要，对当时和前代文献的文本整理和文化总结，呈现开放性和交融性等特征，在中国类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书详细考察了元代类书发展的社会背景和学术因缘、总体风貌与基本类型、编排体例和类目体系、编纂与流传等问题，深入分析了元代类书的史学价值、文献学价值，系统总结了元代类书的特点，科学评价了元代类书的学术地位、文化内涵以及对后世类书编纂的影响，为读者进一步研究元代学术与文化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地。

卜大有辑，吴漫、裴阳月校注：《史学要义校注》，商务印书馆，2023年。

内容简介：《史学要义》四卷，补卷一卷，凡五卷，明代卜大有辑，徐棡作叙。有万历五年（1577）刻本，至今已有四百多年，后世未曾重刊。本书辑录了明代及其以前史学名家讨论史学的作品。其辑录篇章，文体涉及疏、表、事状、书、论文、序、跋、传记等，内容集中于历代史官、史官制度、作史义例、史馆修史、史法、正史、杂史等诸多方面。梳理了上起西汉、下迄明代的史学发展历程，有“得其要义，则会通有机”之旨趣，可与刘知几的《史通》互为参阅，是中国古代史学史、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文献。

琚小飞：《溯源汇津——四库文献研究》，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全书20万余字，凡分五章，内容主要围绕四库学新视角与新材料展开，具体包括四库馆阁之肇建、存藏与修缮，库书的誊抄、撤改及补函，四库馆书籍编纂流程，《四库全书考证》专题研究，四库底本研究，《总目》稿抄本专题研究与考辨等诸多方面，均立足学术前沿，考据信而有征，是一部经过作者熟思审处的四库学研究著作。

霍艳芳：《明代图书官修史》，中华书局，2023年。

内容简介：本书探讨明代官修图书的组织机构、预修人员、成就及代表性成果的成书经过，总结明代官修图书的特点，揭示其在中国图书编撰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有明一代，图书出版进入高速发展时期，私刻坊刻备受关注，本书聚焦官

修图书，是对相关研究的有益补充。

杜维运：《清代史学与史家》，九州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基于民主立场，部分学者对中国古代史学、特别是清代史学持否定态度；实际上，清代史学成就远超明代，并与世界史学交相辉映。杜维运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万斯同、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王鸣盛、钱大昕、赵翼十位清代史学家为例分述清代史学，首揭清代史学的重要性及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意义。本书有意将清代史学放在中西史学比较的脉络来理解，强调清代史学具有证实的精神、科学的方法，以及寓解释于叙事的特点；同时，清代史学家在个人气质、研究方法方面，也与当时西方史家最为吻合。

周毅：《从教化到认同：明清安庆方志中的历史书写》，人民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本选题首先对明清时期安庆地区的方志编纂情况进行全面整体梳理、总结，并以之为资料基础，使用“历史书写”的研究路径及具体方法，将方志视为理学教化笼罩下被书写、建构形成的文本，通过对明清安庆方志中的理学传、列女传、孝友传、忠义传（忠节传）、隐逸传等人物传记的文本进行解读，总结出明清理学教化思想渗入方志文本书写的几个具体途径：首先是对入志人物的选择，对应不同时代相应的理学价值观念选择不同人物；其次是对入志人物按照理学教化的标准，进行模式化的人物书写，塑造出符合理学教化标准的人物形象；再次是对前志已经出现的人物按照时代的要求重新进行书写，以体现不同时代理学价值观念；最后是采取突出理学伦理道德标准的“去政治化”的历史书写方法。而这些理学教化影响下的书写手法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理学教化，方志书写对于理学教化的认同和推崇，也构成了明清时期安庆地区开展理学教化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本选题还探讨了明清方志书写中国家意志和地方意识如何博弈互动，尤其是清初至清中期国家意志如何在方志书写中逐渐掌控话语权力，将方志变为官方推行理学教化观念工具的过程。

彭孝军：《清代官修礼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本书为一部研究清代官修礼书的专著，一方面对其修纂背景与主旨、修纂经过、编排体例、内容特色自己对后世官修礼制典籍书写的影响作一考察，另一方面对清代官修礼书的宫廷与社会实践情况做了深入研究，从而指出了

官修礼书再构建社会和文化大一统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尤学工：《史权与秩序：清初史家群体的明史书写》，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本书以清初史家群体为对象，以史学史结合社会史、文化史，探讨巨变时代的史权博弈、史家对史学和文化秩序的追求，思考史家与史学的安身立命之本。依据史家的政治立场与文化立场，本书将清初史家群体分为遗民史家、仕清史家和贰臣史家三种基本类型，探讨了他们在兴亡、忠义、正统、君臣等明史书写主题上的异同，分析了遗民史家修史经世而续命、仕清史家修史表忠求名山、贰臣史家修史明志兼自赎的书写取向，梳理了他们的分化与整合，反思了易代之际史家群体所面临的困境与选择，阐释了史家群体与史学在清初文化秩序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本书注重两个视角：一是群体视角，以史家群体展现了明清之际中国史学的宽度与厚度，可更深入地认识其全貌；二是主体视角，从史家的主体意识审视其在史学发展与社会变迁中的诉求，可弥补把史家视为“他者”的弊端。本书提出的史权与文化秩序等问题可为人们思考社会变革中的政府、史家、社会、史学的角色与责任，提供资鉴。

徐亚娟：《“中学西传”在英国的回应：以16-18世纪“中国著述”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中西交流史是近年来备受学界关注的一个领域，主要有“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两个研究方向。本书对近代早期欧洲刊行的“中国著述”在英国的传播与影响进行梳理，从书籍史、文化史的角度分析英国学人对此或赞扬或贬斥的回应之势，考量16-18世纪中国文化西传英国的历程，进而探讨中国文化对英国的影响和作用。以古鉴今，对当下中英两国文化交往仍具借鉴意义。

（三）中国近现代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著述

熊得山著，陈峰、刘立磊编校：《中国社会史研究（外两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熊得山是近代一位民主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传播者，一生从事革命事业，同时潜心钻研中国社会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参与社会论战，留下了不少社会史研究著作和马克思主义译著。本书收录了熊得山三部代表性作品：《中国社会史研究》《社会问题》《社会思想》。《中国社会史研究》驶入从对中国社会史的剖析中探寻中国革命的出路；《社会问题》集中探究社会问题发生的总原因；《社会思想》对古今中外的社会思想进行了对比考察。本书所收录三种著作集中展示了熊得山对社会革命和社会历史问题的思考，不但有助于把握熊氏思想的要旨，对认识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多元面相以及革命知识分子的思想精神风貌亦可提供一个样本。

任虎编校：《〈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本书共分两编：第一编“译本”搜集并挑选了1938—1949年间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七种中译本，实际出版地则涵盖了中国大部分地区，充分展现了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流行。第二编“接受”摘选了华岗、范文澜、艾思奇、吴泽、吴玉章、荣孟源、李平心及西道洛夫对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和应用文章。这些文章展现了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受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的服膺，逐渐成为唯物史观历史研究的理论指南和研究范式的时代履迹。

张耕华：《吕思勉传》，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本书以时间为脉络，通过翔实的资料，清晰地讲述了吕思勉先生的生平经历、治学道路、学术成就、思想见解，以及他对周围事物的看法，对人生的种种领悟，呈现出朴厚勤奋、严谨治学、淡泊名利、独立思考，对推动社会进步始终充满热情的一代学人风貌。

李春保：《王锺翰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王锺翰先生（1913—2007年）是中国现代著名清史、满族史专家，该书对王锺翰学术道路、史学成就进行深入分析与研究，揭示了其治史风格既植

根于中国传统史学，又受到近现代史学思想与方法的熏陶；既有时代特点，又富有个人特色。该书不仅是对王锺翰个体的研究，更可以通过个案进一步探视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的脉络与规律。

谢保成：《龙虎斗与马牛风：论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家》（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23年。

内容简介：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另一个版本的郭沫若。“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这是1961年11月郭沫若第二次到广州看望陈寅恪时作成的一副对联。郭沫若1892年出生，属龙，干支纪年为壬辰年，故“壬”“龙”，暗指郭沫若。陈寅恪1890年出生，属虎，干支纪年为庚寅年，故“庚”“虎”，暗指陈寅恪。“郭聋”，指早年因病双耳失聪的郭沫若。“陈瞽”，指40年代中期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在作者谢保成先生看来，这是郭的一种巧妙回应：外界盛传我二人代表资产阶级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交往上的恩恩怨怨是龙虎相斗，实际一瞽（视而不见）一聋（充耳不闻），所谓龙虎斗与马牛风罢了。这正是谢保成先生《龙虎斗与马牛风——论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家》的意旨所在。本书所论为广义新史学，既包括王国维“开山”的“新史学”，又含有郭沫若“开辟草径”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有别于其他关于“新史学”的著论。最精彩之处，在“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纵论各史学大家。详述王国维、陈垣、陈寅恪、郭沫若等史学家的学术成就和治学理路。注重历史细节，郭沫若造访史语所的生动场景，以及郭沫若与陈寅恪之间的恩怨纠葛，深入人物内心，对历史悬案给出新的解释。

虞云国：《学随世转：二十世纪中国的史家与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本书为虞云国教授对近代史学家与史学脉络的研究专书，通过对近代大史学家如吕思勉、陈垣、陈寅恪、顾颉刚、丁则良、严耕望、刘子健、张家驹等的研究与评价，宗览近代史学的演变脉络。作者认为，近代史学家注重新旧范式之间的衔接与过渡，确保新创的史学范式能够契合中国史学的特定对象与既有资料，以期真正体现中国特色，实现范式的成功转型。就此而言，认真学习这些史学大师的典范之作与史学思想，就具有双重的意义。本书收录的各篇论文，撰作年代前后跨越25年，是作者数十年研究史学的心血之作。

信元：《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接受：科学主义思想的影响机理探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本书从思想史角度切入，以科学主义思想对唯物史观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影响为主线，在介绍五四运动前后科学思潮传播概况的基础上，分别分析科学主义中的唯物主义、进化主义和实用主义对于中国先进分子选择、接受、初步阐释唯物史观的理论中介与桥梁作用，以及中国先进分子将科学主义与唯物史观结合后的初步实践，指出中国先进分子将科学主义与唯物史观合二为一的理论探讨与实践，既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广泛传播，又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提供了科学理论支撑。

金梦：《中国知识界对唯物史观的阐释研究（1927-193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百年来，唯物史观的传播与发展深刻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走向。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陷入低潮时，思想界却掀起了继五四之后的第二次唯物史观传播热潮。这次热潮的兴起正是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向何处去”现实问题的回应与关切。当时各派知识分子都对唯物史观抱有极大兴趣，对唯物史观性质和基本理论作出了不同的判定和阐释。该书重点探讨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低潮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在面对反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挑战与猛烈的话语攻击时，如何共同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坚决反驳种种理论诘难，着力对唯物史观进行创造性阐释与运用的历史过程。

叶建：《近代中国唯物史观史学话语建构研究》，人民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本书将近代中国唯物史观史学话语建构问题置于知识与社会互动的语境中加以探讨，全方位、多层次地考察了思潮（社会、政治、学术等）、媒介（报刊文章、学术著述、通俗读物）、读者（专业学者和社会大众）与近代中国唯物史观史学话语建构的关系问题，着重分析了近代唯物史观史家围绕着当时中西交融的史学思想资源、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共同体等核心问题所展开的理论探讨和话语建构，同时对社会读者想象、接受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式和内容等新问题也有初步的探讨，这些对于当前学界梳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演进的学科脉络，揭示其中的规律性特点，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王学典：《史料、史观与史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本书是山大著名学者王学典教授的自选论文集，作者从史学思潮的变迁到历史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从史学理论问题的思考到历史叙述方式的审视，从中国历史学学术的重塑到个人学术道路的总结，都给予了精彩的书写和呈现，展现了自己的学术成绩和治学的心路历程。本书是作者精选的学术论文的结集。按照所收录文章内容，分为当代学术纵览、史学理论问题再思考、重绘百年中国史学地图、文史小考、附录6个篇章，每一篇章收录了相应的文章。这些文章呈现了作者长期致力于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和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等领域所取得的丰硕的学术成果。

王学典：《当代中国学术走向观察》，甘肃文化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本书为“雅学堂丛书”之一，是一部学术随笔集。作者用历史学的视角，对我国史学界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对其中史学家坚持的一些固有观点提出了质疑，并给青年学者带来了一些反思。书中选取《中国向何处去：人文社会科学的近期走向》《当代史研究的开展刻不容缓》《历史研究的民间取向值得倡导》《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顾颉刚》《走一条宽广的人文学术人才培养之路》等文章，从多个方面反映了作者对于史学研究的态度，是一部学术性与趣味性兼具的佳作。

陈峰：《重访中国现代史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本书是笔者在史学理论及史学史领域耕耘求索的一部分收获的结集，是个人近二十年学术成长历程的一段记录。新旧世纪之交，笔者初涉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园地时，恰逢这一领域正在发生蜕变之际。20世纪80年代初，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人们被压抑已久的理论热情空前释放出来，史学理论研究勃然而兴，吸引了整个史学界乃至哲学界的目光。一方面大张旗鼓地引进国外史学研究的新理论、新方法，另一方面对原有的正统理论学说特别是被教条化了的理论进行反思和澄清。史学理论在历史学中处于龙头地位，牵一发而动全身，可谓一时之显学。而史学史则属于专门之学，处于沉潜状态。进入90年代以后，学风丕变，迎来了一个“问题淡出，学术凸显”的新时代。理论的喧嚣争鸣让位于学术史的钩沉梳理。史学史本为学术史的一支，自然受到重视。而原本一马当先的史学理论研究日渐稀疏，出现了相对保守、沉闷的局面。史学理论研究转而依附

于史学史研究。有学者乐观地认为这种由虚入实的变化是成熟和进步的表现。无论如何，史学史研究的比重越来越大，史学理论研究则显得门庭冷落。可以说，史学理论及史学史领域经历了一场结构性变动。

李长银：《中外交汇：“古史辨运动”的学术因缘研究》，人民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古史辨运动”的兴起，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个标识性事件。本书主要将这场学术运动置于“中外交汇”的现代中国学术语境之中，追索西方汉学、日本“疑古”思潮、宋明文献辨伪学、清代乾嘉考据学、晚清今文经学以及清末民初“新史学”以及民国“古史重建”派和民国唯物史观派等学术形态或学术流派与这场学术运动之间的学术因缘，从而多维度、全方位地揭示这场学术运动何以能够在现代中国学坛兴起的复杂面相。

周文玖等：《民国史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产生和发展》，人民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民国时期史学，是指自中华民国成立至国民政府在大陆的终结这一历史时期的历史学。本书第一章主要采用历史的方法梳理民国史学的发展过程。第二章研究民国时期国粹派、古史辨派、考古派、史料派、食货派、南高派、学衡派、战国策派、生物史观派、现代史学派、马克思主义史学等史学流派。第三章探讨民国时期高等学校历史学的学科建设、研究机构以及所成立的历史学会。第四章研究民国时期中国史料整理及通史、断代史、专史撰述。第五章梳理民国时期的世界史研究。第六章是民国时期历史学重大问题的研究和争鸣。第七章论述民国时期中外史学交流。全书结语就民国时期史学与社会，特别是史学与政治的关系进行探讨；对民国时期史学的特点、成就和局限以及历史影响作出论断，以做到对民国时期历史学的认识达到理论的高度。

汪晖：《历史与幽灵：〈故事新编〉与现代中国上古史》，三联书店 2023年。

内容简介：本书以《故事新编》和《古史辨》这两部经典文本对于古史与故事的不同处理为线索，通过鲁迅的“拟古史”叙述与顾颉刚及其周边的古史叙述的比较分析，阐述了在不同的时间观和历史观中神话、传说、史实的位置，分析了截断众流的古史观所依据的历史概念及其与欧洲、日本近代史观的关系，以及

清末民初第一代共和史观之浮沉。作者在本书后半部分还集中论述了鲁迅在其文学实践中所呈现的凝聚过去、现在与未来的非线性时间观，并将其概括为一种独特的、可以窥见为传统和现代历史叙述所遮蔽的无名者世界的历史幽灵学。

衣若兰：《从列女传到妇女史：近代中国女性书写的蜿蜒之路》，时报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本书为学界少数从史学史的角度，梳理女性史在晚清民初如何被编写之过程。作者以三部文本为主要讨论对象，三种不同形态的叙史方式，相当具代表性。一为传统史学的《清史稿·列女传》，二是新旧夹杂的《神州女子新史》，三是名闻遐迩的《中国妇女生活史》。这三部著作呈现了近代中国妇女史写作的众声喧哗，读者得以一览其在体裁、主题、内容选择之间的竞合，以及作者们多元的妇女史。本书为衣若兰教授在明清妇女史长期耕耘的基础上，下探至民初的新尝试，带领读者沿着史学发展脉络，重读再思近代中国妇女史。上世纪的女性史书写，在懿德、在贤豪、亦在日常，读者阅读品味之际，可考察百年间女性形象如何呈现、如何塑造，并反思当下。

吴原元：《民国时期的中美汉学交流》，商务印书馆，2023年。

内容简介：本书以书评、日记、回忆录、书信及中美汉学家之论著等为主要史料，从跨文化的视角出发，采用“相互对观”的复线比较模式，就中美汉学间的学人交流互动及其所生产的汉学知识在对方学术界的境遇与回响进行了深入探讨，在丰富学术界对于中美文化交流以及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之认识的同时，深化了现有美国汉学史及汉学知识传播与迁移方面的研究。

（四）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著述

陈启能：《史学理论：起步与进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本书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陈启能研究员的论文集，分为上中下三篇，包含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心智史、法国年鉴学派、马克思主义与人的研究、线性文明理论与文明多样性思想的形成三十年代苏联对波克罗夫斯基的批判、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普列汉诺夫论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等三十九篇文章。

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23年。

内容简介：本书取材于古今中外成名史家的治学经验和经典论著，吸收国内外历史哲学、史学方法和史学史的研究成果，并结合作者本人研究和教学的体会，采取深入浅出的笔法，运用平实晓畅的文字，系统而条畅地论述治史所应具备的修养、技艺和规范，并对史学的学科特性、历史知识的性质、历史理解的意义、历史的用途等问题加以讨论，对后现代主义的史学理念也做了适度的回应。本书在方法论方面推许开放性、多元性和实践性，强调历史主义、语境主义和历史语义学的重要性；在研究策略方面主张兼顾实证性、理论化和可读性，提倡“以大观小、小题大做、因小见大”的选题和写作方式。

陈赟：《文明论的历史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西方近代以来的历史哲学，业已发展出关注历史存在的“思辨的历史哲学”、以历史认识为指向的批判或分析的历史哲学、叙事主义的历史哲学等诸种形态，这些不同形态的历史哲学可以会归于普遍历史的叙事。立足于古今中西之争的视野，本书阐发并建构文明论的历史哲学，以回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谓文明论的历史哲学即以多元文明为视域来观照人类历史。成果从历史普遍性、历史进程、世界秩序和历史意义三个层面阐发文明论的历史哲学，共分为三编。

张新刚：《古希腊思想通识课：修昔底德篇》，湖南人民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本书是张新刚教授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的解读。张教授选取书中最为重要的事件，按时间历程，梳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前因后果和内在逻辑，并借此探讨了公民品性、城邦政体、权力与正义等关乎古希腊人思想精神的重要议题，揭示了修昔底德对“人的境况”深入而复杂的思考。

王成军：《诠释学视域下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传记史学观念之异同》，科学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本书从哲学诠释学和中西史学比较的角度，对中西古典时代著名的传记史学家司马迁与普鲁塔克进行比较认识的可能性和合理性进行了论证；又从古今相通、中西互鉴的旨趣揭示了司马迁与普鲁塔克在历史观、人文观和轶事观三个维度的异同，以及对两者在中西传记史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社会历史原因进行分析，认为对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传记史学观念的比较研究，不但具有历史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书的突出特点是在古典时代的中与西、哲学与历史、叙事史与传记史学的相互关联中，探求中西传记史学的特点，并在司马迁和普鲁塔克传记史学的异同中表现出来。

何博超：《说服之道：亚里士多德〈修辞术〉的哲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23年。

内容简介：本书以亚里士多德重要的“跨学科”作品《修辞术》为研究对象，从哲学角度加以分析，阐发其中若干基本的哲学问题。全书首先对《修辞术》的写作时间、内容结构、版本流传、哲学性接受史、政治背景进行论述和介绍，试图概述《修辞术》的文献问题，以及它在哲学史上的影响和意义。第二章讨论亚里士多德对其“哲学修辞术”的定义和这门全新技艺的政治内涵。亚里士多德致力于建构一种“元-修辞术”，从而在柏拉图和智者之间寻找新的解决方案。在之后五章里，本书按照方法论、逻辑学、心理学、伦理学、美学五个方面的次序，以《修辞术》的几个重要概念为中心，论述了其中涉及的哲学问题。《修辞术》是亚里士多德作品中既边缘，但又具有重要价值的作品。在哲学史上，它受到了许多名家的重视和研究，典型如阿威罗伊、阿奎那、霍布斯，尼采，海德格尔等。本书试图凸显其哲学方面的意义，以能为国内学果提供理解这部著作的线索和信息。

陈中梅：《人与诸神：荷马的世界图景》，译林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本书聚焦并围绕荷马史诗展开研究，提出了诸多新观点。在介绍荷马和他的史诗的基础上对荷马的诗学思想进行了深入和全面的探究，研述了史诗语境里的奥林波斯诸神，探讨了宙斯在希腊神系里的霸主地位，分析了他的文本处境；通过解析国王，指出阿那克斯和巴塞琉斯之间的异同，细致剖析了荷马

的王者观；又指对英雄，细论其长相、战力、吹擂、“气短”和羞辱意识等，细察英雄世界里普通人的生活，针对其在明喻里的“表现”，做了贴近古代语境和社会状况的梳理；考察英雄时代的议事机制；讨论了史诗人物的“二畏”以及普通人的话语权利等问题；结合钩沉词义的做法，阐述了命运与人生、死亡和诸神之间的关系，分析其对宙斯权力的制衡；从侧面指涉希腊文化的核心，深入研讨史诗人物的悲剧意识，揭示了斯库拉的峭壁和卡鲁伯底斯的漩涡的能指潜质……

张忠祥：《20 世纪非洲史学与史学家研究》，商务印书馆，2023 年。

内容简介：本书是一部系统论述非洲史学的专著，主要研究 20 世纪非洲史学与传统史学、国际史学及非洲政治变革的互动关系，以及这一时期非洲史学发展脉络、主要成就、史学流派、史学家等，并探讨其发展规律。非洲史学是全球史学的组成部分，事实上，非洲口述历史以及非洲独立之初兴起的民族主义史学都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在全球史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回溯非洲悠久的史学传统（包括文字传统和口述传统）基础上，本书对 20 世纪非洲史学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分别论及殖民主义史学、民族主义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对较为独特的南非史学单列一章，并对非洲史学的最新发展予以关注。在非洲史学家研究方面，分别就阿杜·博亨、阿德·阿贾伊、贝思韦尔·奥戈特、特伦斯·兰杰、谢赫·安塔·迪奥普、托因·法洛拉进行了个案研究，剖析他们在各自研究中所做出的贡献。本书还探讨了中国的非洲史研究，并提出新的议题方向。

蒋竹山：《当代历史学新趋势：理论、方法与实践》，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 年。

内容简介：在时间推移下，历史学研究也随着时代背景而发展出与前一个世代截然不同的研究趋势，《当代历史学新趋势》内容着重于目前史学研究的热门与前瞻议题，使读者更能领略史学研究趋势如何随时代背景演变。当前的历史学趋势可归类为全球视野、帝国与国家、跨文化交流、环境与历史、“科学、技术与医疗”、情感、历史记忆、“阅读、书籍与出版文化”、大众史学、新史料与历史书写。《当代历史学新趋势》内容既含括最新的研究趋势，也有过去十几年来的数个重要课题的新发展，象是性别史、思想史、科学史。除了以当前的前瞻与热门课题为主，《当代历史学新趋势》另一特色就是凸显当代青年学者的观点。虽然参与撰写的作者横跨老中青三代，但主要以刚投入历史学术社群担任副教

授、助理教授或助理研究员者居多，希望能透过这些新兴研究者的学术观点，完整地反映出当代史学研究趋势的走向与变化。

吴晓群、陆启宏主编：《西方史学史研究（第2辑）：知识史与历史认知》，商务印书馆，2023年。

内容简介：《西方史学史研究》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办的学术辑刊，本书稿为第2辑。“西方史学史”是中国史学界的一个“发明”和独特的研究领域，在当今全球化趋势和反全球化浪潮的双重冲击下，这个学科该如何进一步发展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西方史学史研究》即是为这一学科精心打造的一个平台，每期围绕一个主题，强调跨学科的交流和研究。第2辑的主题为“知识史与历史认知”，重点对知识史进行了专刊介绍，提供了国外对这一领域的最新进展。本辑主要设置了专论、“知识转向”、彼得·伯克与知识史、专题论文、书评、札记、前沿动态等栏目，收录文章二十余篇。

（五）国外著述

1. 外文原著

William Tullett, *Smell and the Past: Noses, Archives, Narratives* (嗅觉与过去：鼻子、档案、叙述),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23.

内容简介：如果对“过去”感兴趣的研究人员使用他们的鼻子呢？这本开放获取的书为更具想象力的跨学科方法研究感官遗产和历史提供了理由，认为我们可以也应该把鼻子作为阐明过去的研究工具。在评估我们和我们的祖先如何接近、理解和概念化气味时，作者展示了如何对档案进行“重新闻味”，以揭示那些只隐含在历史记录中或被历史记录掩盖的叙事。从香水库到历史物体散发的有机化合物，这本书为我们在研究历史时使用嗅觉提供了指导，以便更充分地理解和交流过去。本书以“嗅觉人物”为例，展示了如何通过结构化的嗅觉体验找到历史叙事和论点，并展示了我们如何通过打开思维和使用鼻子来丰富对过去及其与现在关系的理解。

Johan Östling, David Larsson Heidenblad,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知识史),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

内容简介：本书提供了知识史的教学概述，包括其主要趋势、区别思想和关键概念。然而，它主要不是一个最先进的概述，而是一个有争议的贡献，试图将该领域推向某个方向——研究社会中的知识和人们生活中的知识。因此，作者所设想的知识史不是对科学史和知识史的重塑，而是对社会和文化史的振兴。这意味着许多不同形式的知识应该成为研究的对象。通过借鉴世界各地正在进行的关于不同时期和问题的研究，作者证明了知识史可以丰富我们对过去社会的理解。

John Robertson (eds.), *Time, History, and Political Thought* (时间、历史与政治思想),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

内容简介：在“一周是很长的政治时间”这句陈词滥调和许多政治哲学家希望赋予他们的思想普遍、永恒的有效性之间，存在着一条政治思想史唯一有资格弥合的鸿沟。因为历史表明，任何政治概念都没有完全脱离时间，许多人明确寻求与历史形式相关的合法性。从查士丁尼的法典到衰落后新教和天主教的政治共同体愿景，从霍布斯和斯宾诺莎到苏格兰启蒙运动，从康德和萨维尼到德国历史

主义和阿尔及利亚革命的遗产，这本书探讨了自古以来不同的时间和历史概念被用来理解政治的多种方式。将当代领先的政治思想、时间、历史和政治思想历史学家聚集在一起，证明了时间和历史在多大程度上丰富了政治想象力。

Zoltán Boldizsár Simon and Marek Tamm, *The Fabric of Historical Time* (历史时间的结构),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

内容简介：历史时间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难以捉摸的概念。然而，随着社会试图理解快速变化的世界，它在二十一世纪获得了新的意义。本书描绘了一个基于时间性和历史性之间区别的历史时间理论。它将历史时间的结构视为多种时间性和历史性的不同关系安排和相互作用。在结构中，各种时间性和历史性在没有预先确定的情节的动态中出现、产生、淡出、转变、不存在、融合、共存、重叠、排列和重新排列。本书特别关注人类世不仅仅是人类的时间性，技术推动的失控变化的历史性，以及技术、生态和社会变化交叉点的历史时间结构中的冲突。

Ruth Ahnert, Emma Griffin, Mia Ridge and Giorgia Tolfo, *Collaborative Historical Research in the Age of Big Data: Lessons from an Interdisciplinary Project* (大数据时代的协同历史研究：一个跨学科项目的经验教训),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

内容简介：“与机器共存”是英国有史以来资助的最大的数字人文项目。该项目汇集了23名研究人员组成的团队，利用20多年的数字化项目，加深我们对机械化对19世纪英国影响的理解。与之前许多寻求创造资源的数字人文项目不同，该项目关注的是与现有的东西合作，尽管理论上很简单，但实践中很复杂。本书描述了为此所做的努力。它概述了在英国复杂的文化数据环境中建立和管理一个真正多学科的数字人文项目所面临的挑战，并分享了寻求开展数字历史项目的其他项目可以从中吸取的经验。

Tor Egil Førland and Branko Mitrović (eds.), *The Poverty of Anti-realism: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Postmodernist Philosophy of History* (反实在论的贫困：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的批判性视角),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23.

内容简介：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反实在论已经在当代历史哲学当中产生了巨大影响。该书提出了与历史学家工作的反实在主义理解相对立的观点。该书的

第一部分概述了当代反实在论历史哲学，并展示了其主张要么如此广泛以至于适用于所有科学知识，要么仅涉及历史学家工作的某个特定部分。在该书第二部分，作者批评了主要的反实在论原则，包括：断言历史学家使用的集合概念在过去没有参照物；历史事实是理论依照物，因此无法推翻现行的理论；保罗·罗斯运用纳尔逊·古德曼的世界创造的“非实在论”理论，以提出过去的多元性；以及认为多样的可描述性阻止历史学家提供真实和可测验的过去描述的信念。第三部分表明，反实在论的政治蕴含通常与左翼反实在论者所认为的不同。当他们面对其理论后果时的反应表明了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的不一致性和站不住脚之处。

Mariana Imaz-Sheinbaum, *Historical Narratives: Constructable, Evaluable, Inevitable* (历史叙事：可建构的、可评估的以及无可避免的), London: Routledge, 2023.

内容简介：该书解释了一些涉及叙事构建的心理过程，并解释了为何有关单一历史事件会有如此众多的差异化历史叙述。该书的一个核心焦点是历史学家如何从无关联的数据单元发展到一个连贯的、有结构的、有组织的经验流。作者认为，这些关联得以建立的方式符合某些格式塔心理学原则，这些原则使我们能够理解历史叙事是如何建构的，以及根据这些原则得以应用的方式，这种构建可能会相当不同。为了说明这些原则在历史叙事中的显现，作者分析了诸如布克哈特、赫伊津哈、维科和马克思等经典历史作家。

Gunnar Schumann, *Historical Explanation: An Anti-Causalist Approach* (历史解释：一种反因果论的方法), London: Routledge, 2023.

内容简介：该书关注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中合适的解释形式。它结合了行动理论和历史哲学，并发展出一种基于后期维特根斯坦和日常语言哲学观点的人类行为的目的论解释的理论。在行动哲学中，许多哲学家支持人类行动的因果理论。此外，在当前的历史哲学中，大多数人认为历史学家应该通过历史现象的原因来解释它们。该书通过复兴对当前和过去人类行为的反因果式解释方案，对这些主流观点提出了异议。作者认为，处理人类行为的学科需要一种特定形式的解释，即目的论或有意图的解释。这意味着过去的人类行为及其结果必须通过行动主体的理由，而非通过原因来解释。因此，历史学采用了与科学截然不同的解释方法。作者由此在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中提倡一种 *Verstehen*（理解）的方法。

Melanie Nolan, *Biography: An Historiography*(传记:一部史学史), London: Routledge, 2023.

内容简介: 本书探讨了从 19 世纪直至当今西方历史学家运用传记的方式, 涉及历史学家在其系统性的传记实践当中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该书分析了历史学家随着时间推移在面对与证据有关的七个主要问题时所采取的策略和方法, 包括但不限于因果关系的问题, 事实和虚构的问题, 他人心灵的问题, 重要性或代表性的问题, 宏观和微观视角问题, 以及主观性和相对真相的问题。

Geoff Eley, *History Made Conscious: Politics of Knowledge, Politics of the Past* (历史变得有意识: 知识的政治, 过去的政治), Verso Books, 2023.

内容简介: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 历史的书写经历了两次巨大的转变。首先, 在马克思主义等唯物主义社会学的推动下, 伟大的社会历史浪潮确立了社会解释的价值。然后, 为了回应新的理论辩论, 文化转向扰乱了许多新近获得的确定性。每一个挑战都深深地受到政治的影响——从阶级、性别和种族问题到身份、帝国和后殖民问题。由此产生的争议给历史学家带来了彻底改变的可能性——扩大的主题、陌生的方法、对理论和其他学科更加开放、在公共文化中占据新的地位。历史意识提供了一个学科不断重新思考其职责的快照。我们如何一起理解“社会”和“文化”? 我们如何才能最有效地进行跨学科合作? 如果我们认真对待理论, 这会如何改变历史学家的工作? 我们应该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政治?

Berber Bevernage, Lutz Raphael (eds.), *Professional Historians in Public: Old and New Roles Revisited* (公众视野中的专业历史学家: 新旧角色再探), De Gruyter Oldenbourg, 2023.

内容简介: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公众对历史的兴趣正在蓬勃发展。这给专业历史学家带来了新的机遇, 但也带来了挑战。这本书询问历史学家如何应对公众对历史不断变化的需求, 以及这些需求如何影响他们的职业实践、价值观和身份。这本书提供了大量关于历史学家在学术领域之外应用其专业知识的案例的详细研究。这本书的关注集中在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太平洋和欧洲, 地理范围很广。本书分为五节, 首先批判性地回顾了一些历史学家, 他们通过将自己的专业活动与明确的政治党派或社会参与相结合, 打破了主流学术立场。第二部分重点关注历史学家在进入法庭或更广泛地将其专业知识暴露于法律框架时所面临的

挑战。第三部分侧重于政策驱动的需求以及直接的政治干预和法规对历史职业的影响。第四部分着眼于与新数字媒体崛起相关的挑战和机遇。最后，几位作者提出了他们对规范性标准的看法，这些标准可能有助于更好地回应新的需求，并为公众参与的历史学家定义榜样。

Giuseppina D'Oro, *Why Collingwood Matters: A Defence of Humanistic Understanding* (为何柯林武德重要：捍卫人文主义的理解), Bloomsbury Academic, 2023.

内容简介：柯林武德是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他的工作，特别是在行动哲学和历史方面，在 20 世纪和 21 世纪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他的作品的重要性是无可争议的，但这是第一本考虑他如何以及为什么真正重要的书。G. 杜罗认为柯林武德作为一个思维多变的思想家的重要性，与许多当代哲学家不同，他拒绝关注狭隘的技术兴趣，而是观察整个思想世界。本书复兴了柯林武德对哲学分析的作用和特征的概念，并展示了哲学分析如何影响他对心灵的理解，行为意味着什么，以及历史上理解过去意味着什么。本书还论证了他的形而上学方法与人类世和全球环境危机所带来的挑战的相关性。本书既是对柯林武德思想的阐释，也是对其当代相关性的生动探索，为一位 20 世纪的博学者提供了一个急需的审视。

Luigi Alonzi (eds.), *History as a Translation of the Past, Case Studies from the West* (历史作为一种过去的翻译：西方案例研究), Bloomsbury Academic, 2023.

内容简介：本书考察了历史学家解释过去的行为如何被理解为认识论和认知翻译。本书认为，文字、图像、历史和考古遗迹都可以被视为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历史学家的任务正是将它们过去的含义翻译成现在的语言。翻译行为也是一种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同步行为，扰乱和重置时间，并创造不同于任何线性编年的复杂时间性。本书对翻译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解读，关注不同时期的不同国家的学者，展示了他们各自的方法，有助于帮助我们在未来更好地理解和翻译过去。

Paul Oldfield, *Documenting the Past in Medieval Puglia, 1130-1266* (记载中世纪普利亚的过去, 1130-1266), Oxford Academic, 2023.

内容简介：本书探讨了 1130 年普利亚并入西西里新王国后，普利亚地区历史记忆的产生。它评估了 1130 年后更传统的普利斯历史书写形式明显消失的意义，并探讨了其他历史话语的存在，这些话语嵌入了幸存的当地文献中。这本书包含了对特许状和信件的广泛研究，这一证据类型尚未在诺曼-斯陶芬时代（1130 - 1266）对中世纪普利亚的研究中充分利用。这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研究普利斯人和社区以及“中央代理人”（君主制、教皇制）在产生当地历史记忆方面的作用，特别是在政治动荡和社会文化转型的各个阶段。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表明了文书中多种交织在一起的公共和私人历史叙事和记忆的保存和创造，这些都是当地社区和中央上层建筑之间反复相遇的产物。前者充当知识的媒介，维护自己对过去的看法，后者旨在获取信息，以便进行更有效的干预，并为记录和塑造关于过去的对话提供了框架。因此，我们可以确定由修道院、主教、专业人士、城市和家庭社区在一种持续的互动中塑造了当地历史叙事和记忆。因此，这本书有助于更广泛地理解中世纪政治中“中心”和“外围”之间微妙的相互关系。

Paul M.Dover(eds.), *Engaging with the Past and Pres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 across the Disciplines*(过去与当下的纠葛：跨学科视野下过去与当下的关系), Routledge, 2023.

内容简介：本书汇集了 15 篇来自各种学科学者的文章，这些学者不仅包括历史历史学家，还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包括神学、艺术史、公共史和档案科学）和自然科学（包括地质学、古生物学、天文学和古人类学）其他分支的学者。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个本质上看似简单的问题，对许多研究领域都具有核心重要性，事实上产生了各种答案，对方法论、认识论和教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本书的撰稿人描述了他们如何将过去的现象与对现在的观察联系起来，揭示了在经常相互隔离的主题之间的智力共鸣和对话机会。通过让学者们参与到关于他们工作的第一原则的对话中，本书对一个永恒的问题进行了真正的跨学科思考，对过去和现在的知识都有启示。

2. 国内译著

（日）浮田和民著，李浩生等译，邬国义编校：《史学通论四种合刊》，商务印书馆，2023年。

内容简介：全书共八章，分述历史学的性质、范围、定义、价值，以及历史与国家、地理、人种等之关系，历史大势及研究方法。经比勘对照，梁启超新史学思想便直接受到其影响。20世纪初年，一些留日学生竞相翻译介绍，先后有多种译本出版。这些译本十分稀见，现将其四种合刊整理出版。对其进一步探讨梁启超新史学思想形成的知识背景，中日史学两者的关联与互动，深入研究新史学思潮的兴起与发展等，均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日）坪井九马三著，贾菁菁编译：《史学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本书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翻译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一书内容，该书分《原序》《序论》《史料编》《考证编》《史论编》，主要是对史学理论及方法论的介绍；二是另附录三篇短文，选录坪井九马三的两篇译作《关于史学》《历史地理是什么》，及介绍坪井九马三生平及学术著述的村川坚固《坪井九马三先生的故去》一文。

（加）布鲁斯·G·特里格著，陈淳译：《如何探究史前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本书的研究填补了学界的两项空白。一是探索了史前学研究方法论，因为在当时的专著中，都没能解决在没有文献记载的人类群体的历史重建和解释中所遇到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技巧构成了史前学区别于考古学的独特方法。二是用人类学的术语来讨论前王朝时期的埃及。本书的研究横跨了人类学和埃及学两个领域，因此也是交叉学科研究的优秀范例。时至今日，本书依然对世界史前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

（美）杜润德著，丁波、丁慧添译：《朦胧的镜子：司马迁笔下的矛盾与冲突》，商务印书馆，2023年。

内容简介：本书是欧美学界对《史记》与司马迁研究的经典著作，作者杜润德是美国汉学界史记学研究领域最负盛名的学者之一，中译本属于“海外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丛书”第二种。全书共六章。第一章中作者探讨了司马迁写史的历史

背景，第二章介绍了司马迁所描述的孔子，第三章追溯了中国古代六经传统与司马迁对儒家经典所做出的贡献；第四、第五两章考察了司马迁对中国早期最有影响力的两部著作《左传》和《战国策》的改编问题。最后一章，探索了后世学者试图在《史记》中寻求一个连贯一致的理念的问题。在本书中，作者系统地介绍了司马迁的历史世界，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史记》文本的文学性研究之上，对司马迁内心世界的精辟分析得到了美国汉学界的高度评价。

（日）中务哲郎著，杨清淞译：《希罗多德〈历史〉：描述历史的均衡》，三联书店，2023年。

内容简介：与修昔底德等后世历史学家相比，希罗多德这位“历史之父”更加注重传达历史的含义，除了原原本本地讲述古代故事之外，他还在其“历史的”记录中加入了创作性的内容，使《历史》一书在某些角度更像是关于世界的另一种传说。本书上部从希罗多德的生平出发，探讨了《历史》的成书过程，以及它记录历史和世界的方式；下部结合《历史》文本进行分析，提出“车轮”的说法，彰显出希罗多德关于世界均衡的主张。

（英）柯林武德著，顾晓伟译：《史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柯林武德被誉为20世纪最著名的历史哲学家之一，其遗作《历史的观念》为其赢得了无限声誉。而《史学原理》是柯林武德生前计划作为《历史的观念》的姊妹篇共同出版的另一卷历史哲学著作，并对其寄以厚望，甚至视为毕生之作。遗憾的是，柯林武德去世前只完成了写作计划的三分之一，且手稿始终未被后人发现。1995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宣布发现《史学原理》手稿，本书即根据这份手稿编辑而成，同时还增补了八篇柯林武德在20世纪30年代写作的未发表的手稿和笔记。在这些手稿中，柯林武德进一步阐发了他关于历史学的性质、对象、方法和价值等问题的思考。德雷和杜森两位编者为本书撰写了长篇导言，对手稿的内容、编辑始末和所涉及的柯氏历史哲学思想之问题做了深入介绍。

（日）石川博树等著，郑天恩译：《论点·东洋史学》，台湾商务印书馆，2023年。

内容简介：本书搜罗了有关东洋史这个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及其产生的“论点”，在探讨欧亚非大陆上、时间跨度长达六千年的历史时，众人为了追求“真

实 / 正解”的过程中，究竟提出过哪些不同的见解，以及产生的讨论。唯有接触各式各样的“论点”，经过“独立思考”的训练，才能真正理解历史学的醍醐味。每篇论点皆由三部分所组成“背景”“论点”“探究的重点”。并且包含对于专有名词的补充、相关参考资料，以及延伸思考，让读者更全面理解历史的梗概和复杂性，并且有能力利用手边信息，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历史“论点”。

（日）藤井崇等著、郑天恩译：《论点·西洋史学》，台湾商务印书馆，2023年。

内容简介：本书搜罗了从古到今与西方历史相关的“论点”，探讨人们在追求“真实 / 正解”的过程中，究竟提出过哪些不同的解答，以及随之产生的论战。唯有接触各式各样的“论点”，经过“独立思考”的训练，才能真正理解历史学的醍醐味。每篇探讨的论点皆由三个部分组成：“历史事实”“论点”“从历史学角度来思考的重点”。此外，各篇也包含专有名词补充及相关参考资料，让读者能更全面理解历史梗概和思维，并且有能力进一步延伸思考。

（法）保罗·利科：《情节与历史叙事：时间与叙事（卷一）》，崔伟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本书是利科先前著作《活的隐喻》的继续发展。利科比较了奥古斯丁《忏悔录》中的心理时间概念和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中的物理时间或宇宙时间概念，并分析两种对立时间观的内在疑难。为了解决这种疑难，利科尝试利用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情节”概念把时间与叙事结合起来。由此，利科结合现象学、历史编纂学和虚构的叙事理论建立起自己的叙事理论。通过把时间性与叙事性联系起来的创造性工作，利科为我们理解时间的本质和主体的自我理解提供了新的可能。

（芬）汉努·萨尔米著，徐艺欢译：《什么是数字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数字史学是一个新兴的领域，它利用数字技术和计算机方法进行历史学研究。作为一项全球性的事业，它邀请世界各地的研究者共同参与，为探索、理解和展现过去提供一种令人兴奋的新方式。本书提供了对数字史学简明扼要的介绍。从讨论历史数字化研究的起源开始，作者探讨了历史如何以数字化形

式存在的问题，随后介绍了数字史学的基本概念和思想，包括数据库和档案、跨学科和公众参与等。此外，作者概述了大数据研究方法及存在问题——无论是涉及文本资料的，还是涉及视觉资料的，并给予原生数字化时代以特别关注。

（英）彼得·伯克著，章可译：《什么是知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知识的历史是什么？这本引人入胜的小书揭示了知识史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独特之处，以及它与科学史、思想史、文化史和知识社会学的区别。著名史家彼得·伯克首先从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区（印度、东亚、欧洲、美洲和伊斯兰世界）广泛撷取范例，讨论该领域学者最关注的核心概念，继而梳理了“信息”转变为“知识”的“加工”过程，最后指出了当前该学科面临的若干重大问题，并尝试为之提供解决的方案。本书对于所有学习历史和人文学科的学生，以及感兴趣的普通读者来说，都是必读的。

（英）彼得·伯克主编，薛向君译：《历史写作的新视野》，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历史写作的新视野》（第二版）由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剑桥大学文化史荣休教授彼得·伯克主编，罗伯特·达恩顿、乔瓦尼·列维、罗伊·波特、琼·斯科特、吉姆·夏普等10位国际知名的历史学家参与编写，审视了历史研究中新兴的诸多跨学科领域，包括自下而上的历史、女性史、海外史、微观史、口述史、阅读史、视觉史、政治思想史、身体史、环境史等，探讨了这些当代史学实践所体现的思想和方法。本书视角宽广、内容宏富、专业严谨，对多姿多彩的新史学做出了颇为新颖而深刻的分析，是了解当代西方史学史与史学理论不可多得的佳作。

（美）约瑟夫·莱文著，王伊林译：《人文主义与史学：英国现代史学编纂之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本书开篇即梳理并阐释了15世纪的历史写作方法，以及那个时期人们区分历史和故事（fiction）的各种做法。在随后的章节中，通过回顾现代史学编纂中最著名的事件之一（即《君士坦丁捐赠》真伪之争），以及1500—1800年古文物研究的发展，作者指出，人文主义者通过模仿古典作品来撰写历史，而古典冲动则促成了现代考古学的诞生，由此也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现代

史学编纂的发展方式。除此之外，作者还借助对培根早期生活和思想的密切关注，试图找到其自然哲学和新科学对英国史学的影响，因为和人文主义者一样，培根也无法容忍中世纪浪漫史和圣徒言行录中的故事，他认为新科学的第一项工作就是通过最新的观察和实验准确地描述自然。在最后部分的章节中，作者引入了18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关于“古今之争”中那些针对自我意识问题的回应，由此也向我们呈现了吉本对于近代早期英国史学的巨大贡献。

（美）达林·M·麦克马洪、（美）塞缪尔·莫恩主编，张智、左敏译：《重思现代欧洲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本书是一部关于欧洲现代思想史研究的学术史、史学论文集。集合了14位世界一流思想史家对欧洲思想史研究的反思性讨论，试图在思想史学科复兴的背景下，厘清思想史研究的目的、方法和主要论点，以此恢复思想史研究的学术传统。书中的14篇文章，或反思过去几十年间主要的思想史流派——如阿瑟·洛夫乔伊和他的观念史、以昆廷·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语境主义），或回顾（在二战后获得了统治地位的）盎格鲁-萨克逊学术界之外德法两国的思想史传统，或讨论思想史与文化史（新文化史）、学科史、科学史、观念史等领域的关系，或重新唤起思想史家对个别重要核心问题的重新思考——性、观念、空间、国际或全球。就学科发展的前景而言，本书也讨论了跨学科、学科交叉等问题。

（加）丹尼尔·沃尔夫著，陈恒、李月、屈伯文译：《全球史学史》，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

内容简介：当代著名历史家丹尼尔·沃尔夫著述的《全球史学史》是第一部综述了从古至今世界各地史学思想和事件多元并存、互融并进的全球史学史论著，这位巅峰之作同时确立了作者在全球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本书在时间上囊括了从大约4000年前直至20世纪末的漫长时段，探讨了不同社会、政治和文化语境中形成的不同史学传统，以及历史学在不同社会中的地位的变化；在空间上涵盖了传统史学史研究中通常忽略的地区，如亚洲的泰国、越南、缅甸，欧洲的瑞典，非洲的埃塞俄比亚等。全书采用“教科书”的形式编排，除去介绍部分和简短的结语之外，共计九章内容。史学史的写作要实现全球视角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需要考虑时间、空间的建构，文化的连续，此书的处理堪称典范，特别

是在结构的安排上非常专业合理。在厚重叙述的同时，作者精选了 52 幅插图、35 个主题框、46 个文献摘录，并通过进一步阅读书目来避免过多的脚注，让这样一部学术大作让读者有深入浅出的阅读体验。

（英）露西·德拉普著，朱云译：《女性主义全球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 年。

内容简介：本书是英国历史学家露西·德拉普所写的关于女性主义全球发展史的文化史著作。作者打破传统的欧美中心主义模式，从全球性视角切入，以梦想、思想、空间、物品、外表、情感、运动、歌声等关键词为研究聚焦点，以点带面，绘制了纵横两百多年、跨越世界各大洲的女性主义全球史。全书探源了不同的女性主义梦想；讨论父权制及其他术语如何充分体现了人类社会组织中存在的种种性别模式，由此找出女性主义的理论来源；将女性主义置于工作场所与礼拜空间，探讨女性主义的空间问题；聚焦女性主义物件，透过徽章、海报、服饰等日常用品，突出女性主义物质文化与视觉文化，并将其延伸至女性服装与时尚包装下的“外表”；同时还探究了女性主义引起的种种情感。作者既呈现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女性主义观点与女权运动，也密切关注那些为性别不平等而奋斗的个体女性的人生。通过放大曾被忽视、被淹没的声音，绘制女性主义的世界性图景，本书向我们展示了与女性主义历史的丰富关系将如何启迪人类共同的未来，它也让我们看到女性主义的最终追求应当是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性别与取向的人都可生活如意的世界。

（美）凯瑟琳·戴维斯著，荆腾译：《历史分期与主权：封建和世俗化观念如何支配时间政治》，华夏出版社，2023 年。

内容简介：该书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探究封建法以及封建编史学问题，揭示“封建主义”的历史性形式中所蕴含的现代主权理论和某种社会契约理论；第二部分从世俗化问题切入，审视时代意识、时间政治与现代主权问题之间的复杂关联。基于讨论，作者检讨了基于“中世纪”与“现代”之分的时代分期问题，论述了“封建主义”和世俗化问题对时间政治问题的支配性影响。作者由此表明，时代分期的时间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主权的时间；换言之，主权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时间性的模式。

（英）约书亚·L. 彻尼斯著，寿天艺、宋文佳译：《一种思想及其时代：

以赛亚·伯林政治思想的演变》，译林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本书详细描写了以赛亚·伯林的政治思想、哲学观点以及历史认知的起源和发展。通过大量鲜为人知的出版材料和档案文件，彻尼斯将伯林不断发展的知识兴趣和政治立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各类生活和政治事件相联系，并特别强调了伯林的多元主义在哲学和文化辩论中的根源，他对道德与政治行为的关注，以及他对不断发展的自由的解释。伯林独特的自由主义，不仅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文化政治以及冷战初期的政治和道德困境；也源自伯林所认为的，自由主义者对精英主义、技术官僚主义、科学至上主义等政治立场的危险拥抱。与此同时，伯林对其所谓“积极自由”的态度，比人们通常意识到的要复杂和矛盾得多。

（德）阿克塞尔·霍耐特著，梁乐睿译：《时代的活体解剖：20世纪观念史肖像》，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本书是德国哲学家阿克塞尔·霍耐特对20世纪观念史进行研究与诠释的著作，他所选取的知识分子是一群“无所归依的世界公民”，推动他们进行理论思考的是那些关于痛苦、灾难以及驱逐的切身体验。对他们而言，理论就是剖析社会肌体的解剖刀，是揭示社会深层结构与内在生命的利器。无论是弗朗茨·罗森茨威格、奥雷尔·科尔奈、罗宾·科林伍德、朱迪丝·施克莱还是昆廷·斯金纳，他们都把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富有历史意义的政治事件密切联系在一起，试图为时代面临的难题提供诊断和答案。霍耐特认为，有必要把20世纪观念史看作“一个从历尽艰辛的领悟中，萃取出充满意义的洞见与无法替代的教诲之过程”。虽然本书并不是对主流观念史书写的颠覆，但是它或许能够为受遮蔽的深层经验提供独到的历史、社会或政治的概念性诠释。

（日）斋藤幸平著，王盈译：《人类世的“资本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要在资本主义的尽头找到突破，我们需要回到马克思。斋藤幸平提出关注马克思经济学的“生态学转向”，致力于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被人忽视的生态思想。在新书《人类世的“资本论”》中，他重申：资本主义对近乎无限利润的追求正在驱动人类摧毁地球，只有通过“去增长”才能减缓社会生产、财富流动的速度来修复人类对环境造成的伤害。他认为，非资本主义、前资

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模式并非‘增长驱动’的”。同时，斋藤借此批判了当下流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他借用马克思的术语犀利地指出，这种目标已经成为“大众的新鸦片”，因为在没有改变经济体系的情况下局部性地推广环保袋、环保水瓶，实质上是在将结构性的困境归结为个体责任，也掩盖了企业和政治家的责任。尤其是在与生产力至上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诀别的马克思晚年思想中，重新发现“可持续性”和“社会平等”实现的可能性。在环境危机刻不容缓的当下，“去增长共产主义”这唯一可行的选项终于浮出水面。想避免“人类世”的硬着陆，就不能把危机都交给政治家、专家去处理。“托付他人”只会让1%的超富裕阶层得到优待。这也必定是一场艰难的“战斗”。但为了未来，我们别无选择。有人也许会犹豫不决，认为不可能动员起99%的人同行。但其实，只要有3.5%的人以非暴力的方式真正站了起来，社会就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当然，这个未来取决于读完这本书的你，取决于你是否决意成为那3.5%中的一员。

（美）约翰·托尔佩著，孙岳译：《人类史的三个轴心时代：道德、物质、精神》，商务印书馆，2023年。

内容简介：德国思想家雅斯贝斯在其著作《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认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在东西方均出现了人类文化突破现象，他把这一时期称为“轴心时代”。本书作者约翰·托尔佩在雅斯贝斯“轴心时代”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的“轴心时代”仅仅是三个直接影响当代社会问题的关键时期之一。他认为，不是只有一个原初的“轴心时代”及其后续发展，而是存在着三个“轴心时代”，每一个时期都直接影响了人类的生活和人类要面对的问题。早期的轴心时代的关键词是道德，强调宗教和道德发展；第二个轴心时代的关键词是物质，关注的是物质对象的生产和使用；第三个轴心时代的关键词是精神，聚焦于技术。本书以道德、物质和精神作为人类历史的三重架构，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历程。作者将“轴心时代”进一步具象化，以一种世界视野，引导读者思考人类社会的现状和未来。

（以）阿纳特·比莱茨基、（以）阿纳特·马塔尔著，刘小涛、何朝安译：《分析哲学的故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分析哲学是什么？分析哲学是否已经终结？分析哲学将向何处

去？本书正是英美分析哲学界 15 位知名学者对以上问题的共同回答。本书作者既包括像希拉里·普特南、雅克·亨迪卡这样的老一辈分析哲学家，也包括彼得·哈克和彼得·希尔顿、朱丽叶·弗洛伊德这样的一流分析哲学史家。全书以哈克对整个分析哲学运动的概观开局，以亨迪卡充满悬念的问题“谁将扼杀分析哲学”结尾，以分析方法、分析风格、经验主义、心理主义这样的关键论题填充，并涵盖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摩尔、奥斯汀、克里普克等关键人物的思想。在许多读者眼里，分析哲学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公式和枯燥无味的概念，而在这本书里，分析哲学则是由人物（heroes）和情节（plot）构成的有头有尾的一部剧，是一次“回到那里去”的尝试，即回到分析哲学的起点，探寻这些哲学家的动机与初心，并为我们展现了多面与丰富的知识史画面。

（法）让·伊波利特著，张尧均译：《黑格尔历史哲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23 年。

内容简介：本书虽然名为《黑格尔历史哲学导论》，但实际上它既与黑格尔著名的《历史哲学》没有直接关系，也不是对黑格尔庞大思想体系中的“历史哲学”的专门研究。从其内容来看，它倒更像是对黑格尔思想（当然是有关历史和政治的思想）的发生史或形成史的研究，也就是说，它侧重的是黑格尔的早期思想，即《精神现象学》产生之前的思想。只在最后一章，它才较多地涉及了黑格尔的早期思想与后期思想，尤其是与《法哲学原理》中的相关思想的关联。如果说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建立了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哲学，那么伊波利特的这本小书则阐述了黑格尔通达这种历史哲学的道路——一条漫长的“教化之路”。

（德）里特尔等编，潘德荣等译：《诠释学：六点辞条系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 年。

内容简介：里特尔、格林德尔、加布里尔等著名哲学家主编的十三卷本《哲学史辞典》（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从 1971 年出版第一卷，至 2007 年出版最后一卷，耗时 36 年。有一批造诣精深的哲学家——如伽达默尔等人——参与撰写辞条的辞典，其权威性自然毋庸置疑。这部辞典与其他诸如哲学类的概念、术语、观念等专门辞典不同，它不仅是对概念的定义、描述或分析，而且从批判的、历史的视角提供了全景式的论述，详尽地列出了概念的

源流演变和文献出处。本书是《哲学史辞典》中有关“诠释学”的核心辞条选编汉译本，亦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潘德荣教授主编的“诠释学与诠释之学研究系列丛书”之一种。

（德）汉斯·布鲁门贝格著，李贯峰译：《隐喻学范式》，东方出版中心，2023年。

内容简介：隐喻在哲学语言中扮演什么角色？它们是否阻碍了清晰的思考和清晰的表达？修辞有助于使哲学更容易被普通听众理解，但为了术语的精确性，在理想的情况下是否应该被消除？或者说，哲学家所使用的形象能否比他们精心设计的思想体系更能告诉我们规范一个时代的希望和关怀、态度和冷漠？在《隐喻学范式》中，汉斯·布鲁门贝格通过研究隐喻和概念之间的关系来处理这些问题，作者认为存在着不能翻译回概念语言的“绝对隐喻”。这些隐喻回答了所谓本源的、理论上无法回答的问题，它们的相关性在于它们不能被揭示开来，因为我们并没有对此提出问题，而是发现它们已经在我们存在的基础上被先行提出了。因此作者认为，隐喻跃进了概念所无法填补的空白。

（英）莱斯利·豪萨姆著，王兴亮译：《旧书新史：书籍与印刷文化研究定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书籍的文化和历史学研究是一个方兴未艾的学术方向，根植于历史学、文学研究和目录学这三个主要学科。它们分别视书籍为文化交易，书写文本和物质制品。本书为这个宏富，却有时混乱的领域提供了指引，以解释为何不同的学术方法在研究似乎相同的对象时会引出不同的问题，并得出彼此矛盾的答案。它带来的启示是，文本会变，书籍易变，是读者最终制造了他们所需要的书籍。

（美）萨姆·温伯格著，张祿佳等译：《历史思维：描绘历史教育的未来》，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本书是历史教育心理学方面的经典著作，因其为“人文学科的理解及文科教育的改善”做出了巨大贡献，获得了“弗雷德里克·洛克奖”。本书从历史思维视角研究了为何学历史、如何学历史、如何教历史、历史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分四部分：第一部分阐明了历史对认识他人、了解世界的独特作用，追溯了历史教育心理学史；第二部分探讨了历史学习的心理机制，说明了历史认

知的关键行为；第三部分探讨了不同专业背景对教学的影响、优秀历史教师的核心要素及教学知识；第四部分探讨了课堂、家庭社会与学生历史学习的关系。

（美）山姆·温伯格著，曲鑫译：《美国历史教育的困境》，格致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本书是斯坦福大学教育和历史教授山姆·温伯格对于美国历史教育沉痾困境的深入思考。山姆·温伯格认为美国历史教育已经陷入了这样的两难困境：或是让历史教育延续枯燥无味地死记硬背，或是轻易地把历史教育的权力交给互联网。通过大量的实例和多年来的教学实践经验，作者批评了当下的美国历史教育模式，并提供了一份他和他的同事是如何在这样一个互联网时代进行历史教育的范例。

（英）乔·莫兰著，陈后亮、宁艺阳译：《跨学科：人文学科的诞生、危机与未来》，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

内容简介：乔·莫兰以深厚的学术史意识，探讨了我们将知识组织成学科，以及当旧的思维方式变得过时、不相关、不灵活或有了排他性时，如何将其重组成新的知识结构和联盟，或者说是“跨学科”的形式。作者讲述了跨学科变幻激荡的轨迹，追溯福柯、德里达、拉康、克里斯蒂娃、利奥塔等人的开创性实践，探讨了权力理论、女性主义、酷儿理论、精神分析、历史主义、生态批评等如何为人文学科打开全新局面。人文学科本质上是跨学科的，因为它们关注的是人类凌乱、无边界、无算法规则的状态，旨在研究人类创造意义的整个杂乱过程。所以我们需要通过跨学科来寻求改变与超越，鼓励学科之间的交流，并对组织知识的方式保持开放态度。

二、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论文提要

(一) 通论性论文

瞿林东：《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论中华民族具有突出的统一性》，《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23年第6期。

摘要：中华民族具有突出的统一性，是由历史发展的多重原因促成的。统一性的史前基础和初始文明，以及有利于统一的地理环境是客观条件。从主观条件看，统一，是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是中华民族坚定的政治诉求，是中华民族各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主流，以及历史文化认同的传统作为中华民族统一的推动力，使中华民族的统一性成为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结论。

杨共乐：《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历史取向》，《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23年第6期。

摘要：建立在中华文明连续性基础上的包容性，具有聚多元、凝共识、固根本、助绵延之作用。“尚和合”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核心内涵；“和而不同”的共生秩序则为中华文明包容性之历史取向。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来自于中华各民族的实践，也来自于对中华各民族实践成果的总结。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受制于文明的主体，但又促使文明的主体与时俱进，并由此创造出适应时代发展的更高的文明。

陈其泰：《对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思考》，《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3期。

摘要：史学理论学科对整个历史学科具有指导意义，这是被学术史的大量事实所证明的。回顾已往走过的道路，从中获得智慧和启示，对于当前如何在唯物史观科学原理指导下，努力推进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推进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是新时代历史学发展的迫切需要。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向，中国历史发展的壮阔道路和生动史实为我们提供了广泛的研究课题，中国史学的优良遗产为我们提供了思想营养。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努力发掘和总结历史学整体层面和诸多分支领域层面的课题，做出精当的概括，为发展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和增强“文化自信”贡献力量。

夏春涛：《加快构建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三大体系”》，《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1期。

摘要：中央在四年前批准成立中国历史研究院，为何专门成立历史理论研究所？作为中国历史研究院唯一新建的研究所，该所名称为何定为“历史理论”而不是“史学理论”？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的学科布局有何特点？加快构建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三大体系”，存在哪些短板、须突破哪些瓶颈？作者尝试结合牵头组建历史理论研究所的体会，就上述问题谈点一得之见，希望大家能共同思考、推进研究。

杨艳秋：《新时代中国史学理论研究：进展、挑战与方向》，《求索》2023年第2期。

摘要：新时代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朝着构建中国特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方向不断前进，取得了一系列积极成果，但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新时代的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应自觉肩负起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的重要任务，进一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研究，建设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方法论，建立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发扬中国史学优良传统，发掘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坚守中国史学立场，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

廉敏：《建构中国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处理好三个关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12月4日。

摘要：中国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涉及诸多方面。学界已从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继承并发展以往史学理论的成果、借鉴中国近现代史学在有关问题上的经验等多个角度进行了讨论。其中，中国近现代史学的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反复思考、深入总结。若论中国近现代史学更为宝贵也更为根本的垂鉴，应当是正确处理中国史学与传统史学、外国史学及现实实践的关系。由此，建构中国史学自主知识体系，也应当自觉处理好这三个关系。

赵轶峰：《历史学的性质、方法、目标及其他——答成一农教授》，《史学月刊》2023年第3期。

摘要：成一农教授通过批评历史学实证研究提出，历史事实不具有客观性，历史事实不可证明，历史学不可能求真也没有必要求真，历史学的目的是造成读

者以为真实的说法来影响其行为。成一农教授论说的前述要点存在偏颇，需要仔细辨析。历史事实具有客观性，大量历史事实是可以证明的，历史学必须求真，造成读者以为真实的说法来影响其行为不是历史学的目的。成一农教授的论说方式中运用了误导性的自设闭环，多处自相矛盾，对历史学与科学哲学的关系、历史学论证的逻辑也有误解。

周积明：《历史认知·历史实然·历史诠释》，《河北学刊》2023年第4期。

摘要：历史认知、历史实然、历史诠释是历史研究的核心概念，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冲击下，有必要以新的视野和新的眼光重新对它们加以梳理和界定。历史认知是人的文化实践活动，而人的文化实践的多样性，其栖身的社会环境与生活形态的多样性，必然导致历史认知的多样性，“横看成岭侧成峰”是历史研究中永恒的图景。但是，历史认知并非无边际的想象，它必须受制于历史实然，必须严格限制在史料允许的空间。因为，我们不同于后现代主义理论者视历史为一种虚构的存在，一种文本，而是坚定地相信，过去曾经发生过并肯定发生过，并确信我们有可能在相对真实的意义上重建史实；正是由于相信历史实然是存在的，而非后现代理论所认为的历史书写只是一种文学想象，因此，我们追求基于史料基础上的“真实”，相信“历史遗迹”比“证词”更有效，“原始”证据比“二手”证据更有效，并致力于借助“原始第一手史料”和“二手史料”的综合、比照和分析，重新获致历史的合理性解释。历史学家的职责不仅在于“赋予过去的事件以实在性，也赋予它们意义”。因此，诠释是历史研究的灵魂。但是，历史学家的工作特点是“事后认知和回推立论”，非常容易陷入“历史辉格主义”，从“过去”中发现现在，由此导致一系列历史诠释中的偏误。

张耕华：《什么是“历史解释”》，《历史教学》2023年第6期。

摘要：历史一词有两个含义：一是指过去的事，二是指对过去事的研究。所以，历史解释也就可以解读为：以历史为对象的解释和历史学的解释，而两者又彼此纠缠、互相影响。历史解释是历史学的解释，而不是其他学科的解释。历史解释宜基于必要的前提，演绎解释的某些省略，会给我们的辨别工作带来困难。

单传友：《新时代历史唯物主义话语创新的三重路径》，《天津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

摘要：话语创新与时代任务内在关联，必须从时代的主要任务出发讨论哲学话语创新。只有在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中才能凸显话语创新的内在逻辑，只有将回溯式梳理和前瞻性展望相结合才能揭示话语创新的意义。新时代历史唯物主义话语创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批判意义上的返本开新，旨在破除传统观念的束缚，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初话语。二是探索意义上的激活创新，旨在回应时代问题，挖掘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资源，拓宽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空间。三是建构意义上的综合创新，旨在将现实经验提升为话语建构，从特殊性上升到普遍性，建构当代中国历史唯物主义新形态。

钱茂伟：《历史记录与历史研究：历史文本的初生产与再生产》，《河北学刊》2023年第6期。

摘要：在今日“历史研究”一统江山的时代，可增加“历史记录”。为了防止“历史记录”理解出偏差，又找到了“历史回顾”。为了说清楚历史记录与历史研究之分，提炼出了“历史文本初生产与再生产”一对概念。历史记录与历史编纂，是传统中国史学的主流分法。前代史领域只有历史研究，而当代史领域会有历史记录与历史研究两类。“历史记录”是“无中生有”的历史文本初生产活动，是一种文本建构机制。历史记录是增量研究，历史研究是存量研究，是“有中更优”。提升历史记录的位置，凸显“历史记录”的重要性，可以丰富历史学活动的想像空间。可以实现当代中国历史学工作重点的转移，实现人才培养重心的转移。加强历史记录研究的最好办法是建设一个历史记录学科，然后采取相应的有效步骤与技术。

于沛：《历史思潮初析》，《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2期。

摘要：所谓“思潮”，指某一时期内在某一阶级或阶层中，反映当时社会政治状况，而有较大影响的思想倾向或思想潮流，如潮水那样汹涌起伏；亦指不断涌现的思绪。任何思潮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其产生和发展离不开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社会条件。历史思潮，则是这一切在社会历史矛盾规律性运动中的体现或反映。历史思潮往往在总体上表现出世界性的主题，如大航海时代后的“世界历史”思潮、现代化思潮、全球化思潮等。这些思潮多产生广泛的世界历史性影响，同时又在不同时代的流变中，因受其直接遇到的历史环境的制约，呈现出形形色色的社会性思潮的内容（社会思潮），在一定时期内得到广泛传播，并不同程度地

深入到、影响到人类社会生活各方面，如精神的和文化的各领域（学术思潮）等。

乔治忠：《略论社会文化思潮与历史思潮》，《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2期。

摘要：社会思潮及其形成机制在人类社会的政治史、社会文化史上，在一定社会背景和社会矛盾的积累下，常常会出现一种“思潮”，即群体性的思想、认识、价值观、诉求和呼吁的潮流，涌动于社会、作用于社会，对历史的发展形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其性质和形成机制，是学术研究中值得注意的问题。在中国，社会思潮的不断涌动和发挥显著的作用，主要是近现代时期的现象。广义而言，任何一项在社会上占据一定影响力与舆论势力的思想和理念，兴起时都可以视为某种思潮的萌发。

尤学工：《社会变迁与历史思潮、史学思潮的递嬗》，《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2期。

摘要：历史思潮就是人们对社会变迁所做出的回应和思考，而当其主体为史家并以史学的形式做出反应时，就形成了史学思潮。史学思潮与历史思潮是同源甚至是同一的，所不同者在于思潮的主体和呈现形式有所区别。历史思潮和史学思潮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社会变迁对人们包括史家提出的要求，二是人们包括史家对这种要求的感知程度以及所能获取的思想与社会资源，三是社会各界对新思潮的认同程度与回应方式。中国近现代史学回应社会变迁的方式大体有三种：一是以经世致用为旨趣，以中学为根基而灌注新知，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社会危机。晚清经世致用思潮、国粹思潮为其代表。二是以西学构建科学史学，以史学转型为社会转型奠定历史观念基础，“新史学”思潮和科学实证思潮是这一方式的主要代表。三是融合中西，在史学与现实的互动中持续推进中国现代转型，新人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为其代表。中国近现代各种史学思潮的涨落断续，始终与社会变迁的节奏保持一致，并使其与历史思潮保持明显的同一性。史学流派既是历史思潮和史学思潮的产物，也是其重要的推动者。不同的史学思潮会造就不同的学派，同一史学思潮之下，也会因为对时代需求的回应方式的差异、史学取向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学派。历史思潮、史学思潮与史学流派是共生共存的关系，思潮为学派的形成创造学术生态和社会环境，学派则为思潮涨落提供内驱与推动。二者的消长共同受制于社会的变迁。

张旭鹏：《历史距离与现代历史意识的嬗变》，《历史研究》2023年第2期。

摘要：作为过去与现在关系的一种表达，历史距离体现过去与现在发生分离乃至断裂，进而获得不同的时间属性。而作为现代历史意识的产物，历史距离指历史学家与其研究对象之间被认可的时间限度，是历史学家认知与探究过去时应遵守的原则，也是历史认识和历史研究保持客观公正的前提。在现代阐释学和分析历史哲学，尤其是奥克肖特“实用的过去”观念影响下，过去与现在的关系得到重新解释。特别是“过去的在场”理念出现，进一步打破了过去与现在的界限，不仅让历史距离消失，也赋予现代历史意识更丰富的内涵。

孙国东：《阐释政治学与历史的公共阐释——对历史政治学的阐释学检视》，《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3年第1期。

摘要：当下中国兴起的“历史政治学”与当下西方的“阐释政治学”有着相近的旨趣，都主张把历史带入政治分析。“阐释政治科学”和“阐释政治哲学”分别蕴含着社会科学和实践哲学导向的历史阐释，并分别与社会科学和政治哲学导向的历史政治学路向大致对应。现代条件下的历史阐释事关政治共同体在伦理—政治层面的集体性自我理解，具有内在的公共性。历史政治学应当遵循“双重对话”的阐释学逻辑，推进关于历史的公共阐释，促进中国关于现代政治秩序的自我理解，并在充分内在聚合的基础上赢得普遍的外在承认。

杨天宏：《中国文化中的“形上”与兰克史学中的“虚质”》，《史学月刊》2023年第1期。

摘要：中外传统史学均讲究依据事实材料重建历史，同时看重形而上的历史思辨。西学东渐之后中国史家渐离传统，加之学习西学过程中部分学人对兰克的误读，只注意到兰克史学理论中被其中国传人不恰当表述的“实证”一面，忽略了兰克的历史哲学思考，致使研究出现忽略“虚证”的偏颇。本文致力于梳理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形而上的学术思想资源，同时发掘被严重忽略的兰克史学对史料的超越，提出历史研究须虚实结合，但在中国史学的研究现状下，则应适当偏重形上思辨，注重“虚证”，以提高研究成果水准及研究者的学术段位。

晁天义：《中西史学的结构性差异》，《山东社会科学》2023年第8期。

摘要：中西史学呈现出鲜明的结构性差异。西方史学在结构上体现为主客体

因素在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领域的二元对立，其结果是在历史学的实践与理论中产生一系列矛盾和分裂。与此不同，中国史学内部则呈现为修辞、史实、思想在史著、史家以及史法方面的三元统一，其结果是在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求真、求善与致用相互一致。中西史学的结构性差异，源于中西文化传统中的两种不同二分法，它是中西思维方式乃至中西文化类型差异的具体体现，二者不存在绝对的高下优劣之分，相反有相互借鉴、互为补充的可能。正确评价中西史学的成绩和贡献，综合吸收两种不同史学传统中的丰富养分，有助于深化当代历史研究，推动当代历史阐释学建构。

张西平：《跨文化互动——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方法》，《国际比较文学》2023年第4期。

摘要：域外汉学作为文化间的学术体系，对其如何展开研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学界多有分歧。本文认为目前的海外汉学研究有三种路径：国学研究路径、学术史研究路径、比较文学研究路径。第一种路径重视海外汉学家自身的研究内容，考查他们提供的知识是否正确，这是从国学研究的立场出发，从中国文化本位立场出发的。第二种路径重视汉学本身发展历史的脉络，将汉学作为一种学术体系，重视它的师承、知识衔接的关系，这是一种学术史的立场，是从东方学学术史立场出发的。第三种路径注意海外汉学的变异性，它作为一种西方知识体系的内容，它的表述和观点是如何受到本国文化影响的，这是从比较文化立场出发的。“跨文化互动”的研究海外汉学的模式，将全球史从注重经济互动、疾病传播等研究扩展到“精神世界的互动”，“文化间的互动”。海外汉学的存在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文化的世界性以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及其他文化的互动，这种互动不仅仅是简单的知识的扩散，而是中国文化作为东方的智慧进入到西方文化或者其他文化的发展历程之中，这样对海外汉学的研究不仅仅是在东方学研究范围展开，实际上进入到了西方思想史、文化史或者对象国思想史、文化史研究之中，从而揭示出中华文化文明的世界意义。这是中华文化在精神世界上与西方或者其他国家最为深刻的互动。

杨艳秋：《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若干认识》，《近代史研究》2023年第2期。

摘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要坚持守正创新和问题导向的观念和视角。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也需要结合中国特色民族文化发展的实际，要有“破”的勇气，坚守“正”与“新”的价值准绳，才能有“新”的树立。而在对传统文化破与立的进程中，只有坚持问题导向，密切联系实践中的实际，守正创新才有真正的附着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王学典：《东方历史文化传统与中国式现代化路径的选择》，《济南大学学报》2023年第3期。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当代中国的国情是人口众多，治理难度大；多民族且各民族多各自聚居，拥有自己的历史、语言、文化；中国是一个长历史的国家，拥有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历史文化。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以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必然前提。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形成全新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理论为主体，儒家大一统的社会秩序观，由小康而大同的理想追求和修齐治平、天下为公的社会责任意识等，以及儒家举贤任能的政治治理实践、道义经济理论、天下主义的社会建设抱负，可视为儒家的社会治理理论，这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治理理论相契合，也与当代中国现代化社会治理实践相适应。因此，思想理论界、学术界应共同努力，建构完善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以期中国现代化事业行稳致远。

王凜然：《人类世科学与中国史研究》，《学习与探索》2023年第12期。

摘要：21世纪以来，“人类世”逐渐发展成为国内和国际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广泛关注的前沿科学领域。但历史学，尤其是中国史学科在该领域的话语较为孱弱，直接以此为主题展开的知识生产也相对稀薄。中国史学者参与人类世研究既可为更加整全地理解人类世科学提供助益，也会反哺中国史学自身成长。在本体论层面，大气、水、生物、岩石等与人类世密切关联的地球圈层和中国历史过程存有相关性，这提示着我们历史的主体并不单一；在认识论层面，在人类世概念框架下，集矢于中国现当代历史进程中的人类活动与地球系统之间

存在复杂的交互反馈，人类世将不再仅是中国史研究可有可无的背景板；在方法论层面，人类世这一新路标会指引中国史学科与地球系统科学等自然科学加强合作，为中国史学提供理论方法上的启迪。

王涛：《数字史学不可缺省价值判断》，《历史评论》2023年第2期。

摘要：数字史学为学者的工具箱提供了一个新的选项，至于这个工具是否称手，需要研究者不断返回历史语境，时刻观照历史研究的初心。让数字史学以一种“谦卑”的方式参与到历史知识的生成、传播与解释中，才能发挥其特有的效能。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飞速发展且丰富多彩的时代。历史学者不应仅仅作为旁观者去见证时代发展，更需要深入理解、研究时代，积极回应时代之间，不断推出具有思想穿透力的优秀成果。

（二）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论文

王震中：《古史辨的贡献和局限与上古史的重建》，《文史哲》2023年第5期。

摘要：站在一百年后的今天来反思，古史辨派有贡献亦有局限，贡献与局限每每交织在一起。例如，顾颉刚说组合的“三皇”出现在秦汉以来的文献是对的，然而组合中的“三皇”里的一个个“古帝”式人物却出现在战国时期，并非从秦汉才开始叠加上去的。再如，古史辨派说五帝并非一系是对的，但对《国语·鲁语》《礼记·祭法》乃至《史记·五帝本纪》为何要把有虞氏和夏后氏等都说成是以黄帝为其远祖并没有做出科学的解释。实际上这主要是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民族融合造成的，五帝所代表的族群属于自夏代以来的华夏民族的组成部分，在民族共同体的意义上他们都同属于华夏民族成员，只是有一个形成过程而不是自古一系而已。顾颉刚“四个打破”中“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说真正的“大一统”出现在秦汉是对的，但对夏商西周时期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国家形态结构所显现的王朝国家的“统一性”是没有认识的。在古史人物究竟是人还是神以及“神化”和“人化”问题上，古史辨派没有考虑到古史人物中人名、族名、图腾名、神名是可以同一的，也没有考虑古史人物及其族群名号的沿袭性和神话传说故事的“时间深度”问题。总的来说，古史辨派“破有余而立不足”，当今学界在分析古史辨派的贡献和局限的同时，有必要提出重建中国上古史的系统考虑。

朱露川：《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演进路径和发展趋势》，《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2期。

摘要：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遗产，其具体路径及发展的大趋势是从千年史著批评的积累和启示，走向史学批评的广阔空间和理论升华，即从评论史书到全面地评论史学，再到理论层面史学批评的广泛展开，并形成方法论，对当代史学发展多有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探讨、揭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深入发展路径及其规律，有助于学界更清晰地认识中国传统史学何以能够不断生长出关于自身构成的知识体系、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

张玉翠：《司马迁历史观研究的再审视》，《河北学刊》2023年第6期。

摘要：以往关于司马迁历史观的研究，大致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对司马迁历史观理论属性的认识，有混淆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偏差；二是存在扩大历

史观概念内涵的倾向，把本不属于历史观范畴的问题也纳入历史观的讨论中。以上问题的存在，最本质的原因就是学术研究学理性思考的忽视，因此，对历史观理论属性的辨析和概念内涵的界定，有助于我们对司马迁的历史观作出更为全面、准确、恰当的总结和评价。以此为基础，可将司马迁的历史观大体归纳为五个方面：“综其终始”通古今，历史具有联系性；经济活动影响社会发展；“无成势，无常形”，历史是在发展变化中不断走向进步的；“物盛则衰，时极而转”，历史是一个不断盛衰转变的过程；历史趋势不可抗拒。

沈相辉：《“实录”本义新探》，《史学月刊》2023年第7期。

摘要：“实录”是扬雄对《史记》做出的重要论断，影响甚大。古今学者多将其视为对史书的至高褒奖。但若回归《法言》文本语境及汉代文化语境，从经学、史学等多角度重新比较和审视扬、马异同，便可知此乃扬雄以《春秋》笔法对《史记》所下的微辞，后经班固改造才从贬义嬗变为褒义。司马迁据事立论，论随事变，所以《史记》在义理方面体现出“杂”的特征。扬雄则将孔子学说作为至上且唯一的标准，据理论事，故《法言》长于义理。“实录”之说，固然肯定了《史记》记“事”之长，但主要是批评其取“义”之失，这恰是扬雄作《法言》以纠《史记》的基础。扬雄拟经，试图辞辟诸子而“折诸圣”，故作为“实录”的《史记》无可避免地遭到“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的批判。而在史学逐渐脱离经学的过程中，以求实传信为核心特征的史学传统深受后世推崇，故“实录”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褒义之辞。“实录”含义的嬗变反映了经、史分离中的一些重要特点，在学术史、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路新生：《历史美学中的“类”与“典型”——兼析〈后汉书〉“类传法”》，《江西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

摘要：以历史美学的规定性为视角，“类”与“典型”相通。中国传统史学的“类传法”表现出“类”与“典型”的诸多面相。《后汉书》继承了《史记》《汉书》的类传法体制又有所创新，其以“类”传人，旨趣落在以“多”见“一”，通过“类”的集中让读者识别“善类”与“恶类”，具有历史美学规定性之诸多特点，值得当今史学界在鉴赏的同时深思再深思。

胡祥琴：《“汉魏故事”与曹魏政权合法性的构建》，《史学集刊》2023年第5期。

内容简介：所谓“汉魏故事”是指曹丕通过禅让方式获得刘汉天下的历史事件。无论陈寿《三国志》还是裴松之注，皆站在曹氏立场叙述这一事件，裴注援引《献帝传》更是以冗长的篇幅记述了禅让的整个过程。这一历史书写体现了曹魏禅汉的理论主张，即借助尧舜禹禅让故事阐释“天命不于常，帝王不一姓”等易代思想的历史合法性。该书写极力彰显曹丕才德，试图从理论上阐明非血缘继承的合理性。“汉魏故事”折射出的曹魏代汉理论表明，先秦以来政治文化中的“尊贤”与“亲亲”这对看似矛盾的政治理论，在现实中被巧妙地加以整合，成为当政者构建政权合法性的理论资源。“汉魏故事”所体现的禅让模式，对此后中国历代政权的更替产生了深远影响。

曹刚华、刘欣宇：《北魏起居注制度新探》，《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4期。

摘要：北魏初期没有起居注官，太和十五年孝文帝始设起居注令史，又仿效刘宋置集书省，兼掌起居注事，改变了两晋、南朝著作郎掌起居注的惯例。这既是孝文帝去除胡化，加强皇权控制在史官制度上的反映，也是北魏与南朝争夺华夏正统在史学上的需求。北魏后期，逐渐形成监、典、修分工合作的起居注制度，但政局动荡导致皇权涣散和集书省地位下降，起居注制度名存实亡。

靳宝：《备南北：〈吴越春秋〉与〈南史〉〈北史〉编纂》，《史学史研究》2023年第1期。

摘要：“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是李大师修史设想的核心，蕴含着丰富的编撰思想。李大师欲以内北外南而又备南北的编年体书写形式，编撰一部南北朝史。李延寿继承、发展了其父李大师的修史设想和编撰思想，巧妙地把《史记》与《吴越春秋》在体裁体例方面相融合，采用内北外南而又贯通南北的纪传体书写形式，编撰完成了《南史》《北史》，实现了以备南北的著述之志。可以说，内北外南这一体例，既是李大师、李延寿站在隋唐立场上维护隋唐以北朝为正统的前提下所选择的，又是《吴越春秋》内吴外越的体例特征带给他们的启示和借鉴，二者高度契合。同时，在大一统和天下一家观念影响下，以及在《吴越春秋》通观吴越、总揽内外的编撰思想的启示下，以备南北又成了他们共同追求的著述旨趣。

曲柄睿：《佣书成学：中古知识的结集、生产与传播》，《北京师范大学

学报》2023年第1期。

摘要：中古时期人们通过抄书获取知识，并以改变部分原文的方式生产新的知识。面对大量新知识，需要有新的分类整理工作，类书由是而作。类书以追求知识的来源和数量广泛为目的，将知识以体系化的方式呈现，并对收录的知识作出审核，这是突破原有书籍物理形式和编纂结构限制的行为，进而打破了知识的边界。抄书而形成的节略本较原本似乎更富传播优势，其对知识传播的作用不可低估。

瞿林东：《“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再认识》，《史学月刊》2023年第9期。

摘要：本文对刘知幾《史通·鉴识》篇提出的有关“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欲求铨覈得中，其唯千载一遇乎！”的命题出发，探讨了该命题在历史认识论上的局限性，对于事物的“鉴”之定识，不可作绝对看待，而应作变动的、发展的看待，以符合人们对事物认识的基本规律。本文指出，鉴识是人的一种认识活动，不能把它神秘化，而要把握认识过程的各种条件和要素。

刘开军：《关于〈史通·探赜〉的三重探赜》，《史学月刊》2023年第9期。

摘要：文有文心，诗有诗心，史亦有史心。先秦时人已具有“探赜”精神，开始注重探究史家的思想世界，揭示作史的曲直、意图与诉求。而自刘知幾撰《探赜》篇始，“探赜”从一个常用词语演变为史学概念。《探赜》在《史通》一书中，居于《鉴识》之后。从学术范畴上看，《鉴识》与《探赜》都是讨论史家认识论的文章。精于编次之道的刘知幾，让它们前呼后应，不是没有道理的。不过，在一般的阅读体验中，《探赜》似不如《六家》《二体》《本纪》引人注目，也不像《直书》《曲笔》《浮词》那样让人由篇名就能想到所要言说的主题。《探赜》篇给人的初步感受总有点生僻与晦涩，这恰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陈安民：《〈史通·采撰〉》论历史撰述之得失》，《史学月刊》2023年第9期。

摘要：刘知幾在《史通》卷五中，专立《采撰》等篇探讨历史撰述活动的史料搜集与别择。然而他以“采撰”名篇，却未在本篇正文和《史通》他篇中使用这一概念。这与“直书”“曲笔”“书事”等不同，与“叙事”的出现频度更相去甚远。刘知幾言采撰，秉持以“实录”之史的严格标准，且以此论经衡文。清

人浦起龙称赞此篇“持论正大方严”，并将之作为刘知幾学识卓越之证。不过，自史学“近代化”以来，有针对性的批评则多了起来，或基于“作史料读”而非“作史读”批评其有损史料保存，或基于经史之分而批评其不通经学只专史学，或基于文史不同而批评其以史论文。《采撰》篇本身的特殊之处和后世评价的巨大反差，无不昭示着细读此篇的独特魅力。

朱露川：《“书事”新论：范畴、恒理及其他》，《史学月刊》2023年第9期。

摘要：《史通》是刘知幾毕生读史、治史、评史之精华，反映了作者有关史学自身构成体系的卓识。论者指出，《史通》内篇“各篇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史学理论体系，除《自叙》具有特殊内容以外，各篇在写法和文章结构上也基本相同”，与外篇的“杂乱”形成鲜明对照。内篇卷八设《模拟》《书事》《人物》三篇，均针对历史撰述的内容发论，与同书其他篇章形成呼应。从写法上看，《史通》有追古之风，或是在起首作出“夫述者相效，自古而然”“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的总论，或是上溯至三、五之代王者置官等，又或是援引《春秋》《左传》等经典文献与后世史籍相衔接或相比较，但《书事》篇却径直从东汉荀悦的“立典有五志”论讲起，显示出刘知幾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在对待历史撰述问题上的严肃立场。

杨永康：《唐代政治斗争与武士彠形象之变迁》，《史学史研究》2023年第2期。

摘要：唐代政治斗争对武士彠形象塑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武士彠形象随着政局的演变而变化。在“废王立武”的皇后废立政治斗争取得胜利之后，武则天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通过赠官、加爵等一系列措施，不断推高武士彠的政治地位，令其配享唐高祖庙，武士彠被许敬宗塑造成太原元谋功臣的核心人物。武周革命之后，武士彠被尊奉为武周太祖，为了论证武周政权的合法性，李峤将武士彠建构成舜、禹一样的圣王，其完美形象被推至顶峰。李唐复辟之后，武士彠的政治地位陡然下降，其形象也跌至谷底，最终被史官塑造成“迂诞取媚”的平庸之辈。武则天在政治斗争中的成败，直接地影响着武士彠政治地位的升降，进而影响到官方对武士彠形象的塑造与书写。

汪高鑫：《易学视域下的司马光史学思想》，《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

版)》2023年第2期。

摘要:司马光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也是卓有成就的易学家。司马光丰富而深邃的史学思想,是以其易学思想为哲理基础的。他从“变而通之”的易学变通思想出发,肯定只有变通才能促成事物的发展,变通需伺机而变,变通的原则是“守道不守法”;以此关照社会历史,则重视“通古今之变”,肯定历史变易是“自然之理”,历史变易是盛衰之变,历史变易旨在革除弊法,而礼义纪纲之“至极之道”则亘古不变。他从易学天人整体思维出发,肯定易道“始于天地,终于人事”,认为“吉凶有命”,而“命”乃“遇时”,提出“修己以俟命”的主张;以此关照社会历史,则强调“僭失”天人之分必遭“天灾”“人殃”,积极宣扬重人事思想,以不书怪诞迷信作为历史撰述的重要原则,肯定仁、明、武“人君三德”是决定历史“治乱、安危、存亡之道”。他的易学“中正”观赋予“中正”以“化之本原”的本体论、“德之嘉”的道德论与不偏不倚的方法论意义;以此关照社会历史,则肯定人君以秉持“中正”之德而受尊位,“中正”是实现君臣和睦、君民同心“、上下交相爱”的根本方法“、中和”之德是人君修身、治国的“大本”和“达道”。

吴凤霞:《辽代记注官初探》,《史学史研究》2023年第2期。

摘要:辽代因修起居注而设记注官,但《辽史·百官志》南面朝官所列起居舍人、起居郎并不是记注官,所谓的“起居舍人院”也并不存在。辽代的记注官为使职化差遣之职,由牌印郎君、翰林都林牙等兼任。牌印郎君属于皇帝身边近侍,隶属于牌印局,翰林都林牙(总知翰林院事)属于朝官中的文官,可能隶属于大林牙院。辽代记注官皆以契丹文化人充任,这与辽代皇帝为中心的政务运作系统普遍使用契丹语有关。辽代记注官所编《起居注》失之于略,根源在于诸司供报送录制度不健全,以及记注官听闻议政的权力有限。辽代记注官之设,既弘扬相延数代的编修《起居注》传统,也具有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特点。

汪高鑫:《易学与朱熹的历史变易思想》,《求是学刊》2023年第5期。

摘要:朱熹是宋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易学家,在史学和易学两个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朱熹从《周易》的变通思想出发,提出了系统的历史变易思想,认为“阴阳流变”是《易》之本质属性,阴阳互变经历从“渐化”到“顿变”的过程。从这一易学思想出发,他提出了系统的历史变易论:肯定人类历史的起源是

理与气“妙合”的结果；历史发展呈现出质文互变规律和“渐化”到“顿变”的过程；只有圣人才能“通其变，使民不倦”。朱熹从“阴阳无始”易学思想出发，肯定《易》之“阴阳流变”具有循环特性。以此解说历史，认为上古以来的中国历史发展即呈现出一治一乱的循环规律，并接受邵雍“宇宙年谱说”，提出历史大循环论，以“一元”为一历史盛衰周期，“一元”结束便是新历史周期的开始。宋代以前的中国历史即为“一元”周期，其中上古三代为天理流行的盛世，汉唐为人欲横流的衰世，而宋代则是历史新纪元的开端。朱熹从“阴阳对待”易学思想出发，肯定阴阳之位永不变易。以此解说历史，肯定三纲五常万古不易，认为人具三纲五常，如同天有阴阳、地有刚柔；历史变易只是变易文物制度之“小体”，而纲常伦理之“大体”是不变的；文物制度的变易也需要以扶持纲常为目的；纲常不变特性决定了历史的可知性。朱熹历史变易思想肯定历史的必变性，努力揭示历史变易规律，有其合理性一面。他强调圣人“通其变”和纲常不易，是一种浓厚的圣贤史观与道德史观。

桑兵：《宋学的历史与历史上的宋学》，《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5期。

摘要：迄今为止，宋学可以大别为三种：一是明人唐枢所说，包含宋代的所有学问，外延宽泛；二是宋代的新儒学，主要是邓广铭及其弟子一脉的主张，虽然涵盖范围居中，出现的时间却最晚；三是宋以下的理学，主要是清人与汉学相对的讲法。如果包括陈寅恪所说的全部宋学或新宋学，则有四种内涵外延各异的宋学，明、清、民国和当代各生成一种。以宋学为中心，梳理一种学说的历史和历代人们对这种学说的认识的联系及分别，以免强古人以就我，进而分层次把握一种学说在历史上的生成演化以及不断重述的全过程，不仅可以深入认识其前世今生，而且有助于揭示其未来走向。经学具有政治、学术、道德三种价值体系，研究需要齐头并进，宋学研究尤其要三箭齐发，相辅相成，学以致用，才能体现济世安民的初衷旨归。贯通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宋学的历史与历史上的宋学通过历史的延续性变化呈现转换。本来难讲的义理之学，可以用汉学的实证精神来讲道理，或用做汉学的办法来讲宋学。

朱露川：《细碎间见其统绪——洪迈〈容斋随笔〉之史学史识见》，《史学史研究》2023年第2期。

摘要：宋洪迈《容斋随笔》所撰千余则随笔中，包含着涉及历代史著、史家

方面的讨论，内容涵盖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四个阶段。本文通过对《容斋随笔》有关史学的零散随笔进行纵向的梳理考察，并对其中重要者作深入分析，于细碎之间抽绎出洪迈学术体系中的史学识见及其思想价值之所在。借助对洪迈论史学笔记资料之二重性的运用，反思其对于认识中国史学之特质的价值。

秦丽：《试论元朝与高丽的官方史学交流》，《古代文明》2023年第04期。

摘要：元朝和高丽王朝建国后都建立了系统的官方修史机构和职官系统，双方存在密切的官方史学交流，表现为高丽国史、实录、元丽关系档案等大量资料流入元朝。但是，其间的交流活动多是元朝在宗藩关系和姻亲关系下单向地从高丽获取资料，且这种活动存在一定的偶然性，受到当时元丽关系、元朝修史活动的制约。同时，元朝向高丽征集的《大辽事迹》等多种资料，配合并推动了元朝本国史、宋辽金三史的纂修等修史事业。此外，也有一些高丽实录、日历由高丽自主带入元朝，并非出于元朝之求书。然而，由于元朝史料传世较少，现存元代文献中罕见这些高丽史籍的踪影。而《元史》“本纪”“高丽传”中的粗疏、错漏记述，也暗示出这些流入元朝的高丽本国史文献，最终并未体现在明初的修史活动中。

周积明：《从道德批评到历史认识——宋至清关于三国正统书写者的评论转向》，《史学月刊》2023年第10期。

摘要：自西晋陈寿作《三国志》以魏为居正，孰为三国正统，历代争执不休。元明之际《三国演义》出，尊刘反曹之正统观深入人心，方为《三国志》以来的三国正统之争划上句号。《三国志》以降，三国正统说虽众，但“皆自善其所见”。惟宋明以来“尊蜀”论者往往对陈寿、司马光为代表的“尊魏”书写者加以道德谴责，斥责他们妄肆私意，崇伪黜真。清代虽延续前代三国正统论中道德批判的余绪，但学术界主流意见却更多地秉持“设身处地”的立场，将三国正统论者置于其身处的历史图景中加以分析。这样一种转变在思想史上的背景是宋明之学与清学的分野，前者高举纲常伦理旗帜，论事论人论史皆以道德裁判，以伦理为标准。后者以平恕为立场，强调“以我之情絮人之情”，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从而标志着史学思想、史学认识的深化和成熟。从全球史的背景上观看，这样一种转

变又与 18 世纪以降西方史学思潮从道德批评转向历史主义的动向不谋而合，这种东西方史学思潮的共趋性为史学理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颇有意思的论题。

孙卫国：《忠义与正统：朝鲜王朝对文天祥的认知与崇祀》，《清史研究》2023 年第 5 期。

摘要：文天祥系中国历史上著名忠义人物，受到尊崇，也成为朝鲜王朝追捧的对象。朝鲜燕行使在北京时常瞻拜文丞相祠，《文山集》数度刊行，朝鲜君臣熟知文天祥生平事迹，成为朝鲜历史人物比附的对象。1750 年，赵显命从北京购来文天祥画像，英祖君臣多番讨论，最终安置在永柔县卧龙祠中，与诸葛亮、岳飞一同崇祀，此庙变成朝鲜之“三忠祠”。卧龙祠建于宣祖年间，肃宗扩及岳飞，英祖再添入文天祥，使之成为朝鲜崇祀中华英烈的重要场所。这与大报坛崇祀明朝皇帝的意义一样，系朝鲜王朝后期尊周思明又一重要象征，宣示朝鲜王朝坚守中华正统。

赵树国：《靖难之役济南战事的历史书写与铁铉忠烈形象建构》，《东岳论丛》2023 年第 3 期。

摘要：靖难之役是明代史上影响颇为深远的政治事件。朱棣登基后，为维护新政权的合法性，篡改史书、钳制言论，使得建文史事扑朔迷离。靖难之役中的“济南保卫战”，系建文帝方获胜的一场重要战役。由于明前期文网甚密，此事鲜有论说。明中叶后，文网渐弛，士大夫李贤、宋端仪、王鏊等人，在采择官方史书、档案及民间传闻的基础上，从诸多方面记述此事。他们的论述在嘉靖以降渐趋融合，形成了靖难之役济南战事的完整叙事。其中，既有真实历史，亦不乏夸张、神化之处。随着私史修撰的兴盛与济南战事历史书写的发展、传播，战役领导者铁铉也被塑造为忠勇双全、铁骨铮铮的忠臣义士，并得到官方的推崇、赞誉。

秦丽：《〈明史·朝鲜传〉的文献来源与编纂方法》，《文史》2023 年第 3 辑。

摘要：殿本《明史·朝鲜传》主要依托王鸿绪《明史稿》删订而成，内容分朝鲜历代沿革概述、明鲜关系编年史两大部分。朝鲜历代沿革部分源自叶向高《朝鲜考》，实抄自二手文献《国朝献征录》；明鲜关系编年记事部分大体据《明实录》填充，并参考《名山藏》等明末史书，其中万历朝鲜之役部分较为特殊，清

初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援朝鲜》的系统记述为其现成的文献基础。在编纂方式上，传文大段誊抄明人旧文，略加删订，叙事及史评大致与明代记述相同，相关改动多属技术性删繁就简、替换忌讳字，故《朝鲜传》很大程度上仍反映了明人观念。由于屡次编修、迭经增删，传文多有舛误，质量实较《明实录》等源头文献为逊，今人在利用时当慎重待之。

惠男：《清代蒙古文史著对“传国玉玺”的书写》，《历史研究》2023年第5期。

摘要：皇太极所获林丹汗“传国玉玺”，对蒙古人而言具有政权更迭的象征意义。清代满蒙文档案，以及《蒙古源流》《金轮千辐》《水晶鉴》等十余部成书于17—19世纪的蒙古文史著中有关皇太极获玺事件的记述表明，在清廷无意以“传国玉玺”促成蒙古诸部承认其统治合法性的前提下，清代不同时期的蒙古文人对“传国玉玺”史事的书写呈现出较大差异。清初蒙古文人集体回避了与“传国玉玺”有关的话题；而随着对清朝文化和政治认同的增强，清中后期的蒙古文人则逐渐站在清朝的立场讲述“传国玉玺”故事，并基于个体经验差异，对玉玺来历、性质以及皇太极获得玉玺的过程等进行了多样化诠释。

王嘉川：《罔敢不持其律：〈史通〉对清修〈明史〉的重要理论指导》，《学术研究》2023年第5期。

摘要：清修《明史》过程中，不但纂修官对如何编修问题的理论探讨往往“读《史通》而兴起”，而且其实际施为亦常常“罔敢不持其律”，无论在史料的广搜博采、慎于择取，还是要求确定统一的修史体例，讲求体例的因时制宜原则，以及对《明史》纪传表志各部分内容的具体探讨，如各部分之间要互相协调，纪传应该记载哪些人物和事件，如何收录诏诰文章和辞赋作品，合传类传人物的分合原则与选录标准，是否保留明代士大夫以别号行世的称谓习俗，篇末史论应该如何设置，其内容的写作原则及其与正文的关系，要求摒弃前人在史论之后另设韵文式赞语的做法等，都明显受到了《史通》的思想引领和理论指导。《史通》对《明史》纂修的影响绝不止于多所借鉴，而是扮演了重要的理论指导角色，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李金华：《章学诚与〈史籍考〉编纂新论》，《南开学报》2023年第4期。

摘要：《史籍考》作为一部大型史学目录著述，其编纂从发端至手稿最终毁

歿，许多官员及士人参与其中。章学诚是《史籍考》编纂的最初提出者与设计者，署名周震荣的《上李观察书》对《史籍考》编纂内容与体例的陈述，乃是章学诚校雠学理论的集中体现，展现出章氏学术视野的高远及其目录学理论体系的融通，对章学诚在《史籍考》编纂中的作用需要重新评估。作为《史籍考》编纂体例的总设计师，章学诚虽然最终未能完成该著，但在编纂该著的过程中，其史学理论不断成熟，史学成果不断涌现。

谢贵安：《中日实录史学比较研究》，《史学史研究》2023年第3期。

摘要：中日两国的实录都是东亚文化圈中的特殊史书，皆针对最高统治者展开记录。中国实录始终以皇帝为记载对象。日本由于最高权力从天皇下移到幕府再回到天皇之手，其实录记载对象也随之变动，出现了既记载天皇，又记载将军的特殊情况，但是始终都以最高当权者为记载对象。在实录修纂机构上，中日皆属官方所设，性质并无二致。在修纂体例上，中日实录基本相同，多采用“编年附传”体。但是，日本实录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德川实纪》分为正编和附录，就为中国实录所无。日本实录在仿照中国实录修纂之时，同时受到日本特殊政治架构和“封建”制度的影响，使其实录在记载对象和修纂体例上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反映出东亚文化圈中史学在从中心向边缘的传播中，会出现接受和改造同时进行的情况。

王记录：《乾嘉考据学的传统与历史学“三大体系”的构建》，《求索》2023年第2期。

摘要：乾嘉考据学秉承“实事求是”的治学宗旨，讲求言必有据，无征不信，在传统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并且深刻影响了近代学术，是“新历史考证学”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考据学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传承与发展。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需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借鉴乾嘉考据学的求实方法、求真精神和批判意识，以“实事求是”为准则、以史料考证为基础，详尽占有史料、严谨考辨史料，同时根据时代变化，吸纳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为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史学注入新的生命力。

屈宁：《冲突下的暗合：论阮元与章学诚的学术交集》，《文史哲》2023年第4期。

摘要：阮元与章学诚虽然学术风格迥异，亦无直接学术联系，但却不乏学术

交集，主要表现为：阮元不仅阅读甚至选刻过《文史通义》，将其作为《国史儒林传稿》的重要史源，而且对清代浙东史学颇为关注，为浙东学人依次立传，与章学诚晚年撰写《浙东学术》的举动正相映照。在史学观念上，阮元提出必须借助历史文本分析的方法，从中体察史家之“命意”，亦与章氏“史意”说相发明。凡此种种暗合，根本上源于二人经史观的契合，尤其是对史学经世价值的高度重视。章学诚强调“六经皆史”，以史统经，阮元亦以史学为一切学问致用之前提，这一相似的史学情结及其所暗含的强烈的现实主义的学术情怀，是阮元与清中叶其他有识学者理解和接受《文史通义》的重要前提，他们构成了《文史通义》最早的阅读群体。不过，阮元对理学思维的排斥，又决定了他对《文史通义》和浙东史学的认知是有限的，甚至是割裂的，他所感兴趣的主要是后者“重史”的观念和“经世”的旨趣，以及部分具体的历史编纂学主张和史传作品，至于章氏那套最为核心的主于逻辑推演和理论建构的偏形而上的“独断之学”，则较为排斥。这一思想局限，是乾嘉时期普遍重材料而轻理论的学风流弊的缩影，也是章学诚生前难以跻身主流学界的主要障碍。

戚学民、唐铭鸿：《论姚永朴〈文苑列传〉对桐城派史的书写》，《安徽史学》2023年第4期。

摘要：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古文流派，而历时百年的清史《文苑传》纂修形成的多个过程稿，有对桐城派史的系统记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清国史馆和清史馆全宗中的姚永朴所撰《文苑列传》，此传展示了姚永朴对桐城派史的纂述之功。姚永朴增立了戴名世、吴汝纶等传，并重纂了方东树、梅曾亮和管同传，重写了桐城派史某些内容。姚永朴的《文苑列传》大部分未被采用，但不失为桐城派史的珍贵文献。除了刊行的《清史稿》等显明成果之外，《文苑列传》等史料进一步佐证了桐城派史的厚重。

（三）中国近代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论文

乔治忠：《中国历史学“无奴派”思潮的理论剖析与当下审视》，《河北学刊》2023年第1期。

摘要：1979年史学界兴起的“无奴派”思潮，对当代中国史学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中国的“无奴派”与西方公然反对历史唯物论、否认历史发展具有客观规律的学派不同，是表面上遵循马克思主义，却主张五种社会形态演进历史规律的学说既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也不合乎历史事实。他们以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方式进行理论操弄，集中地否定奴隶制社会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其手法是给奴隶和奴隶社会私立一个片面、绝对、狭隘、僵化的标准，从而将世界许多地区的上古时代排除在奴隶制社会之外；用颠倒时空的方式，把马克思评议近代历史状况的论述，移用到古典世界；随意解释经典著作的内容，而不惜违背学理逻辑；甚至有移花接木、厚诬恩格斯的不端行为。从理论上阐明“无奴派”违反马克思主义，揭出其理论操弄的错误和荒谬，是十分重要和非常迫切的工作，非此不足以申正论、正视听，消除史学界许多学者的迷茫和彷徨，将历史学导向健康发展的轨道。

张越：《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与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社会科学》2023年第6期。

摘要：重新建构中国史学学科体系在中国近代史学新旧转型中占有重要位置，“整理国故”运动中试图以“中国文化史”中的各种专史作为现代学术分类中的不同学科取代“国学”，是近代历史学学科化的主要推力之一。中国近代史学学术体系则以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为主导，以史料考证为基础，以吸纳古今中西史学理论与方法为特征。而中国史学话语体系是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展现系统，掌握史学话语权极受近代史家重视。中国近代史学在以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主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方面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值得关注的成绩和值得借鉴的经验。

胡逢祥：《中国史学传统及其近代转型之路》，《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4期。

摘要：史学作为中国文化中历史最为悠久的一门学术，在长达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深固的传统。降及晚清，随着传统社会走向衰败和西

学东渐的文化冲击，史学的发展也日益陷入困顿：观念的陈旧、视野的局促、方法的凝固和社会功能的明显缺失，无不在迫其展开一场革新自救，以应世变。以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涌起为启程标志的近代化转型，便反映了这一时代趋势。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最初虽有国粹派、学衡派和新青年派等围绕着“西化”还是坚持本土传统文化为主体的建设思路展开过争论，但争论的结果，“西化”派显然占了上风，并由此成为史学近代化的主流路径。西方学术走出中世纪的近代表征，不外以人本主义取代神意史观，力求摆脱对宗教神学的依附关系，建立起独立的学科地位；提倡怀疑精神和科学理性，破除蒙昧主义，借助自然科学方法，树立“无征不信”的治学规则。循此路径，“新史学”把“史学革命”的重点首先集中到改变旧史观念方面，即反对维护君主专制的正统观及其史体、历史循环论和复古观，主张以西方进化论认识整个历史，提倡用近代民主价值观臧否史事人物。这也是梁启超全面批判旧史学的基调所在。但也应看到，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之路又与西方存在着一定差异。

谢贵安：《中国传统史学在史学近代转型中的中心地位》，《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4期。

摘要：对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认识，“冲击—反应”理论带来的西方主动、中国被动的既定认知，曾对学界产生广泛影响，但实际上，史学近代转型是近代中国人面对西方史学东渐，在传统史学中做出的主动选择。在转型过程中，无论是史学的研究主体（学者），还是研究客体（内容），中国都处在中心地位。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的研究主体，即使是留学欧美的学者，也深受中国传统史学的浸润，持有中国本位的立场，与生俱来地拥有中学眼光；作为研究客体，则主要是在西学参照下，从中国传统史学中选择出来的先进因素，构成学术的新知和方法。中西古今之间的对接和整合，形成了以本土为中心的中国近代史学体系。

刘开军：《中国近代史家赓续传统的三条路径》，《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4期。

摘要：清季以来，政治、学术、文化、思想诸领域出现了规模空前的新旧对峙。新学对旧学的挑战激起旧学各方的应对，接连不断的以“新”或“现代”为名的各种学术文化运动，又加剧了新旧之间的紧张。就历史学而言，早在1902年梁启超的《新史学》已举起“史界革命”的大旗，至1933年朱谦之创办《现

代史学》杂志，仍声称“对于过去的史学也不惜取批判的态度”。更有甚者，讽刺旧史家“妄自倨傲，旁若无人，对于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之鼓吹，与文化史家之新运动，均充耳不闻，熟视无睹，旧的观念仍牢不可破；但现在已完全暴露其落后性，而不为时代所容，甚至有危及史学本身存在之虞”。这种新旧对抗视角下的学术观察与叙述，虽也道出了事实的一个面相，却可能忽略了近代与传统之间至关紧要的关联。传统确曾一度“零落成泥碾作尘”，但它没有消亡，而是以一种强大的惯性形塑了近代。如福柯所言，传统让我们可以“毫不间断地追溯着对起源的永无止境的确定”。那么，传统是如何进入近代史学的？在中国近代史学的萌发与成长中，传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何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成为可能？思考这些问题，对于理解中国近代史学的形成路径，看清中国史学的学术底色，构建新时代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无疑是必要且迫切的。

刘永祥：《近代历史编纂新格局与传统文化应变力》，《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4期。

摘要：伴随中国近代社会和史学的变迁，历史编纂学也迎来一场体系性革新，从编纂旨趣到理论体系、从承载内容到表现形式等，都展露出明显异于传统的新特点。近代历史编纂领域形成的新格局，与西学传播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有的学者将这一过程描述为对西方史学的移植和对传统史学的摒弃，似乎在传统和近代历史编纂学之间形成了一个断层。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有违中国史学、文化和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这段话具有深刻的理论指导意义，提示我们在考察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时，不能只看到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更要看到对本土文化的自觉传承。抽丝剥茧后会发现，中国的史学和文化传统在历史编纂学的近代转型过程中，始终发挥着塑造作用，表现出明显的连续性。对此加以深入考察，有利于对历史编纂学的近代转型形成更全面的认识，也能从侧面展现传统文化面对西学冲击时的应变力。学界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通史家风、公羊历史哲学和民本思想的影响，本文拟从其他几个层面，探究传统元素在历史编纂学近代转型过

程中发挥的具体作用，以期推进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王乐鑫：《清末科举改制中的西史问答》，《湖北大学学报》2023年第5期。

摘要：清末科举改制，常考有关西史的题目。改制期间，考生答题时抄袭西书，拆解新报，持中史框架与本土语汇进行西史知识的“再生产”，其中充满了对西史的误读和想象。虽然时评对考生抄袭西书、新报多持否定态度，但此类西史读写客观上也对中西史学的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晚清中西国力的不对等造成了文化的不均势，一方面，考官、考生在进行历史比较时，不免以西方为参照系，对中史进行取舍，传统历史书写也由此逐渐“失位”；另一方面，学子在运用西史答卷的过程中，接触到“平权”、“民主”、“自由”、“进化”等新名词、新思想。这些西史问答深刻改变了他们的历史世界，客观上加快了“加入”世界历史的步伐，更影响了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化的进程。

刘澍：《晚清士人世界弱国历史撰述的学术价值与特点》，《史学史研究》2023年第4期。

摘要：晚清士人对世界弱国的历史撰述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在国别方面，他们开创了中国人对埃及史、波兰史等国别史的历史记载；在时段方面，他们的视域扩大到古罗马、奥斯曼帝国早期史；在问题方面，晚清士人解决了许多困惑国人几百年的问题，比如佛教在印度的衰亡问题就是其一。晚清士人摒弃了以自我为核心的天下朝贡体系观，逐渐向民族国家过渡。在撰述列强侵略殖民地历史时，他们能识破列强的话语陷阱，从正反两方面分析，有较强的整体感和格局感。无论写强国还是弱国，他们的根本目的还是政治诉求，一些弱国史撰述并非实事求是，而是为了政治诉求的重构。纵有重构，弱国史撰述还是为了中国走向复兴服务，结合本国国情，探索出一条在本国各阶层、各族群拥有最大公约数的改革路径。

章可：《从“史学经世”看晚清西史东渐的知识史和思想史意义》，《天津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

摘要：晚清西史东渐给中国士人带来的，主要并非时下所谓的“西方史学”，而是某些特定的西方历史知识，甚至是片断化、符号化的历史信息和“形象”，因此今日学者宜抛开当下定型的史学命题，重回晚清知识环境，以建构论视角看

待晚清西史知识的形成过程。19世纪末“史学经世”观念改造了“史学”的眼光，时人使用的“史学”一词并非指今日作为现代学科的历史学，而是指基于历史性知识的思考和学理建构的总和，“学从史出”的现象为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诸种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同时，晚清输入的西方历史知识和人物故事也极易被特定思想观念操控。学人基于自身思想主张，对西方历史进行剪裁和重构，将历史进程“模式化”，将历史人物“符号化”，原本丰富的面相被简化。研究晚清西史东渐宜融合史学史、知识史、思想史等多种眼光，方能展现其中的丰厚意蕴。

童杰：《中国史学近代化的一个缩影——以“浙东学派”概念的构建为中心》，《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4期。

摘要：“浙东学派”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初，迄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关于其命名、性质、内涵及定义的研讨从未中断。清末，梁启超最早揭橥了近代学术意义上的“浙东学派”概念。民国时期，又有章太炎、傅斯年、陈训慈、姚名达、周予同、张其昀、刘咸炘、何炳松、邓广铭、蒙文通、宋念慈、张寿镛、钱穆、李源澄、金毓黻等著名学人先后论及“浙东学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持续深化了对“浙东学派”的研究。纵观“浙东学派”百年学术研究，一方面成果斐然，粲然可观；另一方面，“浙东学派”研究史本身的积淀也殊为丰厚，作为学术史与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具备了多维的学术意义与价值。中国近代史学呈现复杂多样化的状态，中西史学碰撞、新旧学问争锋，彼此相互渗透、磨合，在缤纷融合中完成了近代化。“浙东学派”是梁启超提出新史学以后建构的一个概念，同时，因为“浙东学派”承载了诸多传统史学的学理与内涵，抱持不同治学取向的民国学者通过对“浙东学派”的研究来表达各自的学术主张——新文化的拥趸者希望以“浙东学派”为理，沟通中西，改造文明；文化保守主义者则试图以“浙东学派”为名，钩沉绝学，寻求传统学术的近代出路。无论贬斥抑或表彰、谬误抑或精准，各派学者的尝试与努力在客观上都促进了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转型。

左玉河：《本土化、科学化和方法热：民国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基本趋向》，《史学史研究》2023年第1期。

摘要：民国时期的史学理论研究，经历了从输入、移植、介绍西方史学理论

到逐渐领悟而尝试建构中国本土化史学理论的过程。它主要是沿着两条路径推进的：一是以西方史学理论著作为蓝本，接受并综合西方近代史学理论而创建中国本土的史学理论；二是用西方史学理论的基本理念来关照中国史学传统，发掘中国传统史学中适合近代西方史学理论的因素，进而构建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民国史学理论研究，深受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影响，以科学化作为史学理论建构的主要目标，努力建构实证主义的科学化史学。科学化的史学研究，重视历史考证和史实求真，致力于历史学的科学化并强调科学方法，将研究重心集中于科学方法论，出现了史学研究的“方法热”。这种“方法热”趋向，既体现为自觉借鉴并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及社会科学方法，更体现为集中探究狭义的史料学方法，即研究实用性的史料考证方法。因此，本土化、科学化和方法热，构成民国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基本趋向。

祁建民：《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中日唯物史观比较》，《近代史研究》2023年第5期。

摘要：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来自日本的社会主义理论虽然传播较广，但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认识却与日本输入的理论存在重大差异。日本社会主义者的唯物史观带有进化论和机械论色彩，以致形成“革命尚早论”。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以迫切解救民族危亡为己任，在坚信社会主义必然到来的同时积极投身革命实践，掌握辩证唯物史观，为中国共产党成立打下科学理论基础。克服带有进化论色彩的机械唯物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重大课题，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在实践中突破了日本社会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认识缺陷。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中日唯物史观的比较，探讨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如何克服日本唯物史观的缺陷，可以揭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复杂状况，对于阐明中国共产党革命理论形成的艰难过程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独特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何萍：《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眼中的第二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唯物史观创造及其特点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23年第1期。

摘要：中国革命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形态。这个理论形态的创造包括三个维度的内容：一是研究以十月革命为中心的世界革命，确立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这是世界革命的维度；二是研究和吸收第二国

际的唯物史观的思想成果，建构中国的革命史观，这是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时代维度；三是以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的历史与现状，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范式，这是中国史观变革的维度。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在这三个维度的张力中创造了中国革命的唯物史观，进而推进了中国 20 世纪 20 至 30 年代的史学革命，为辩证唯物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左玉河：《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与“三大体系”建设》，《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3 年第 5 期。

摘要：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取得明显进展，继续巩固唯物史观指导地位成为学界共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研究得到稳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理论研究重新受到重视并持续升温，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日益走向深化。推进学科融合，加强哲学界与史学理论界的密切合作，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史学理论研究深度融合，回应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提升理论研究的国际视野，提炼富有民族特色和时代气息的新概念、新问题、新话语，成为加快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三大体系”的基本趋向。

李振宏：《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点想法》，《史学月刊》2023 年第 9 期。

摘要：总结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经验，在基本理论问题上进一步正本清源，对于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具有无可争辩的理论意义。在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中，相对于人类历史活动的性质来说，最本质最重要的方法论，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方法、从经济必然性角度看待社会历史进程的思想方法、从历史联系性角度观察问题的历史主义方法和相互作用方法论。这四个层面的方法论思想，需要化到历史学家的思维中，变作基本的历史思维要素。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还应该抓住这一理论体系中的薄弱环节，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历史认识论研究，并以此来提升历史学家的理论自觉，以保障马克思主义史学更加清醒、健康的发展。

朱喆、王钰涵：《李大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重大贡献》，《学习与实践》2023 年第 9 期。

摘要：李大钊是从改良主义者再到民主主义者，并最终转变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学术之路探求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成功推动了中国马克思

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也为其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李大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重大贡献，集中体现在他对唯物史观框架体系以及中国首个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框架体系的构建。在理论研究工作中，李大钊不仅充分汲取马克思主义智慧，而且坚持将历史研究与中国革命紧密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史学贯穿到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中，从而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李大钊既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开创出一条崭新道路，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发展和创新。

李永春：《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中国化的探索——以〈社会进化史〉为中心的考察》，《党史研究与教学》2023年第2期。

摘要：蔡和森在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的基础上，在上海大学讲授“社会进化史”，整理出版中国第一部研究社会发展史的著作《社会进化史》。蔡和森最早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从家庭家族、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和进化，具体阐述人类社会进化历史，详细阐释人类社会进化的根本原因，科学阐释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不仅对教育青年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走上革命道路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对于译介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产生了深远影响，开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先河。因此，《社会进化史》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中国化探索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维佳、高赐玉：《“整理史料”到“重建史实”——1930年代吴晗的明代社会史研究与清华历史系改革》，《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3年第9期。

摘要：吴晗是20世纪中国著名史学家。1930年代初，在胡适的指点下，他立志做“整理史料”的明代学者。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他一面视保存民族文化为己任，积极参加清华大学明清档案整理工作；一面在清华师友的影响下，研究具体历史问题，超出“整理史料”的治学范围。1934年，吴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由于蒋廷黻对清华历史系师资培养、课程设置、史学教研方向以及育人理念与方法等方面的调整与改革，吴晗由“整理史料”转向“重建史实”，接受“综合史观”，以集团分析法研治明史，尤其偏重明代社会史研究。这对他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史观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李孝迁：《“行动的指针”：战时延安的中国历史书写》，《史学月刊》2023年第10期。

摘要：从1941年开始，中共在延安陆续出版面向各个层级的中国史读物，一方面利用历史知识作为现实行动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要与国民党竞争历史解释权。延安的中国历史书写深受斯大林、毛泽东的影响。《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构成了中共史学的方法论基础，将中国历史改造成普世性的社会发展史；毛泽东直接介入延安的写史读史活动，确立“为民众写民众的历史”“暴露敌人，歌颂人民”“史学配合政治诉求”的叙事原则。随着中共革命的胜利，延安的历史读物，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许立群《中国史话》、叶蠖生《中国历史课本》、张思俊《史地课本》等，从地方推向全国，借助各种管道，层层渗透，形塑了几代人的国史记忆。

杨霖怀、王建华：《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与人民历史的书写》，《党史研究与教学》2023年第4期。

摘要：《中国通史简编》是坚持唯物史观书写人民历史的经典著作。著者范文澜围绕“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这一主题，应用阶级分析法厘定近代前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民内涵，书写生产、阶级、民族三个斗争场域中的人民主体力量，秉持历史主义、以人民利益为标准评价封建社会统治阶级，运用大众风格写史，勉励人民承担不同时期的历史责任。当《简编》中斗争、革命的叙事权威变迁为如今奋斗、现代化的主导话语时，则需要思考如何贯通“生产和生活”“阶级和社会”“民族和文明”，立体书写人民历史，展现人民合力。

李孝迁：《范文澜与郭沫若的隐秘论辩——以西周社会性质为中心》，《文史哲》2023年第1期。

摘要：范文澜主张西周封建论，郭沫若坚持西周奴隶说，他们是1950-1960年代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的领航者。范郭皆陷事先预设的理论藩篱，前者从生产关系入手，后者看重生产力，分别从两条不同的路径出发，论证西周社会性质。他们都在各自的理论架构内找力证，导致双方都无法说服对方。范与郭在论著中长期存在隐秘交锋，吸引了大量学者参与辩论，彼此间构成了一张交错的“对话网”。范郭论辩多由范氏挑起，而郭氏是被动的应战者。他们“你来我往”的隔空较量，不尽是纯学术的，但都高度克制，顾虑对手的感受，事后默默地删改敏感文字，仍属同一阵营内的“争鸣”性质。

李长银：《翦伯赞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初步建立》，《近代史研究》

2023年第3期。

摘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料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翦伯赞初步建立。20世纪40年代中期，翦伯赞相继撰写《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等文章，并结集出版《史料与史学》一书，对史料相关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翦伯赞汲取了刘知幾的传统史学认识与梁启超的实证主义史学观点，但他并不只是重述《中国历史研究法》里的史料观念，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传统史学、实证主义史学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料学。这一工作不仅完善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也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史料学的发展。

高希中：《革命与学术的整合：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世”取向》，《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23年第1期。

摘要：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危机继续加深，国难当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秉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接续古代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成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投身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通过历史研究为中国革命的目的、对象、性质问题寻求答案；其次，积极融入抗战，成为文化抗战的一支生力军；再次，致力于革命的宣传教育，批判和清算侵略史观等错误观点，激发了当时民众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有力声援了抗战。在追求救亡图存和民族独立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史学以整个民族的利益为中心关怀，为民族独立的实现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这种“经世”价值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应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给予认识和评价。

黄令坦：《毛泽东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历史研究》2023年第6期。

摘要：毛泽东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智慧和强大的精神力量。通过考察毛泽东史学思想发展的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可以发现毛泽东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特点、重塑中国历史叙事、丰富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创立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提出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学说、深化阶级斗

争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史学思想，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李勇：《直面批评而矢志坚守：侯外庐史学的朴学传统》，《历史教学问题》2023年第5期。

摘要：侯外庐理论上推崇史学的朴学传统，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其史著中的朴学体现为：引证多，说明简，阐微决疑；使用一手资料，拒用伪史料；研究思想史之前，做好文献整理工作；不厌其烦，究明指导理论中的概念。他遭受“引文多说明简”“错误百出”之讥，是其对以往学界矫枉过正，人们以通俗眼光看待其著作，以及其他各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他心胸宽广，虚心听取批评意见，纠正其思想史著作尤其是《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的引文错误，改变不当提法，遵守凡例，保持体裁不变，体现了对于朴学精神的坚守。侯外庐史著的朴学传统表明了笼统地说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系史观派是不恰当的。

张越：《侯外庐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论析》，《历史研究》2023年第6期。

摘要：侯外庐在李大钊支持下翻译《资本论》。十年译读的经历不仅使他具备了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而且促使他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走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之路。侯外庐“自树独见”地阐释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表现出明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诉求、世界史研究视野、与国外学者的对话意识等特点，大大深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内涵，与今日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目标多有契合。侯外庐学派的学术体系包括中国社会史和中国思想史研究两个主体部分，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领域，贡献了独到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展现了集体合作的研究模式。

刘超燕：《郭沫若亚细亚生产方式观点的形成与反响辨析》，《江海学刊》2023年第6期。

摘要：在郭沫若的认知中，亚细亚生产方式不成其为“问题”。他在实际处理中的化约思维和做法存在明显二重性。有消解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忽视中国社会特殊性、论据单一等不足。郭沫若的观点招致中国社会史论战各方的贬损、曲解。托派借助亚细亚生产方式否定中国存在奴隶社会，进而否定社会形态理论的普适性。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家与郭沫若观点的主要分歧基本限定在学术层面。

郭沫若“沉默”应对外界批评，并非认同他者观点，亦非外部条件干预下的被动选择。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论辩中充斥的盲从域外学者、宣扬国情特殊论等倾向，与郭沫若治唯物史观史学的旨趣相悖，应是他“回避”对话的主要原因。

曹志敏、张秋升：《荣孟源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主要成就——以〈史料和历史科学〉一书为讨论中心》，《南开学报》2023年第4期。

摘要：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荣孟源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史料的搜集、整理、研究和编辑工作，批判继承了中国古代和近代史料学成果，凝结而成《史料和历史科学》一书，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基础。荣氏史料学的主要成就，表现在初步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理论体系，科学论定史料学在历史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明确提出史料的阶级性论断，同时坚持史学研究要实事求是；从史料形式、性质、版本、内容等多重角度对史料进行分类，加深对史料性质的认识；此外，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料考证的内容与方法，将考据、辨伪、版本、目录、校勘、辑佚等传统学术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结合。

张越：《林甘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初探》，《中国史研究》2023年第2期。

摘要：林甘泉提出了事实判断、认识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历史认识“三个层次”说。他本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亦可依此“三个层次”说进行探析。他强调“事实判断”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只有功力之分而没有阶级性”；“认识判断”体现出不同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分歧，明确表示“我仍然信仰唯物史观”；同是唯物史观的学者在“价值判断”上也会有意见分歧，“总是有一种意见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求真务实则成为林甘泉学术思想的鲜明特色，“三个层次”说是建构中国特色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有益尝试。

陈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反思与再出发》，《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6期。

摘要：当前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是一项创造性工作，必须凸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而不仅是对基本原理的推广或应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摆脱普世主义叙事的束缚，在细致缜密的实证研究和经验研究中发现并还原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必须从“苏式”教条的笼罩中真正解放出来，走自己的路，克服长期存在的惯性和惰性；必须以国际化为基础，保持最大的开放性、包容性；中国马克思

主义史学发展离不开对传统史学的批判、改造和转化；回归学术化，走高精尖路线，参与国际前沿问题研究。

陈峰：《中共党史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学科互动》，《中共党史研究》2023年第1期。

摘要：随着“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的设置，中共党史研究独立为一级学科的设想正在逐步落地。党史研究是一个特殊学科，一方面与通行的学科体系不相匹配，一方面又处在政治学、历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三大学科的交汇点上。党史研究独立之后该往何处去，如何开创一个崭新的局面，形成自己的学术特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世所公认的学科？这是今后中共党史学科建设面临的首要问题。笔者当然无力对此进行全面阐述，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党史研究应当将学术化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一级学科的建立为学术化打开了更大的空间，而学术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史学化、向历史学科靠拢。党史研究首先应当遵循历史学的基本规范，构筑自己的学科底线，借以清除和抗衡非学术因素的干扰，这是党史研究学术化的第一步。历史学是党史研究走向学术化之路最重要的盟友，中共党史与历史学两大学科开展深度合作变得更加迫切而必要。

罗检秋：《学术社会史的理论特质与实践路径》，《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4期。

摘要：学术社会史根源于中国文化精神和推进学术史研究的内在需要，旨在超越学科畛域，从社会史视角研究学术的衍生、传播和兴替。学术社会史采用实证方法，多维度地研究学术与社会之间的互缘、互动，重视学术史的民间脉络和变易性，将研究重心从学术的思想史、观念史转向社会史。研究学术衍生的家族环境，学者的交游、结社，尤其是学者的情感及心态史，仍然是学术社会史的重要实践路径。学术社会史显示了方法论自觉，裨益于拓展、深化学术史研究。

谢进东：《民国学界的“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5期。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后现代史学和全球史传入中国，批评“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逐渐成为国内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不过，国内学者的相关批评，主要指向外国学者的世界史研究和书写，很少关注本国学者历史研究和书写中表现出来的“欧洲中心主义”问题。通过梳理为数不多的评论国内学者“欧

洲中心主义”历史观的学术史文献，可以发现，相关研究主要呈现以下两方面特点：第一，在民国时期，就有史家开始对外国学者的“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展开批评，且民国史家的著述本身也存在“欧洲中心论”倾向；第二，民国时期以来，有一些史家自觉地声称批判“欧洲中心论”，却又不自觉地陷入“欧洲中心主义”的泥潭，难以摆脱其束缚。大体而言，晚近学界对国内学者的“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的评论主要涉及的是民国史家，且主要讨论民国史家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只是略带提及民国史家著述本身存在的“欧洲中心论”表现，并未揭示民国学界“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的基本样貌。本文尝试在界定“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内涵之基础上，展现民国学界“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的基本特征、表现与样貌，以期为当下国内史学界突破“欧洲中心主义”的努力提供参考。

晁天义：《“中国无真史说”偏见的形成与终结》，《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23年第1期。

摘要：“中国无真史说”是西方的一个偏见，主要盛行于18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前半期。它是西方人在中国相关知识不足的背景下，以西方传统历史观和思维方式理解中国历史的产物。西方传统历史观的主流，是以特殊性、变化性作为历史的属性，而将一般性、稳定性排斥于历史认知的范围之外。16、17世纪之后，西方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革并以充满活力的面貌迈入近代，中国社会则进入一个相当长的缓慢发展阶段。中西方不同的历史发展状态给当时的西方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影响下，这种印象扩大为对立的两个极端，而中国历史的零星片段知识为西方人将中国描述为与其自身有别的“他者”形象提供了依据。19世纪在西方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在以历史感见长的西方学者心目中，中国作为“没有真历史的国家”的形象最终定型。“中国无真史说”根源于西方的文化偏见，本质则是欧洲中心主义。只有从中华文明内在的发展逻辑入手，深刻揭示和阐释中国历史的独特道路、丰富内涵以及鲜明特质，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话语体系，掌握讲好中国故事的主动权，才能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陷阱。

张越：《顾颉刚疑古学说百年流播的若干审思》，《史学月刊》2023年第5期。

摘要：从顾颉刚先生当年发表“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算起，他的疑古

学说至今已经流播百年了。七大册《古史辨》和八集六十二巨册的《顾颉刚全集》舍括了顾颉刚在古代历史、现代史学、历史地理、民俗学、古籍整理等多方面的开创性成就，但是最引人关注、引发争议最激烈、产生影响最大的恐怕还是他的疑古学说。百年来因顾颉刚疑古学说所生发的各种评价、阐释、研究如滚雪球一样愈滚愈大，成为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现象级存在。本文仅就笔者一直以来对几个具体问题的审思略作陈述，就教于方家。

郭震旦：《古史辨：现代中国史学的记忆之场》，《史学月刊》2023年第5期。

摘要：“记忆之场”这一概念由法国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创造。所谓“记忆之场”，诺拉并未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他只是用这个概念来指代那些有形的无形的今天仍在塑造人们记忆的纪念符号，但诺拉明确指出，“所有伟大的历史著作和史学作品”“所有重大事件和重要观念”都是记忆之场。确实，历史著作记录人类的过往，尤其是一些历史著作，在问世时曾经产生过翻江倒海、天崩地解的社会影响，凝结着时代的精华，它们本身就是最值得纪念的记忆之场。

李禹阶：《论中国古史“‘历史记忆’的层累式整合”：兼论顾颉刚“古史层累说”的是非与启示》，《人文杂志》2023年第7期。

摘要：20世纪初的“古史辨”思潮提出了百年之问，当代古典学、历史学中的疑古、辨古、信古思想均是对其的回应。顾颉刚先生的“古史层累说”是该学术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着巨大的学术启示意义，同时亦存在方法论、认识论的局限。实际上，早期中国具有丰富而“多元”的上古历史，由于传统史学“史以载道”所含蕴的“助流政教”的“资治”功能，古代史家所塑造的文本书写的历史主要是以中原国家“礼义”文化为中心的历史，而少见上古时遍及我国各区域聚落先民的社会活动的史迹记载。“历史记忆”是人类早期史迹的遗留，但是“历史记忆”成为历史文本则有一个被后代史家再加工的创造活动，这种创造活动往往是史家的史学理念对“历史记忆”进行“层累式整合”的结果。我国传统经典所载上古史正是“历史记忆”在“层累式整合”中完成的，它既使史前丰富多彩的各区域文化被融入早期中原国家礼乐文明的历史中，同时也在这种历史书写中保留着中国上古真实史迹的痕迹。

刘江：《顾颉刚与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所)》，《史学集刊》2023年第3期。

摘要：顾颉刚出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所)历史组主任后，一方面为充实历史组的学科建设而广泛聘请人才，申请中英庚款资助并开展学术调查，创办刊物发表学术成果，出版了大量学术著作。另一方面推进北平志的编纂，从各专史材料的整理和研究入手为中国通史撰述作准备，为史学研究会培养了大批学术人才，突破了其地方史学研究的局限，提升了史学研究会的学术影响力。

王应宪：《“感情”和“理性”之间：吕思勉的民族主义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23年第3期。

摘要：民族主义是近代中国重要的社会思潮之一，也是影响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主要因素。新史学家吕思勉承袭了中外民族和民族主义理论，从中国历史情境中理解民族问题，探寻民族主义的思想因子及其演变脉络。他从“西来说”转向“中国本部论”认识汉民族起源，以文化为民族的根柢分析中华民族的特征，运用“同化论”、“外力压迫论”阐述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主义的发生发展。在民族的“感情”和历史的“理性”之间，吕思勉本诸“史事之真”立论民族历史和民族主义，从而追求“真正的历史”。

周文玖：《从科学史学到民族主义史学：朱希祖史学思想探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23年第3期。

摘要：朱希祖是20世纪前期有重要影响的史学家。一方面，他主张运用现代社会科学，跳出党派、民族、国家的偏见研究历史，既考订历史事实，又探究人类进化之律，并把建设科学的史学之理念体现于北京大学史学系的课程设置中。另一方面，他的论著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史学特色，强调民族气节，阐扬民族精神，心系民族兴亡。并且，他的这两个方面主张既存在张力，又具有统一性。由于受“华夷之辨”观念影响，又处在国家危难的形势下，朱希祖史著未能避免大汉族主义的局限。

吴航、高磊：《朱希祖在南明史研究上的成就与贡献》，《史学史研究》2023年第4期。

摘要：朱希祖于20世纪初期排满革命和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的紧急关头，致力于南明史研究，旨在发挥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以激扬民族大义，挽救民族

危亡。他广泛搜集大批南明史籍、整理校勘为善本；在考订方面上，注意考辨诸版本之间的关系，尤重视鉴定伪书、审定作者派系属性，进而鉴定其史料价值与不足；主张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撰成有系统的《南明史》等。这些学术工作不仅整理、保存了大量南明史籍，解决了南明史籍上的众多疑窦，而且为此后的南明史研究奠定了基础和指明了方向，具有重要意义和持续影响。虽然他编纂的《南明史》没有成功，但同样留下具有一定价值的学术遗产。

朱洪斌：《齐思和论中国近代史学之变迁——〈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晚清史学的发展〉校读记》，《汉学研究》2023年第41卷第3期。

摘要：1949年10月，齐思和发表一篇长达三万余字的史学评论〈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以中西史学比较的宏阔视野，梳理从清初迄于1930、1940年代中国史学的演进脉络与发展潮流，对这一时期杰出的史家和史学流派的史观、史法及其学术成就详作评估，系统地阐释推动史学发展的社会政治及学术思想因素，揭示现代史学的专业化、科学化和社会科学化的趋势。他以晚清以降中国现代化转型为思想背景，立足于实证主义史学和欧美新史学的“学科模式”，把近代史学的变迁视为一种连续的进步的复杂运动。但较少被学界注意的是，1980年他修订旧作，仅保留清代部分，改篇名为〈晚清史学的发展〉。改作遵循改革开放以前狭隘的马派史学模式，放弃现代化视野下的史学史意识，导致现代史学演进之架构支离破碎。在史学思想上，无疑是一大退步。作为第三代的现代职业史家，齐思和是中国史学变迁的亲见者、参与者，他对晚清以来中国史学演进的两叙事，不独是个人思想变幻的鲜活印迹，更可作为深入分析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形态的“思想标本”。

王晴佳：《陈寅恪的“体、用”观与其魏晋隋唐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2023年第1期。

摘要：陈寅恪“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之言，为学人熟知，理解各有不同，但其实反映了他对中外文化交流，抱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此处“西学”亦指“虏学”）的基本态度。由此立场出发，陈以魏晋、隋唐史为专攻，希图以史为鉴，指出文化交流的“一致性”：“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但陈并非族裔中心论或汉族中心论者，而是强调胡人、汉人之分不如胡化、汉化更为重要，又指出汉末以来各民族

间的冲突和融合及诸文化间的互动和交流，促成了隋唐的强盛。陈揭示这一阶段历史发展阶段的个别性，为的是以小见大，概括历史演化的通则，表现为历史主义的思维。

张德明：《民国时期姚从吾的史学理论探索》，《史学史研究》2023年第1期。

摘要：姚从吾曾留学德国，深受德国史学方法影响，在史学理论方面也有深入思考。他在《历史研究法》讲义中，对历史学的性质、作用、研究方法及中国历史学存在的问题等都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在历史资料观上，他重视史源学及史料的鉴别、考证与研究，强调对史料的批评与会通，特别重视对一手史料的使用，并在抗战时期注重搜集抗日史料。他还从历史地理学、文化因素等方面对历史进行多维阐释，并向国内大力介绍了德国等欧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动态。姚从吾充分借鉴了西方史学理论方法，并吸收中国传统史学优点，对民国时期史学理论探索作出了一定贡献。

赵庆云：《略论朱谦之的史学理论建构》，《史学史研究》2023年第1期。

摘要：朱谦之在史学理论、历史哲学方面著述颇丰，多有建树，在移植、整合西方理论基础形成的生机主义史观有完整的理论体系，自成一家之言。他虽然强调史学研究中“心智因素重于物质因素”，似与唯物史观针锋相对，但细究起来，他的史学理论建构非但无法绕越唯物史观的存在，且受到唯物史观的启发，始终以唯物史观作为重要参照，从唯物史观中获取思想资源。他强调史家应承担其社会责任，史学研究应有现实关怀，应以“考今”为目的，其所论切中民国史学时弊，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

王妍：《梁启超与内藤湖南对进化论、文明史观的接受与改造》，《国际儒学》2023年第3期。

摘要：进化论和文明史观发源于欧洲，19世纪末20世纪初借道日本而传入中国。中日都致力于将进化论思想融入到儒学与佛教的传统文化框架中进行解释，发展出“循环进化”的理论；同时，进化论在向东方世界传播的过程中，已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扭曲与变异，深受斯宾塞影响的日本学界继承着明治以来“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将其绝对化并滑向了自我中心主义，而中国则逐渐摒弃其中的帝国主义倾向而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在构建文明史学的过

程中，中国以建立民族国家和确立自主性为宗旨，意在鼓舞民族自觉的发展以及国民精神的建设，并寻求中国在世界的定位；日本则以构建本国优越性和排除“他者”为中心，以“天职”这一先验性的话语，设定了日本在亚洲的领导地位。梁启超与内藤湖南分别是中日不同思路的代表。两种各具特色的历史书写也影响了不同的国民性格与集体记忆，其中文化起到比政治更为深刻的作用。

徐国利：《“理乱兴衰”与“典章经制”：吕思勉的传统史书编纂论和中国通史撰述及意义》，《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1期。

摘要：吕思勉在中国通史编纂理论和实践上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对传统史书体裁和编纂作了较全面分析，将其概括为以“理乱兴衰”和“典章经制”两类史实(事)为架构的编纂模式。这种编纂模式虽存在偏重政治史之弊，但能从纵横两方面较全面地反映历史。吕思勉的中国通史撰述批判继承了该编纂模式。他以社会文化史观为指导，吸收纪事本末体和典志体等体裁的优点，创造出综合体中国通史编纂的新模式。不过，该通史编纂模式也存在缺陷，只将史事作为记述内容，忽视了人的历史主体性，未将传记体纳入综合体中国通史编纂体系中。

张峰：《从相知到相离：傅斯年与岑仲勉关系考论》，《史学史研究》2023年第3期。

摘要：傅斯年与岑仲勉是中国现代学术谱系中两位具有重要影响的史学家，两人之关系经历了从相知到相离的过程。岑仲勉早年侧重中外史地研究，志在与国外汉学家交流与竞胜，这种“预流”的学问暗合了傅斯年与域外汉学角逐的理念，于是也成为他进入史语所的入场券。岑仲勉与傅斯年的分道扬镳，表面看来缘于岑氏在史语所中“逾越”中古史而从事上古史与语言学研究，超出了工作范围，实则折射出以傅、岑为代表的现代史家对于采取何种路径建构自身话语体系和推动史学专业化的认知分歧。

舒习龙：《日记视域下张舜徽的历史文献学与学术批评》，《史学史研究》2023年第2期。

摘要：张舜徽先生一生钟情于历史文献学的思考与研究，所作日记蕴含有丰富的校雠学、目录学、校勘学等分支学科的分析与思考。张氏初步建构的历史文献学体制，对改变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偏狭而单一的状况，恢复历史文献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进而推动历史文献学学科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张氏的学术思想形成于民国时代。他对学术本原的追求、识见为高的求索、学术经世的倡导以及博学会通的强调等，都具有鲜明的特色。张氏以史学家的批评视角来评析学术发展中的得失利弊，形成独有的学术批评话语和方法。在张氏的学术思想中，历史文献学是基础，学术批评是其学术品性的表征。

李孝迁：《“忘掉祖国”：伪满国史教科书研究》，《学术月刊》2023年第2期。

摘要：伪满国史教科书是为了配合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而建构出来的一套叙事，强调伪满有三千年独立史，“日满一体”，丑化中国，将伪满虚幻成“王道乐土”，这是日本政学两界共谋的产物。伪满国史最初是为了对抗中国史而存在，其使命是暂时的，日本最终目的是以日本史扩张为伪满历史教育的中心，令伪满国史形同虚设，借此规训东北中小学生形成日本认同意识，而不是为了达成伪满国家认同。伪满国史论述不仅改造东北青年的历史认识，而且对后世影响相当深远。

颜克成、唐淑权：《从〈边疆〉〈史学〉周刊看昆明〈益世报〉副刊的学术研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3年第1期。

摘要：顾颉刚在昆明《益世报》上所办的《边疆》与《史学》周刊，是抗战背景下中国边疆民族研究发展的产物。《边疆》周刊是《禹贡》半月刊停刊后创办的专门研讨边疆民族问题的刊物，继承了《禹贡》半月刊的办刊思路，《边疆》《史学》周刊是顾颉刚“学术救国”的重要体现，两刊之间亦存在紧密联系。学者们运用史学考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拓宽了研究范围，研究成果质量显著提升。其中“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滇缅铁路走向的讨论，各少数民族之间关系及与汉族关系的讨论，僰夷民族种属问题的讨论、土司政治的讨论等，都是在抗战局势下学者“学术救国”理想的真实写照。

王锐：《重思蒋廷黻的帝国主义观》，《史学月刊》2023年第12期。

摘要：帝国主义是蒋廷黻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基于对近代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形式的认同，他认为中国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抵御帝国主义，保证国家主权的完整。但是，蒋廷黻相信一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能够让中国从中获益，近代资本主义体系更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因此，他认为帝国主义并非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而是古今任何时候都存在的现象，并且无涉善恶。基于对帝国主义的认

识，蒋廷黻认为中国要想在这样的国际秩序里自存，需要厉行中央集权，进行自上而下的国家建设。总之，蒋廷黻的帝国主义论，既表明他对近代以来的世界大势颇有了解，又凸显出他对该如何突破旧的世界体系、构建更为平等且公平的国际新秩序的问题缺乏深入思考。

王豪：《唯物史观与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思路的转变：以谭丕模〈清代思想史纲〉为中心的讨论》，《史学史研究》2023年第2期。

摘要：清代学术思想史自清末以来即为近代史家所重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清代学术思想史领域又出现了不少新的成果，其中谭丕模所著《清代思想史纲》即当时较有特点的一部。该书之成一方面得益于当时北京师范大学文史学科对于清代学术思想史的重视，另一方面则是由唯物史观的传播所促成。该书大体赅续章太炎、梁启超对于清代学术思想史论述的思路，从中可以明显看到大学教育影响的痕迹；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该书则不乏新见，这主要由唯物史观所赋予。在唯物史观和时势变化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思想史的写法开始兴起，并逐渐取代学术史的写法，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学术思想史领域的主流。以《清代思想史纲》一书为中心展开的相关讨论，一方面呈现了以大学教学、研究活动为媒介，近代史学研究推陈出新的具体过程，另一方面亦反映了近代以来史学研究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

李振宏：《朱绍侯史学：一个当代中国历史学家的典型案例》，《中国史研究》2023年第2期。

摘要：朱绍侯是当代中国著名历史学家，主治秦汉魏晋南北朝史，是实证史学研究中实践唯物史观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典范。其史学研究的理论色彩，主要表现在坚守实证研究中的整体性思维，重视历史研究的溯源性、过程性考察，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基本立场，遵循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原则四个方面。朱绍侯史学，对当代实证史学研究具有示范意义。

蒋焰：《吴于廑的大历史观》，《武汉大学学报》2023年第6期。

内容简介：吴于廑是新中国世界史学科的主要创始人和奠基人之一，其所倡导的“整体世界史观”被誉为“世界历史新理论在我国的兴起”。其史学创见和相关世界史理论的思考和研究透露出一种大历史观，即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宏大理论指导下，立足于中国和世界变化发展的大背景，在处理局部与整体辩证

关系的前提下，真正从纵深、宽广的大视角观察世界历史全局，通过交叉、比较、综合等研究方法，抓住世界历史发展的核心和主流，总结历史经验和规律，最终关照现实与未来发展大势。这一大历史观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得益于其个人的生平经历和学术积累，并体现在其对世界历史理论体系的思考和构建、对影响世界历史形成诸大历史运动的探讨以及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考察等平生治学中。它在形成原创性的理论成果和独特的学术传统、创立中国特色世界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均具有重要影响和意义。

张连勇：《改革开放后胡乔木对中共党史书写的理论思考》，《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6期。

摘要：改革开放后，胡乔木全面系统地阐述中共党史的重大问题，明确提出中共党史的书写应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科学的政治建设服务，成为思想斗争的理论武器。在对党史问题的阐释上，胡乔木提出，运用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科学论证来阐述党史的各种根本问题，生动、丰富的党史书写应回归党史本身的研究。胡乔木认为，以论代史的书写方式不能反映党史的全貌，只有明晰党史发展的脉络、在宏观叙事过程中展现党史重要人物与事件、重新探究被以往视角遮蔽的历史过程，才能全面、准确地进行党史书写。

葛焕礼：《范式与问题：美国的唐宋思想转型研究》，《文史哲》2023年第5期。

摘要：赖肖尔将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与中国哲学史界的研究认识相结合，形成从佛学转向新儒学的唐宋思想转型叙事，这直接影响到狄百瑞。狄百瑞对新儒学的阐释，又得到陈荣捷新儒家哲学研究的支撑和强化，从而建立起一个颇具影响力的观念史研究范式。自20世纪70年代起，这一研究范式及其叙事受到三种历史主义研究范式的挑战，即刘子健等学者着眼于新儒学正统地位确立的政治文化史研究，余英时、田浩等学者以“探讨具体历史情境中的思想”为旨归的文化史研究，包弼德等学者基于郝若贝、韩明士的唐宋精英转型说而形成的社会文化史研究。这些研究范式及其所涵盖的一些有着复杂异同认识的问题，使得思想史成为美国的中国中叶史研究领域颇具活力的方向之一。

吴原元、于海燕：《从“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论”：美国学人研究

近代中国历史取向的再省思》，《国际汉学》2023年第1期。

摘要：自19世纪以来，“西方中心论”与“中国中心论”是美国汉学界在审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时的主要取向。这两种研究取向有其合理性，但亦都存在偏颇之处：西方中心取向将东方与西方或者说传统和现代视为完全无法并立的两极，并以西方的历史经验为标准考察中国历史发展；中国中心论虽强调中国自身的内在发展，但倾向于从碎片化的元素本身论断传统的延续性，弱化甚至忽略外来因素的影响与作用。自新航路开辟以来，中国已然被拖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之中，因此在审视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时，应将其置于全球史的历史进程之中，从内部与外部两个方向对其内在性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发展演化进行动态化的考察，如此方能真正“发现在中国的历史”。

陈靓：《文化比较视域下的欧洲中国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复旦学报》2023年第3期。

摘要：比约恩·赫特纳以“区域性”为研究对象，对新区域主义进行了方法论的阐释，并做了层次化的研究视角构建。该理论分层的意义使得区域化进程中的五个层次并非以完全更迭的方式进行方法论替换，而是在研究方法中以重叠组合的方式呈现。本文从该研究模式出发，从作为研究对象的“区域性”反向构建区域国别研究的研究范式，并结合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视域说”和美国性别研究中的“交叉性”理论，提出“文化比较视域”下的区域国别研究方法。此外，本文将该方法运用到欧洲中国学研究中，以平行比较、影响比较和交叉视域三个维度，尝试对当前欧洲中国学研究中的视角、对象和范畴进行建构。

郭震旦：《作为方法的柯文：在学术前沿地带刷新中国史》，《史学月刊》2023年第8期。

摘要：在中国当代史学史上，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可谓是一部标志性著作，人们常常将该书所倡导的中国中心观与三十年来中国学术对主体性的追求联系在一起。它似乎是对近三十年由政学两界推动的中国学术从整体上往更具“中国性”方向转型的预言。柯文漫长的学术生涯涉及“基督教与中国”“王韬”“中国史研究范式”“义和团”“勾践故事”等诸多课题，这些课题都有一个突出特征，即带有极强的方法论意识。他总是站在学术前沿，以崭新的前沿理论和方法来刷新中国历史研究，这让他的研究总是带有鲜明的实验属性。柯文的治学

告诉我们，要永远追求不同学科知识之间的“异质整合”，以形成新的更高的基础性知识平台，在此基础上探索新的历史理论和方法。

沈卫荣：《“新清史”与中西学术》，《国际汉学》2023年第1期。

摘要：对“新清史”的批评和讨论，无疑是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有人热烈地支持或者激烈地反对“新清史”的种种观点，它已成为中西学术之间一场持久的争议，而其争议点早已超越了清史研究的范围，有时甚至超越了学术研究的范畴。本文尝试从学术专业出发，参与这场对“新清史”的学术讨论，试图就“新清史”所提出的几个关键问题，即何为中国、何为内亚、什么是大清帝国的内亚性质、什么是菩萨皇帝、何以清史研究需要利用满文文献等问题进行讨论，来说明“新清史”何以成为中西学术之间的一个战场及其出路问题。

张艳国、徐为结：《改革开放以来五四运动秩年纪念学术会议选文研究》，《史学月刊》2023年第6期。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五四运动秩年纪念已达五次，每次皆有学术会议召开，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分别主办的学术会议，学术性浓、档次性高、权威性强。透视会议论文作者群体，可以发现其中学术传承代际积累、学科专业交流互鉴、跨地区跨国界互动沟通等特征。梳理研讨会选文及其文集的学术脉络，可以发现它们既与时俱进回应时代课题，又实事求是总结历史经验；既聚焦五四文化精英，又重视五四爱国青年，还关注五四亲历者；既就专制与民主、蒙昧与科学、新旧道德、中西古今等话题展开争鸣，还关注五四时期文学、教育、音乐等学科发展，并进行五四追忆诠释、检视反思，映射出五四运动研究话语日新月异、深化日趋多元、学术范式区界拓展、研究方法交叉融合等趋势。学术会议研讨是学术研究的重要载体，也是助推五四运动研究繁荣发展的重要渠道。

金大陆：《“口述史”与“口述记忆”：新中国史口述研究的历史学和社会学取向》，《中共党史研究》2023年第3期。

摘要：新中国史口述研究与人口统计的代际年岁相关，其所面对的史实、人物和事理均处于“宜采集”和“需抢救”状态，并具有鲜明的“共同经历型”特征。其中，社会学注重探求口述与“集体记忆—社会认同”的关联，强调情感倾向和价值判断，并通过“社会建构”的话语分析诠释历史。这一取向不应称为“口

述史”研究，而应称为“口述记忆”研究。历史学则将口述定位为“史料”，强调与以档案为主干的“合围型”史料群进行比对考订。二者在旨趣、要诀、范式、目标上是不同的，应在既双向平行又相互映照的轨道上前行。

郭辉：《口述史的“现代”所在：“生命记忆史”的提出及其若干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23年第6期。

摘要：现代意义的口述史发端后即蓬勃发展，毕竟现代社会中每个活生生的人都有权利留下自己的记忆和经历，给“那些在历史叙事中被边缘化的人群发出更大声音的机会”，此即人在现代社会中主体性的凸显，亦是尊重生命的体现，口述史则提供了一种可能与实践途径。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口述史面临更多挑战，包括真实性、规范性、过度实践等问题，故需要经过专业素养培训的口述实践。口述史“何去何从”即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问题的解答已迫在眉睫。鉴于此，本文试图观察口述史本身的特性，从记忆史的角度回答其生存之道，及应如何进行自身定位更好地服务于现代社会发展。

姜萌、郑泽宇：《中国公共史学的两次启动及其展望》，《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5期。

摘要：四十余年来，中国公共史学有过两次启动。第一次启动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结合中国史学传统，学人在“史学危机”背景下对中国史学进行了深刻反思，得出应关注现实、走向大众，以知识为人民大众生活生产服务的学界共识。但是，由于缺少社会需求，技术条件不足和学风转变等因素，此次启动未能结出硕果。21世纪以来，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历史文化产品的需求快速增加，中国公共史学得以第二次启动。由于党和政府的提倡、自媒体技术的加持和史学工作者的理性参与等有利因素汇集，二次启动的公共史学正在健康发展。作为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任务的内在要求，旨在解决历史知识应用与传播难题的公共史学未来可期。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大背景下，通俗史学、影像史学、数字公共史学、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社会管理与商业开发等领域将继续繁荣发展。

陈甜：《十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演变的理性审思》，《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4期。

内容简介：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股错误思潮，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蔓延已

有四十余载，呈现明显的时代特征。在新时代的十年间，历史虚无主义发展态势由高走低、逐渐式微，散播主阵地向互联网转移，并不断耦合智能化技术推演、升级。这种演变绝非偶然，它与国内外形势发生的深刻变化、党中央和社会各界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驳、信息技术的发展与资本渗透有着紧密的关联。新时代防范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蔓延，需要继续发扬斗争精神，凝心聚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话语体系。同时，我们要注重运用智能化技术提升治理能力，建立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长效协同机制。

陈甜：《新时代历史虚无主义“智能化”渗透的风险与应对》，《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6期。

摘要：新时代历史虚无主义发展态势由高走低，逐渐式微，但并未退出历史舞台。随着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历史虚无主义开始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改头换面、潜滋暗长，呈现出“智能化”新特征。这一特征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与时代环境、社会条件相互作用、糅合交织的结果，为其在信息生产、内容推送、价值渗透等方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生存空间，增加了辨识难度，潜藏着扩散、蔓延的风险。新时代抵制历史虚无主义，需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注重人工智能技术在引导、甄别、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方面的运用，以精准、高效地消除历史虚无主义。

孙钦梅：《近十年国史学理论问题研究进展》，《上海党史党建与研究》2023年第5期。

摘要：国史学理论作为对学科深层次的认识和反思，在国史学“三大体系”构建中居于重要位置。近十年来，国史学理论问题在中国历史学领域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领域内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已成为国史研究中逐渐趋热的学术话题和关注点，由此呈现出许多研究新成果和研究新思路，奠定了国史学科深化研究的理论基础。整体来看，当前国史学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滞后于学科的整体发展和要求。未来要形成独具特色的学科理论研究模式，推动国史学“三大体系”构建并走向全面发展，应进一步强化国史研究的学科自觉和理论自觉，不断创新研究的视角和方法。

（四）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论文

张文涛：《演化视野下的人类史分期问题探讨》，《世界历史》2023年第6期。

摘要：人类史分期问题是历史学无从回避的根本问题。启蒙时代以来，自上而下的历史哲学期体系与自下而上的历史哲学期体系各有优长，同时也各有局限性。前者缺少实证材料的支撑，后者缺少理论的系统性。随着自然科学各领域的发展，现今我们可在演化视野下，将自然科学的新知识、自上而下的历史哲学传统、自下而上的历史学传统三个方面优长相结合，对人类史分期问题尝试做出新的探索。综合人类学、考古学与遗传学提供的不同时间序列，可以将语言形成或人类形成时间暂定为50万年前。语言为人类通向新的发展阶段提供了强大工具。以历史上三种新增的重大变量——农业、国家、科学为路标，50万年的人类发展史可分为依次叠加的四个时代：语言时代、农业时代、国家时代与科学时代。人类社会的发展呈现出日渐复杂化的趋向，新兴的生物技术为改造人类提供了更好的可能性。

吴晓群、郭晓东：《再谈希罗多德对蛮族的建构——以〈春秋公羊传〉为参照系》，《天津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

摘要：古代希腊史家希罗多德在其著作《历史》中，从以血缘和语言为代表的种族起源与以宗教和习俗为内容的文化起源，对“希腊人”的族群共同性作了规定，以此将所有的“非希腊人”与“希腊人”区别开来，并称之为“蛮族”。在“蛮族”面前，希腊人始终保持着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感。在古代中国，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则有“夷夏之辨”，认为遵守中国之礼仪与道德的为诸夏或中国，反之则为夷狄。《历史》与《春秋公羊传》笔下的族群认同，都不完全依赖于血缘，更主要地是文化习俗与道德价值的认同，这是它们相似的一面。但希罗多德对“蛮族”的建构与阐释，在后世被强化为一种文明与野蛮相对立的思维方式与相处模式，从而引发了现代世界的诸多问题。而儒家《公羊》学则认为夷夏之差异与界限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不存在文明与野蛮之间始终不可调和的矛盾，对当今世界处理由族群问题引发的有关“文明”的思考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思路。

卓立：《“记实性”与“解释性”：中西史学传统的差异》，《天津社会

科学》2023年第3期。

摘要：西方知识观自古希腊起便追求永恒不变的理性知识，历史学作为感性观察的记录一直被边缘化。西方史学始终是认知本位的，历史知识合法性是其理论反思的中心问题，基于理性知识系统的解释化倾向是其主流。中国传统史学则源自对先王先贤的记言记事，具备天然的至高的合法性，这使其被高度伦理化，最大特点是以记实性为根基。尽管西方自兰克史学之后也开始更为重视史学的记实性，但与中国传统史学的记实性相比，两者仍具备一些系统且根本的差异。中西文化传统不仅对“实”的理解彼此迥异，对“记”的态度在史学中也完全不同，两者的史学实证观和求真观也有明显区别。对于本质上是一门人文学科的历史学，记实性传统可能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中国史学传统的记实精神，本身意味着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传统的知识观念，其真正的意义，是作为一种关于真实生存着的人本身的实证知识的典范，一种不同于科学主义的新实证知识的典范。

董立河：《克罗齐“哲学与历史学同一”思想解读——兼谈哲学在历史学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3期。

摘要：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1866—1952年)是著名的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主要受维柯的历史主义思想和黑格尔的精神哲学的影响，克罗齐在行动和历史中发掘精神的实在性，提出了独特的“哲学与历史学同一”的观点。当前，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各个学科都在思考自身知识体系的构建问题。克罗齐这种淡化学科界限、倡导学科融合的想法和做法，可以为当下的讨论提供一个有张力的思路和视角。

熊宸：《波利比乌斯的历史写作与罗马“命运”》，《史林》2023年第2期。

摘要：“命运”是波利比乌斯史学研究中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它所开启的迷思在之后的两千多年里从未完全消散，集中体现为一种对人之政治和道德努力与命运之间关系问题的持续关注。本文通过对《通史》中“命运”三重含义的解读，一方面化解学术界对波利比乌斯“修辞性”使用命运概念的普遍偏见，另一方面就波利比乌斯为罗马帝国“辩护”态度的问题予以理解上的修正。本文认为“命运”是理解《通史》的核心观念之一，无论对于我们认识波利比乌斯与罗马的关系，还是他对政治时局的洞察及对人世兴衰的哲学思考都十分重要。

董立河：《西方古典时代的历史理论与普遍历史》，《古代文明》2023年第2期。

摘要：西方古典普遍史学发源于公元前5世纪，到奥古斯都时代达到巅峰，前后走过了约5个世纪的历程。与任何时期的普遍历史一样，古代普遍历史的普遍性，不仅仅在于其深广的时空概念，还在于普遍性的历史观或历史理论，亦即有关历史进程演变节奏或模式的思辨性观念。历史理论是普遍历史的必要前提。影响古代普遍历史学家的历史观念主要有种族更替模式、生物生长模式、文化进步模式和历史循环模式等，而世界帝国更替模式被认为是一种最契合经验实际的历史观念。实际上，所有这些先验性的宏大历史观念，包括世界帝国更替模式，都在古代普遍史学中起到了实实在在的作用。了解古典时代的历史理论及其与普遍历史的关系，有助于更好地书写我们自己时代的世界史或全球史。

吕厚量：《乔治·芬利的古典文明衰亡说》，《史学史研究》2023年第2期。

摘要：乔治·芬利是苏格兰启蒙运动和德意志大学教育共同塑造的一位重要历史学家。他在其巨著《希腊史》中提出了古典文明于公元3-8世纪期间缓慢衰亡的学说，认为专制政府强加给普通民众的沉重财政负担是导致这场衰亡的本质原因，并在总结其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针对现实与未来的历史预言。乔治·芬利对早期基督教客观历史作用的理性分析修正了前辈学者爱德华·吉本的偏颇观点。他关于罗马帝国后期与拜占庭时代早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同著名的皮朗命题存在相通之处。他试图将历史经验教训与现实决策紧密联系起来的历史预言写作模式则为阿诺德·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提供了重要启示。

尉佩云、郝平：《历史意义的思想演变与当代转型——以约恩·吕森为中心》，《学术研究》2023年第4期。

摘要：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伴随传统历史目的论的衰落与“语言学转向”以来的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兴起，历史意义与历史理性也逐渐丧失了系统性。历史意义与历史理性在近现代的演变过程中，历史元理性转化为认识论理性，历史意义转换为一种“事后意义”，这些概念在近现代都经历了一个从“实质性”向“范畴性”的转换。正是在这种转换中，史学职业化才得以形成。约恩·吕森作为当代德国重要的史学理论家，他在西方史学理论的总体性语境中，将现代历史

经验与认识论理性相结合，以“历史文化”概念为引导，力图重新探讨历史意义和历史理性的当代合法性与思想生命力。从史学理论的未来走向上看，历史意义的“历史文化”转向是一个成功的理论转型。由此，我们能够观测到德国史学理论不同于英美史学理论的解释体系与发展趋势。

黄越、蒋重跃：《历史比较研究的合理性及其限度》，《山西大学学报》2023年第5期。

摘要：比较研究是历史研究者经常使用的方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于历史比较研究的合理性及其限度做了深入思考，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包括：通过比较同异以发现历史规律或本质是比较方法的基本内容；历史比较研究方法所具有的“辨同异”构成了世界历史研究“明一多”的充分必要条件；事物的本质是可公度性与不可公度性的统一，种概念加属差的本质定义就是探寻事物本质的比较研究方法。但是，也有人认为不同文明间的许多重要社会现象没有可比性，因为它们只是偶然的或经验(特别是格式塔或视觉)意义上的，就像托马斯·库恩所说的鸭子和兔子没有可公度性一样。不过，我们所说的比较研究是超越经验的概念性思维。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用种概念加属差表现主体(主词)的属性，就是通过对概念在同种之属间的同异做比较研究以呈现事物本质的方法；黑格尔认为本质是存在投射到中介后的反映，探寻事物的本质其实是在做与中介的比较研究。历史事件/现象是经验的，但历史研究却必须上升到本质和概念的领域，这是历史比较研究之所以可能的理论根据。不过，作为概念思维活动，比较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又具有知性属性，难免会有一些的抽象性，会有与经验的历史相疏离的倾向，因此，它的合理性也是有限度的。

金嵌雯：《史学视角下“narrative”与“叙事”概念比较刍议》，《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1期。

摘要：“narrative”和“叙事”，是两个从自身文化传统中生成，当前常被互译的词汇。在中西史学传统中，它们皆构成历史的一种重要言说模式。narrative通常呈现为一个沿时间线展开、具有细节性过程、仿佛在自我讲述的故事；叙事则主要指史书的属辞比事，依照“叙”的本义，它更强调通过排列次序来辨明事物的条理。从发展体系看，narrative暗示着史学作品与文学虚构之间的“孪生关系”；而在中国古代，与“实录”互为表里的历史叙事在推动叙事

文类的早期发展中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narrative 和叙事折射出中西史学传统的差异，亦体现着历史学超越特定文化的共性。史家通过有序地展现人事过程来理解过去，并再现一个富有意义和秩序的历史世界。

李腾：《从“四大帝国”到“三位一体”：中世纪盛期的神学化历史分期与史学观念》，《江海学刊》2023年第3期。

摘要：历史思想的演变反映了时代特性，中心与边缘的交替融合也体现了社会思潮变化。历史分期模式是把握历史思想发展的重要切入点，也是探究当时人对历史整体理解的核心要素。在中世纪盛期，12世纪文艺复兴和政教之争的发展推动了历史意识的新觉醒。在古代晚期以帝国为中心的历史分期框架逐渐为神学化的“三位一体”模式所取代。在继承《圣经》与奥古斯丁历史观的基础上，若干神学史家重新划分了人类历史的分期，体现了独特的史学观念和史学思想的嬗变，并对此后西欧的历史书写和史学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

汪丽红：《西欧“普世史”历史空间的形成》，《江海学刊》2023年第4期。

摘要：“四帝国说”是普世史的经典结构之一，建构了最早具有普世性质的历史空间。希罗多德最早以霸国更迭奠定了西方非“我”出发的世界历史模式，历经波利比乌斯基于罗马征服形成世界一体的时空感，奥罗修斯确立“天国察史”视角，最终到弗赖辛主教奥托完整建立四帝国更迭历史。上述史家在所在时代或多或少身处“边缘”，西方普世史在他们笔下历历史与空间融合、神学介入产生超然视角，以及普世主义与民族主义交错互生，最终展开一个有意义的、自东向西直线前进的历史空间，同时也揭示了一条与古代中国“天下观”不同的世界认知和族群认识路径。

于洪：《论英国现代史学研究的专业化》，《史学集刊》2023年第5期。

摘要：19世纪中后期，在兰克史学的影响下，以斯塔布斯为代表的英国历史学家开始重视对原始档案文献的运用，努力运用“科学化”的研究方法呈现历史真相。历史学成为独立学科后，英国大学培养了众多的专业历史学家，他们超越了原有的历史写作的精英主义传统。学术期刊的创办和学术组织的出现加强了专业历史学家之间的联系，确立了专业史学研究的学术标准，形成了严格的学术评价机制，英国现代史学研究专业化趋于完善。

向荣：《R. H. 托尼与英国百年史学》，《历史研究》2023年第4期。

摘要：R. H. 托尼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知名史学家，但受20世纪中后期新史学思潮冲击和右翼史学家批判，他和他的著作逐渐淡出英国史学界，直到最近，托尼的史学遗产才重新受到重视。托尼的个人命运与英国百年史学变化相互映照，通过分析托尼所处时代和他对16、17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的批判性研究，以及英国新史学、修正派史学对托尼的抨击和21世纪新环境中托尼的“回归”，可以看出，他提出的资本主义起源问题，对下层民众生计的关注，以及所采用的宏大叙事史观和研究方法仍有学术生命力。

刘耀辉：《英国辉格史学的演进、特征及其局限性探析》，《人文杂志》2023年第2期。

摘要：英国的辉格史学始于17世纪末期，在19世纪成为主流的历史编撰方式。它强调英国17世纪宪政斗争以来自由、议会统治和宗教宽容的发展，颂扬辉格党人对英国宪政与自由的贡献。从19世纪末期开始，随着英国霸权地位的逐渐衰落、辉格党人(自由党人)政治力量的没落以及历史学的专业化，再加上辉格史学自身的局限性，曾经盛极一时的辉格史学遭到诸多批评，逐渐式微。然而，广义的辉格史学并没有消亡，而是体现在各种历史书写之中。

金德宁：《在传统与革新之间：麦克法兰史学思想及其影响》，《四川大学学报》2023年第2期。

摘要：鉴于辉格史学传统在中世纪英格兰政治史研究中的进步史观缺陷，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群体人物学等理路的借鉴，麦克法兰重构了“变态封建主义”概念，借此系统分析了中世纪的英格兰贵族阶层、社会政治秩序。这促成了西方学界对传统宪政史学的摒弃，以及对这种新范式的接受，进而对中世纪英格兰的政治史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其表现在十五世纪的英格兰和地方乡绅阶层得到应有重视。但麦氏的史学思想也存在诸如“对思想原则的忽视”“严重的史学碎片化倾向”“以国王为中心的史学观”等缺陷，并为后世学者所延续。随着史学理路的革新，卡彭特倡导的新宪政史应运而生。它要求重新审视中央机构的作用，同时从梅特兰的法律史传统中汲取营养。不过，新宪政史也是麦氏影响力的进一步彰显。

张一博：《德意志地区新史学观念的形成与百科全书式世界史书写的衰落》，

《世界历史》2023年第4期。

摘要：随着新航路开辟，探险者和传教士将大量异域知识带到欧洲，基于《圣经》的世界历史书写传统遭受冲击。如何整合异域知识构建新的世界历史成为16—18世纪史家所关心的问题。其中，百科全书式的世界史书写成为一股重要潮流，18世纪英国学者集体创作的多卷本《萨尔普遍史》便是这一潮流的代表。该书出版之后被翻译成多国语言畅销欧洲，其中尤以德文版最具影响力。然而，该书出版不久便在德意志地区遭受学院派历史学家的批评，其销量受挫。《萨尔普遍史》所代表的旧史料观也在新史料观的冲击下变得不合时宜。19世纪初兴起了书写世界历史的新潮流，人们希望从世界大事中了解世界大势。传统的百科全书式历史书写在史学史谱系中被边缘化。《萨尔普遍史》的命运浮沉并非孤例，从中折射出近代史学观念和历史意识的变迁。

李子建：《“务实的历史写作”与18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史学理论——以伽特勒、施洛策尔的理论论述为中心》，《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1期。

摘要：近代西方史学诞生以前，历史研究与历史写作分立，历史被视作神学和法学的预备知识。18世纪下半叶，在以伽特勒和施洛策尔为代表的哥廷根史学家的推动下，“务实的历史写作”成为德国启蒙史学的标志性概念，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因果关联被要求以系统的方式加以呈现。伽特勒和施洛策尔围绕“务实”与“系统”和“科学”这三个概念进行了史学理论层面的反思，并将普遍史—世界史的编纂作为“务实的历史写作”的实践形式。史学家被要求在经验性的史料工作的基础上，运用哲学的头脑，选择对人类文明发展具有普遍意义的时期和对象，呈现其中的系统性和关联性，让史学获得科学的性质。伽特勒在历史表现层面仍然保留了传统修辞史学的痕迹，施洛策尔则强调史学家所具有的理性能力在历史写作中发挥的主导作用。进入19世纪，启蒙史学及其理论受到德国历史主义史学家的批判，“务实”一词逐渐成为前现代史学的标签。

张一博：《浪漫主义思潮下施莱格爾的普遍史书写》，《史学史研究》2024年第4期

摘要：18世纪末以来，在德意志地区兴起了一股世界历史书写新潮流。世界历史书写摒弃了传统的百科全书式书写模式，开始寻求世界历史之间的联系。在这一思潮影响下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如何整合世界历史，探求世界历史发展的主

线。其中弗里德里希·施莱格爾的《普遍史论稿》便是这一思潮的代表。施莱格爾作为一名早期浪漫派成员，其作品一方面深受哥廷根学派史料批判与整合历史的影响，力图展现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又深受浪漫主义思潮影响，带有强烈的哲学色彩。《普遍史论稿》借助中世纪的世界历史书写模式，将自己的政治理想投射到中世纪的等级社会中，借此批判法国大革命及其后果，为现代化寻求另一种出路。

杨凡：《当代西方男性气质研究——新的转向、方法与议题》，《学术研究》2023年第4期。

摘要：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男性气质研究作为专门的学术领域在西方学术界兴起。通过从研究转向、核心取向以及重大议题这三个层面梳理当代男性气质研究的种种面向，可以呈现研究者的多元视角。这个学术领域的兴起，并不只是针对女权主义作出的回应，其关注的焦点也并不局限于性别解放的议题。该研究弥补了传统女权主义研究对男性身份不加区别的分析，同时也修正了早期“父权制”讨论中单一侧重制度与生产关系的考察。围绕男性气质展开的讨论，深受当代西方众多学术思潮的启发，开启了男性研究的新方向。多数学者认为，男性气质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它是父权制得以维系的文化基础。作为一项分析工具，男性气质被嵌入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史、文化史、文学理论与批评以及其他文化研究之中。

翟宇：《半封建概念在近代世界的兴起与经典化传播》，《江海学刊》2023年第3期。

摘要：半封建概念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状况的一个基本描述。这也决定了对半封建概念的考察基本集中于“两半”理论研究范畴。这种研究取向使得对这一概念的既往研究存在不少大而化之的现象，有关这一概念的很多看法与史不符。由于对这一概念在传入中国之前的流变历史缺少详细梳理，势必造成对历史研究必须基于史实这一研究规范的违背，进而对推进“两半”理论研究也带来不利影响。历史地看，迟至19世纪初，半封建概念就已出现在欧美社会并被用来指称欧洲旧制度，带有线性进步视域下的负面意涵。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与恩格斯开始运用半封建概念，并将之纳入对德国社会形态的分析，半封建概念也具有经典意义上的阶级关

系意涵。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内，列宁对半封建概念作出新的阐释并将之运用到更广泛的时空范围。梳理半封建概念在近代世界的兴起语境及其经典化阐释，对于匡正半封建概念研究方面的疏失以及客观认识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理论价值。

李隆国：《从比较的单元看西方大历史的演化》，《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11期。

摘要：世界史的写作都需要进行比较，因此笔者试图从比较单元的视角考察西方世界史写作的演化轨迹。古典史学关注城邦或者共和国，聚焦于政体的构成；中古史学则关注人的救赎，内心的虔敬成为比较的重点；启蒙史学重新把视野投向族群，比较其宗教与制度；19世纪的民族国家史学则把国家置于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央，衡量国家是否民主和自由；20世纪以降，文明成为世界史的比较单元，而专业化的比较史学则尤其重视制度演化之异同。各种各样的大分流似乎风头正劲。

李隆国：《亲眼所见：艾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与中古拉丁欧洲传记的转型》，《史学史研究》2023年第3期。

摘要：长期以来，学界比较研究艾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与苏维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帝王传》，尤其是在加洛林文艺复兴的文化背景之下讨论二者的联系。其实这两部作品在史源限定原则上存在重大差异，尽管借鉴古代传记依类叙事结构的写作原则，艾因哈德引入亲身见闻作为史源限定原则，不仅成功地树立了自己的叙事权威和可信度，而且还将神似与形似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在艾因哈德复兴了拉丁文君王传记之后，继起的类似传记则转而采纳了编年体例，从而强化传记的叙事与形似色彩，而淡化其神似色彩。中古拉丁君王传记也就具备了独特的写作体裁。

曹峰毓、刘婕妤：《论伊巴丹历史学派的建立、衰落与当代发展》，《历史教学问题》2023年第6期。

摘要：伊巴丹学派是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的重要代表。20世纪50—60年代，在迪凯、比奥巴库等学者的努力下，伊巴丹学派建立。通过开创以非洲人为主体的世界观、以口述史为主的方法论，并建立非洲最早的历史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平台，伊巴丹学派极大地推动了非洲史学的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后，受尼日利

亚内战、长期不利的政治经济环境、民族主义史学及伊巴丹学派自身思想缺陷的影响,该学派逐渐衰落。20世纪末,伊巴丹学派开始反思自身的史学理念,并拓宽研究领域与时间跨度、更加注重研究的现实关照、加强学术交流平台建设,进而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重审伊巴丹学派的发展历程,对于我们思考理论构建、社会发展、人才培养与学派发展间的关系等问题有着重要启示意义。

李勇:《“弗劳德病”:科学主义史学的理性缺失》,《史学史研究》2023年第1期。

摘要:朗格诺瓦、瑟诺博斯在《史学导论》里,依据弗里曼的观点和费希尔提供的材料,提出“弗劳德病”一词。这一术语随着《史学导论》被译成不同语言而世人皆知。表面上弗里曼以弗劳德史著“不确实”为由猛烈抨击之,从学术理念上代表了科学主义史学的主张;实际上还代表了学术观念之外的与弗劳德政见、宗教观念不同的人发声,另外多少又体现了他想扳倒潜在的学术对手的愿景。弗里曼批评弗劳德未免以偏概全;朗格诺瓦、瑟诺博斯未对费希尔批评弗劳德之词做出鉴定,就贸然吸纳其错误的举例,同时舍去对自己观点不利的说法,这些都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

张旭鹏:《民族史及其超越—兼论复线的民族史的可能性》,《古代文明》,2023年第3期。

摘要:民族史在中国的兴起,发端于近代中国史家构建民族国家的诉求,在塑造民族认同、凝聚民族意识、促进国家统一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民族史也因其同质化和排他性的民族国家叙事,忽视了其内部不同族群的历史。近年来,在全球史的影响下,一些历史学家尝试从周边和内亚的视角重新理解中国,力求打破民族国家叙事的僵化思维,撰写更具开放性的民族史,进而展现民族国家内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就这一点而言,边疆这一兼具内外两种因素,同时又容纳了权力的中心与边陲的流动区域,为撰写这种开放的民族史提供了一种有益的视角和可行的路径。

张旭鹏:《“星球史”视野下文明思考》,《全球史评论》2023年第1期。

摘要:汤因比在1947年发表的《文明经受考验》一文中,曾感慨于西方人所获得的开阔的历史眼界:“就空间而言,我们西方的眼界已经扩展至这个地球上可居住和可进入之表面上的所有人类,以及这个星球在其中不过是极小微尘的

恒星宇宙；就时间而言，我们西方的眼界已经扩展至晚近这 6000 年中升起又衰落的所有文明，以及 60 万到 100 万年之前人类起源的史前历史，乃至大约 8 亿年前这个星球上的生命历史。

黄艳红：《从话语理解法国革命的观念起源——基思·迈克尔·贝克的政治文化研究述评》，《世界历史评论》2023 年第 3 期。

摘要：基思·迈克尔·贝克曾是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他在论文集《法国发明革命》中以司法、理性和意志三个“话语束”为核心，再现了旧制度最后数十年政治文化的演变和发展。贝克认为，旧制度政治话语场中的各种竞争和联动，不仅使得法国大革命在观念上成为可能，而且在革命即将到来之前创造出新的政治语汇，以赋予这场革命全新的含义。贝克的分析侧重“中层文本”，注意从文本修辞剖析作者的思想倾向，但他的研究并非脱离历史实际的“语言游戏”，而是基于不断变化的政治语境。在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方面，基思·贝克将剑桥学派的话语分析路径引入法国革命的政治文化史研究，并与以科泽勒克为代表的概念史存在交叠，三方研究都有对话和互鉴的可能。

黄艳红：《法国旧制度末期的历史话语与宪法概念(1750—1789)》，《社会科学战线》2023 年第 7 期。

摘要：在 1750 年代法国的“宪政危机”中，各派政治力量试图以历史来阐发各自的政治理念，这表现为它们对法国历史的不同阐述。勒佩奇、莫罗分别代表法国高等法院的传统宪政主义和绝对君主制的历史-宪法理念，而马布利笔下的法国历史则预示着民族革命对政治生活的重塑。但对于长期引领公共舆论的穿袍贵族而言，这一超时间的、非演化性的宪法不仅有抵制王权专制的政治性色彩，同时也有维护现有的不平等的等级-社会秩序的一面。这种保守性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舆论战中更为突出地表现出来。志在革新现有政治-社会体制的革命者强调法国过去没有宪法，应该创制一部宪法。他们不仅以自己理解的自然法重新定义了宪法概念，这个宪法的“零点时刻”也意味着民族集体生活的重启及与历史的决裂。

赖国栋：《从比较到纠葛：法国史学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超越》，《史学理论研究》2023 年第 5 期。

摘要：十九世纪欧洲开始在世界居于主导地位。那时，西方史学发展出一套展示欧洲优越性、贬抑非欧洲文化的解释框架，表现出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作为西方史学的一部分，二十世纪以来法国史学在“欧洲中心主义”上有什么表现，又受到了哪些挑战？随后涌现的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在法国史学中又呈现何种态势？梳理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二十世纪以来法国史学的变迁，同时得到一些启示。总的来说，法国史学经历了从比较到关联再到纠葛、从支持跨民族史到挑战“欧洲中心主义”再到全球史的过程。这些变化在促使历史学家廓清法兰西特性的同时，也使之能够深入探讨非欧洲人的历史意识等重要问题。

王雯菲：《“殖民情境”理论与法国殖民史研究的转向》，《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6期。

摘要：20世纪90年代，“殖民情境”理论运用于法国历史学领域。该理论强调，殖民主义的冲击是整体性的，不仅仅是政治和经济统治形式的改变，而且造成了深刻的社会与文化转变。受其影响，近年来法国殖民史研究大体围绕三方面展开：其一，改变被殖民者笼统的、模糊的以及无行动力的固有形象，强调殖民地社会的主体性；其二，弥合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叙事分离，关注帝国内部流通；其三，跨越殖民帝国的空间限制，重视人、物质与思想在帝国间的循环。“殖民情境”理论与新帝国史、历史学的全球转向汇合，共同促成了法国殖民史研究的重要转向。

刘丁一：《学院之外：美国历史学家的职业挑战》，《世界历史评论》2023年第2期。

摘要：2023年初，美国历史协会发布了《拓宽历史学术成果定义的指引》，重新扩展了对历史学术的定义，旨在消除“狭窄的专业评价”和历史学家做出的“多样性有价值的工作”之间的鸿沟，这造成“对个人和整个学科有害的不平等现象持续性存在”。历史学领域的情况在疫情期间遭遇到诸多方面的打击，历史学越来越变得像是一个吸引力减弱的领域。“工作”（Work）和“公众”（Public），这两个方面在定义从事历史学术活动的工作伦理中获得了更多关注，这些变化也将影响历史学的专业性特征和实际的研究活动。“把历史带进生活”具有现实的迫切性，诚实地使用关于过去的记录不代表在公众中间没有观点。历史交流活动

建立在最基本的对彼此工作的尊重之上，这些共享价值观在当下显得尤为重要，也是历史学这门古老的学问参与到公众讨论中坚实的伦理立场。

庞昊：《历史话语权之争：后现代历史理论喧嚣的背后》，《学术研究》2023年第8期。

摘要：自19世纪以来，历史学家逐渐掌控历史话语权，将哲学家、文学家排除于历史讨论之外。即便历史哲学在20世纪迅速发展，也没有改变这一现状，直到历史理论家找到后现代历史理论这一武器，历史学家才开始重视历史理论家的声音并且与之争论。这些争论有时带有的夸大与激进，暴露出研究者的不足。历史理论家有时空谈理论从而忽略史学实践以及与历史学家的交流，历史学家的批判则有时误读福柯、德里达等理论家的思想，提出的批评与理论家的本意相差甚远。面对这些不足，历史哲学的未来发展应该更重视与史学实践的关系，作出更具有交流性的研究。后现代理论家的思想应该得到更仔细的审视，一方面重新梳理其谱系，另一方面逐字逐句地考察思想家的著作。

胡永恒：《史学研究的“碎片化”及其超越》，《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5期。

摘要：近年来，史学研究的“碎片化”问题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但尚未达成共识，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史学研究的“碎片化”主要表现为史学研究对象的零碎化、研究领域的日趋狭窄以及研究缺乏系统性。它有其自身特殊的历史成因。改革开放以后，学界由空疏宏阔的历史研究转向对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研究对象越来越小、越来越散，给人以“碎片化”的观感。再加上后来受西方新文化史的影响，“碎片化”之势愈演愈烈。为克服和超越史学“碎片化”，学者们提出了诸多有益办法。文章认为，可以采取两条具体的路径，即“由小及大”与“以小见大”。

赵悦清：《20世纪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缘起与流变》，《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6期。

摘要：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中东史学颇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将历史视为阶级斗争的结果，通过唯物史观分析埃及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20世纪是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体现了历史书写对殖民主义、阶级斗争和社会现实的回应。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原

理的应用，还扩大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域外传播，其史学演进路径经历了社会思潮到史学流派、教条主义到理论创新、阶级斗争到反极端主义的演变。研究20世纪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于推进中国的中东史学史研究具有一定的裨益。

徐善伟：《“中世纪人文主义”概念史考察》，《历史研究》2023年第3期。

摘要：“中世纪人文主义”概念萌发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学界。20世纪20—50年代，它作为术语不断出现于史家著述中，并在60年代末获得学界普遍认可。其最初内涵是热衷与研究古典文化，后拓展为“基督教人文主义”、“精神人文主义”、美德和“完美之人”的塑造等。70年代，索森提出“经院哲学人文主义”概念，之后的研究大都是对索森的补充、更新和修正。迄今为止，西方学界已就该概念的内涵达成诸多共识，但在它与经院哲学、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关系方面仍存在分歧。“中世纪人文主义”概念研究史表明，其产生和发展，与近现代西方社会变动、思想文化演变，以及史学专业化等因素密切相关。

梁民愫、范莉莉：《爱德华·汤普森阶级史观的多维阐释》，《史学月刊》2023年第4期。

摘要：在英国新左派史学界内部，学者们普遍关注爱德华·汤普森阶级经验叙事方式，将阶级研究中的文化与结构因素结合起来，探讨汤普森阶级史观在文化转向和新左派史学转向中的学术价值与政治意义。国际新文化史学界重点分析汤普森阶级话语运作机制、阶级经验方式及其主体性关联表征，强调在大众政治行动中的阶级经验形式与阶级意识差异，揭示政治、地域、性别以及不同社群文化对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批判阶级话语分析学派出发，坚持对汤普森阶级史观进行历史唯物主义重建。在国际史学回归“宏大问题”叙事的当下情境中，全球劳工史学界亦参与到对汤普森阶级史观的阐释之中，学者们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史研究，彰显英国马克思主义范式的全球史学意义。

冯潇：《霍布斯鲍姆对历史唯物主义史学方法论的探索》，《学海》2023年第6期。

摘要：霍布斯鲍姆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成员一道，总结出一套以自下而上

的历史观和阶级斗争分析方法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但在关于方法论的具体理解上,他与 E. P. 汤普森存在一定差别。同时,霍布斯鲍姆与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基于共同的研究旨趣,试图打破“独断的结构”,扩大历史学研究的视野,突出普通人民在历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推进 20 世纪史学研究方法的现代性转向。在此基础上,霍布斯鲍姆回应现实需要,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运用于世界近现代史的重新建构之中,通过史学作品的大众化传播,打破西方中心论的刻板模式,令读者能够广泛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他较好地处理了政治立场与学术立场之间的关系,发掘并践行了具体的、可传播的历史唯物主义史学研究方法,重视学术研究的大众化普及,由此奠定了他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并对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吴羚靖、梅雪芹:《环境史视野下英帝国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与路径转向》,《史学理论研究》2023 年第 1 期。

摘要:环境史视野下的英帝国史研究关注英帝国殖民扩张活动的环境基础与生态影响,其问题意识和路径转向与英帝国史学和环境史学的发展脉络紧密相连。该领域学者最初侧重论证全球环境主义的帝国起源,后来转向分析英帝国环境话语、殖民活动的物质前提及其对殖民地环境的影响。其研究主题也从环境观念与殖民科学延伸至资源开发、商品边疆、城市规划、疾病卫生等内容。近来有学者提倡采用“生态—文化网络”视角,从空间网络、物质与文化联系以及能动性三方面重新思考英帝国环境史。既有研究展现了帝国语境下全球环境观念的演变,也揭露了殖民主义深远但隐蔽的环境影响。它们使学界对英帝国的认识从“仁慈帝国”转向“自然帝国”,超越了所谓“帝国文明传播论”或“帝国和平论”。未来学界仍需从帝国权力结构、时空范畴以及历史能动性等方面推进研究。

刘晓卉:《西方英语学界海洋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发展及其问题》,《世界历史》2023 年第 3 期。

摘要:海洋环境史是 20 世纪晚期兴起的史学新领域,它关注的是历史上人类与海洋环境的互动和相互影响。20 世纪下半叶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渔业资源衰退和海洋生态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历史学者对海洋环境的关注。发轫于西方的海洋环境史在发展初期主要关注海洋渔业资源的多寡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视域扩展到历史上人类与整个海洋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

海洋环境史研究在其发展过程中同时受到自然科学发展和史学新潮流的影响。海洋环境史研究不但拓展了环境史的研究范畴,挑战了传统环境史研究中陆地本位的历史观,而且证明了历史学者跨越学科界限与自然科学学者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为环境史的书写提供了前沿范式。由于发展时间较短,西方海洋环境史研究在内容、方法、理论等方面遭遇一定的困境。

姚汉昌:《“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与“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克罗齐对柯林武德的影响》,《学术研究》2023年第10期。

摘要:“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与“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分别是克罗齐与柯林武德的名言。这两句名言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表明柯林武德在一定程度上分享着克罗齐的某些信念,包括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区别、历史知识认识论以及史学的现实价值等等。事实上,克罗齐确实在历史哲学方面对柯林武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从更深层面来看,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与柯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在某些方面又存在着不同,这种不同表明柯林武德对克罗齐历史哲学的继承与发展。本文拟从柯林武德与克罗齐如何在学术上发生交集、“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与“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分享着哪些共同信念以及存在哪些不同等方面着手,对克罗齐与柯林武德历史观念的异同作一番辨析。

顾晓伟:《柯林武德的世界史学叙事及其缺憾》,《史学史研究》2023年第2期。

摘要:柯林武德终其一生都在历史哲学的层面反思和批判西方历史思想中的实质主义和自然主义传统,从而倡导一种彻底的人文主义和历史主义思想。然而,在全球史学史的视野下,将柯林武德关于世界史学的探讨对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的讨论,可以发现柯林武德并没有从东方的中国或印度开始讨论历史学这一概念的发展历程,而是将希腊的希罗多德看作是科学历史学的开创者,不自觉地将自己预设的“科学历史学”的标准当作了一种实质,从而没有将历史主义思想贯彻到底,不免落入他自己所深刻批判的实质主义的陷阱之中,带有不可克服的欧洲中心论的色彩。当然,在柯林武德所处的时代,虽然已经出现了斯宾格勒、汤因比、雅斯贝尔斯等人对于欧洲中心论的批判,突破了黑格尔以来世界历史的线性进步史观,但关于世界史学的讨论还是凤毛麟角,由此也不应苛责前人。进一

步而言，柯林武德在探讨历史哲学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勇于自我挑战、不断自我反省的精神，仍旧是全球史学语境下不可或缺的史学理论遗产。

邢来顺、刘剑枫：《德意志帝国学界的“民族边疆”追求与跨国文化民族主义》，《史学集刊》2023年第2期。

摘要：在近代欧洲民族主义的演进中，德国因其独特的历史条件，形成了一种漠视国家疆界，将有共同血缘、历史和文化的德意志民族共同体作为关注对象的文化民族主义。基于这种取向，德意志帝国学界出于对小德意志统一方案的不满和对“民族边疆”危机中的域外德意志同胞的关心，展开了“语言边疆”范式下的境外德语区域和德语岛研究，力图从学术层面确证它们的德意志归属，捍卫其德意志民族特性和文化，实现德意志民族疆域的最大化。德意志帝国学界的这种跨国性学术拓边，是对小德意志统一方案之缺憾的学术修正，也是对域外德意志同胞及其承载的德意志文化的一种文化民族主义关切，意在强化“民族边疆”的德意志属性。这种学术拓边对当时以及日后德国学界的民族主义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金雯：《16至18世纪世界史书写与“比较思维”的兴起》，《上海大学学报》2023年第2期。

摘要：16至18世纪是世界史书写兴起的时代，欧洲各方人士汲取新大陆及其他非欧洲地区的自然和人文知识，勾勒不同民族的发展历程，并对其做出比较和勾连。早期世界史写作不仅是19世纪现代种系发生学和人类学的前奏，也是“比较文学”诞生的前提条件。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基督教视域下的人类同源论将欧洲以外的“异教”民族纳入《圣经》叙事。随后，法国的贝尔尼埃、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尝试从自然环境和制度传承的角度解释不同社会的起源和演变，强调民族间差异。与此同时，还有一股“反启蒙”思潮，在认可各民族基本共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多元文化观念的雏形。正是在16至18世纪这一时期，西方思想家的世界史写作从基督教一元论转向了对民族性格同异关系更为哲学性的思考，孕育了现代“比较思维”，凸显了西方现代性的世界性起源。

刘文明：《西方“帝国年代”的文明史书写与“帝国主义”叙事》，《史学集刊》2023年第1期。

摘要：“帝国年代”的西方学者在书写文明史时，都将非西方的“蒙昧”或“野蛮”民族置于西方文明发展这一主线下，以西方“文明”为标准对其加以衡量和叙述，将非西方民族视为“没有历史”和“没有变化”的民族，而“历史”始于西方文明的兴起，所谓“古代、中世纪、现代”的历史分期，也是相对于白人历史而言。西方的文明史书写，便在以往欧洲与非欧洲、文明与野蛮、发展与停滞、先进与落后等二元对立叙事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打上了“帝国主义”的烙印，从书写框架到叙事逻辑都体现出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帝国”话语。

魏孝稷：《世界文明史书写范式变迁中的历史观》，《光明日报（理论版）》2023年1月30日14版。

摘要：世界文明史是关于人类社会的总体史书写，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相互关联的领域。它并不寻求书写全部历史，而是侧重于记录人类文明成就的传承、积累和不断创造，以及探索文明兴衰和历史发展趋势的规律性主题。世界文明史往往蕴含一以贯之的宏大叙事，深受背后历史观的影响。在西方社会，书写范式随着社会变迁几经嬗变，相应出现了几种主导一时的历史观。具体来说，这些历史观包括19世纪的欧洲中心主义进步史观、20世纪上半叶的循环史观和20世纪下半叶出现的全球史观。这为中国学者书写世界文明史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吴英：《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必须解决指导理论与时俱进的发展命题》，《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1期。

摘要：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时代的发展与学术的进步，唯物史观在解释中外重大历史问题上的解释力逐渐下降，由此对历史研究的指导地位也逐渐被边缘化。解释力逐渐下降的并非唯物史观本身，而是唯物史观的传统解释体系。近九十年基本不变的认识已经使唯物史观的传统解释体系跟不上时代发展与学术进步的步伐，逐渐失去对中外历史重大问题的解释力，由此逐渐被边缘化。当前，在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紧迫任务已经提上日程之时，构建适应新时代需要的唯物史观新的解释体系，实现唯物史观与时俱进的发展，则成为必须完成的一项前提性工作。

吕昭：《衰落论、转型论与危机应对论：“中世纪晚期危机”解释模式的嬗变》，《世界历史》2023年第4期。

摘要：“中世纪晚期危机”是对14—15世纪发生在西欧的饥荒、瘟疫、战争及其导致的人口减少、经济停滞、政治和社会秩序紊乱的概括。中世纪晚期危机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成为西欧中世纪史的重要研究主题，已经形成了两大主流解释模式。第一种是“衰落论”：通过探寻危机产生的原因，认为中世纪晚期危机是西欧社会相对于中世纪盛期的衰落；第二种是“转型论”：通过探讨危机的影响，提出中世纪晚期危机推动了西欧社会形态和国家形态从中世纪向近代的转型。这两种范式都是以中世纪晚期之前或之后的历史时段为标准做出的相对性判断。时至今日，只有以危机与危机应对的视角重新审视14至15世纪西欧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变化与发展，揭示出中世纪晚期西欧社会的韧性，才能对旧的范式实现突破，进而深化对历史上“危机”与社会发展之间互动关系的理解。

李宏图：《“边界之争”：重申思想史研究的“身份认同”》，《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23年第3期。

摘要：在思想史研究中，如何实现“思想性”和“历史性”的有机结合一直是思想史研究界着力思考的问题，这一问题也关联着思想史的身份是否具有合法性。通过对思想史研究身份认同合法性危机的理论考察，并借助思想史研究的一些实例，对思想家文本展开精细解析，由此，今后的思想史研究或将能够实现“思想性”与“历史性”两者融贯结合，创造出鲜明的研究范式，化解目前思想史研究的“身份认同”危机，进而确立起思想史这一“身份”的合法性地位。

朱联璧：《如何在中间地带重思中国研究？——以欧文·拉铁摩尔旅英期间的活动为中心（1963—1970）》，《天津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

摘要：在研究中外史学交流时，不能忽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域外中国研究的转型。欧文·拉铁摩尔这位具有多重身份的美国学者对此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他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关注。若以“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的视角回顾拉铁摩尔的活动，有望突破史学史研究专注于史著文本，以及侧重某一流派和史观所可能带来的研究视角上的局限。史学史与思想史的结合并非进一步将史学史限制为史学思想史，而是吸纳思想史研究的特长，即关注广义上的文本、超越具体事件和打破国别的限制。因此，利用演讲稿和传记作为史料讨论拉铁摩尔缘何在1963

年前往英国利兹大学创办中国研究系，此举又如何与他的史观呼应，则不仅能充实现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外史学交流的研究成果，也能呈现出“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研究视角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即书写能更好地与其他领域对话的史学史，更为充分地展现史家的主体性。

丁何昕子：《保守主义的精神与实践——冷战史后修正主义研究取径分析》，《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3年第1期。

摘要：20世纪80年代，冷战史研究中的后修正主义逐渐成为该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流派。虽然主流学界通常认为后修正主义史学是对此前传统派与修正主义的综合，但本文认为这种综合大多体现在具体观点而非研究方法上。实际上，通过对后修正主义研究取径的分析，便能发现它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与价值取向上均与传统派趋同，而将二者联系起来的关键因素，是保守主义的精神与实践。

杨祥银：《倾听的力量：口述史在公共政策中的应用》，《浙江社会科学》2023年第7期。

摘要：作为一种旨在收集、保存、解释和利用个人、团体与社区在过去事件中的声音、经历、记忆与观点的研究方法与学科领域，口述史在公共政策中的应用日益受到政府部门、专家学者与相关机构的关注和重视。作为形塑公共政策的重要资源与手段，口述史被广泛应用于生态环境、医疗卫生、城市规划、教育、移民与难民、土著权利、饥荒与贫困等公共问题领域。口述史在公共政策中的意义主要包括加深与促进对特定公共问题和政策的理解，鼓励与确保边缘人物和弱势群体的声音得到关注和倾听，提高与促进公共政策中的公众参与赋权，改善与增加公共政策的透明度和兼容性，监测与评估公共政策的有效性和确定需要改进的领域。当然，口述史在公共政策中的应用也面临可靠性与准确性、有效性、代表性、伦理、资源限制、传统决策思维与机制等诸多问题和挑战。为了确保口述史在公共政策中得到有效利用，决策者、研究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在实践中应努力遵循最佳做法和标准。

刘亚秋：《口述史研究的人文性及其难解之题》，《社会学研究》2023年第1期。

摘要：口述史内容涉及事件史和生命史。长期以来，学者们对事件史的口述研究较为充分，但事实上生命史才是口述史研究的底蕴，它也是口述史具备人文

性特点的根本原因所在。所谓人文性是指立足于个人并关注个人与社会间关系的知识。口述史人文性更聚焦于生命史，对由细节堆积起来的人生史报以极大耐心和敬意；人文口述史在尊重基本历史事实的前提下，甚至不会忽视口述者有意或无意的“谎言”，而以社会建构视角来探查这一存在的社会成因。

陈加晋、卢勇：《发现更真的历史：中国计算史学的百年之路与时代使命》，《图书与情报》2023年第1期。

摘要：在“信息革命”浪潮下，历史学遭受的冲击要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更为彻底与更具革命性，吸收信息技术精华、展现强大计算能力的计算史学成为了不可逆的趋势。历史学究竟何去何从？文章在概念辨析、历史回顾及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归纳出：中国计算史学自梁启超首倡后已历时百年，期间至少经历统计历史学、计量史学、信息史学、数字史学等若干学术实践与流派。当下计算史学的成果集中在三大方面，包括数据集成和数据库，历史文本语料库、知识库建设与挖掘分析，可视化及GIS历史地理信息系统。需警惕的是，计算史学所谓的“繁荣”带有“泡沫”成分，“计算”技术的优越性容易让人忘记其“双刃剑”的一面，人性与人文精神的淡化亦令人担心。计算史学只有在交叉、突破和自我觉醒中不断重塑自身科学性，才会展现出在“大历史”学科、“整体史”学术与“中国史”话语等方面的趋势和未来。

倪凯：《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历史真实》，《世界历史评论》2023年第1期。

摘要：历史哲学由思辨进入分析与叙事阶段，主要关注历史知识的性质。后现代主义历史理论家主张历史真相存在于主体间，历史学家无法直接认识到历史本身，历史学家认识到的是历史的表象与形式。这有一定合理性，但也容易导致怀疑主义。后现代主义强调历史的不确定性，否定理性的主导作用，削弱了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作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历史本体是客观发生的历史事实，马克思将历史看作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强调个人活动对历史的推动作用。马克思的“对象性活动”在认识论上突破了主客体对立的限制，主张人认识到的事物不是表象而是事物本身，人不仅能够认识现实世界，而且能够改造现实世界。

张作成：《当代西方历史理论中的“人类世”话语阐释》，《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4期。

摘要：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到 21 世纪一十年代，在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经历 40 年发展之后，当代西方历史理论界努力寻求历史理论研究新的发展趋向。当代西方学界在探讨历史理论未来发展趋向过程中，呈现的趋向之一是复归面向过去的本体论反思。“人类世”是标识 1800 年以来地球系统历史的地质时间单元。“人类世”话语注重客观存在的过去，并据此认识现在和未来。在复归过去趋向下，约翰·麦克尼尔、迪佩什·查克拉巴蒂分别从环境史、历史理论研究角度阐释了“人类世”话语。他们的阐释在超越“西方中心论”、塑造史学新形态方面具有启示意义。分析“人类世”话语在西方历史理论界的上述因应过程，并阐释“人类世”话语的历史理论意义，对中国历史理论界正在推进的话语体系建设具有一定的价值。

李根、周巩固：《海登·怀特的“中间语态”理论及其对历史书写的启发》
《史学史研究》2023 年第 1 期。

摘要：海登·怀特于 1990 年提出历史书写应该借鉴现代主义文学的写法，运用一种自我解构式的中间语态书写。在这种写法中，作者除了讲述历史，还要把作者书写历史的过程也作为讲述对象，呈现一种“作者内在于写作之中”的状态。怀特认为这种写法尤其适用于史料说法不一、真相难辨的历史事件书写。历史以解构性的中间语态书写，将使作者主导叙事的权威性和叙事脉络的连贯性被削弱，使过去与当下呈现为一种意义互动的关系。怀特的中间语态有其相对主义预设，但其表现复杂历史事件的写法对当代史的书写有所启发，它适合 20 世纪以来史料海量、影音化的趋势，以及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历史复杂性的诉求。

王超群：《论西方微观史学对宏观叙事的构建》，《史学理论研究》2023 年第 2 期。

摘要：微观史学通常被认为与宏观史学相对立并因此被视作“碎片化”的代名词。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事实上，微观史学家在专注于历史细节的同时，也在积极地构建宏观的历史叙事。他们提出了“正常的例外”和“可变的尺度”两个概念作为其宏观叙事的理论根据，并通过个体与社会的关联性、象征性隐喻、追随、深描、比较等方式在研究实践中建立起微观史与宏观史乃至全球史之间的联系。而他们之所以如此，归根结底与其所处的多元主义学术语境有着

密不可分的联系。微观史学与宏观史学特别是与全球史学相融的事实，对于我们走出“碎片化”的历史，以及确立一种辩证多元的历史认知模式具有启发意义。

李根：《微观史研究中的历史普遍性问题——卡洛·金兹伯格微观史理论再探讨》《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3期。

摘要：卡洛·金兹伯格基于“正常的例外”和“推定性范式”的概念理路，论证反常特例何以揭示历史普遍性的理论依据。他针对司法档案中的话语权压制迹象，推断反常案例可能是被有意隐匿的普遍现象，是“正常的例外”，同时辅以“推定性范式”概念支持这种推测的可靠性。金兹伯格强调，“推定性范式”是一种区别于自然科学范式的、适用于分析个性化现象的方法论范式。金兹伯格对微观史在以小见大的问题上的理论探讨比其他微观史学者更为深入，他没有过分倚重人类学模式，而是更倾向以史料考证为要旨的“历史学家的技艺”。不过，推测方法与史学的实证原则有所抵触，其合理性仍有待商榷。

刘洋、王邵励：《有用的过去：公众体育史学的诞生及实践》，《体育科学》2023年第1期。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的体育史书写发生了面向公众的学术转向。通过文献资料法、史学史研究法，对公众体育史学在西方社会诞生的知识背景与初步实践的途径和特征进行了梳理，并评价了其贡献与局限。研究认为：公众史学、新文化史与媒介革命助力于传统体育史的学科突围，催生出公众体育史学。通过书写民间体育经历、展陈共有体育记忆、制作体育纪录影像，借助虚实融合的呈现，西方的公众体育史学家以新范式为公众形塑了具有感召力的集体体育记忆，展现出坚守公众本位、分享解释权威、开放多元媒介和追求致用之道的实践特点。公众体育史学在西方的实践扩大了体育史学研究的范围，同时对体育人才培养、大众体育文化传播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其理论基础、学科地位尚待夯实，服务公众的途径仍有待拓展。当代中国的体育史学也承担着服务公众的使命，应开掘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史选题，为公众提供更高质量的体育文化产品。

徐国琦：《试论体育视角在美国历史研究中的价值》，《清华大学学报》2023年第6期。

摘要：体育在美国历史和社会发展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是影响和凝聚美国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也是美国文化和价值的重要体现和载体。体育

同美国国家建构和美国理念密切相关。自 19 世纪末以来，美国利用体育同当时的强国英国抗衡和折冲樽俎，并通过体育实现世界的美国化和利用体育作为软实力从事文化外交。体育因素在帮助美国崛起以及改善中美关系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体育视野是研究美国历史和社会的一个极好的平台，兼具整体性、代表性和公平性的有效视角，并有跨阶层、跨种族、跨文明等特质。从体育角度研究美国史，不仅大有可为，而且可以从历史角度在无数领域如种族、外交、国际关系、商业、企业、市场和文化交流等方面从事突破性研究，为我们提供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体育尤其是国际体育本身属于文化和国际史及跨国史范畴。目前从跨国史角度研究历史风靡中国及国际学术界。但如何做到，是一个巨大挑战。从体育角度研究跨国史视野下的美国史，可能是一个非常有益和有用的尝试。

王琛：《“威尼斯神话”的沉浮与威尼斯历史书写的嬗变》，《史学史研究》2023 年第 4 期。

摘要：本文分析了自文艺复兴时代以降“威尼斯神话”概念的演变以及对威尼斯历史书写产生的影响，总结了不同时代的学者对“威尼斯神话”的建构与解构、诠释与运用。本文认为，“威尼斯神话”贯穿了文艺复兴以降的威尼斯历史书写，从作为展现威尼斯政治、社会秩序的价值观、理想形象和历史记忆，进而褪去政治色彩，逐渐成为考察威尼斯历史的主导性研究路径。其框架结构与书写实践所具有的动态特征，折射出文艺复兴时代以降西方历史书写范式的转变，突显出历史与现实间的复杂关系。

朱明：《意大利史书写中的“记忆转向”与“全球史转向”》，《史学理论》2023 年第 1 期。

摘要：20 世纪 90 年代，意大利兴起“历史记忆”的研究潮流，这是受当时席卷欧洲的“记忆之场”趋势影响的结果。20 年后，意大利又兴起“全球史”书写，将意大利史放在全球框架中展开。从“记忆之场”到“全球史”，这两次“转向”体现了意大利史书写的发展和演变。一方面，它受地方多样性、共和危机、欧盟困境、全球化等现实因素的影响，地方、国家、区域、全球在不同层次上与意大利的现实相互交织，影响意大利的本国史研究；另一方面，意大利历史书写长期以来又有为民族认同和国家建构服务的强烈倾向，故而强调以民族国家为本位。以民族国家整合为宗旨的历史写作还将在意大利特定的历史和现实背景

下艰难跋涉。

柏悦：《兰普莱希特文化史观的国际传播》，《史学月刊》2023年第12期。

摘要：德国文化史家卡尔·兰普莱希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写作多部文化史巨著，并提出了一系列文化史观点。兰普莱希特的文化史观在德国学界引发巨大争议，同时，在欧美国家乃至东亚国家广泛传播，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和热议。这一史学现象得益于兰普莱希特文化史观与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的新史学运动之间的同频共振，反映了20世纪初以来日益紧密的史学交往。另一方面，德国以外的学者出于为自身研究需求服务的目的，更多地聚焦于兰普莱希特文化史观中的“新史学”部分，一定程度上对于这种“新史学”的实际价值和意义未予以彻底的剖析，对于他的文化史观中所渗透的德国传统史学的底色也没有察觉，这成为史学传播与交流之中的典型案例。

夏玉丽：《约阿希姆的普遍历史观念》，《史学史研究》2023年第3期。

摘要：在普遍历史观念主导下看待和书写历史，是西方史学的一个重要传统，这一观念大致经历了政治的、宗教的和理性的三种样态。在西方普遍历史观念从宗教演变为理性样态的过程中，12世纪意大利基督教思想家约阿希姆扮演着重要角色。他在人类世俗历史的框架中，构建出一种类似于基督教上帝拯救历程理论的普遍历史观念。这种观念虽仍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但其侧重从尘世生活和人的能动性角度，理解整个人世历史的演进。这使其历史理论具有明显的世俗化特质，可被视为西方现代以理性为主线的普遍历史观念的原初形态，构成西方历史哲学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一环。

王严：《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尼日利亚的史学危机及反思》，《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4期。

摘要：尼日利亚是当代非洲史学最早的诞生地之一，以伊巴丹学派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史学曾享誉非洲内外。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尼日利亚史学出现了史学组织、历史学专业招生与史学的社会价值等方面的危机。民族主义史学家从历史理论、研究方法与研究主题等方面反思本次危机，认为这是民族主义史学自身研究内容与方法上的缺陷和政府实施忽视人文社科系列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反思的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应对危机的举措：改变过去经验主义的做法，注重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提倡重今薄古，加强对当代史的研究；超越政

治史，将史学研究扩大到族群关系史、经济史、国际关系等与非洲当代问题密切相关的研究主题，并主张改进史学研究方法。

王立新：《现代性中的传统：英印殖民统治和正统印度史学的创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23年第4期。

摘要：正统印度史学通过雅利安文明叙事建构了一个“传统性”的历史空间，而新印度史学通过以莫卧儿帝国为起点的新历史叙事建构了一个“现代性”的历史空间。以托马斯·梅特卡夫为代表的新印度史学家将正统印度史学解读为英印殖民统治的意识形态虚构。本文通过追溯正统印度史学产生的历史社会学脉络，表明正统印度史学的知识建构同18世纪中叶以后世界历史空间的现代转型和印度殖民地现代性的历史密切相关。正统印度史学建构的传统性历史空间本质上是殖民地现代性的发明和创造，而并非是对前现代印度历史的客观呈现。正统印度史学本身则构成了英印殖民主义国家治理术所依赖的知识工具之一，从而应被看作英印殖民统治历史的一部分：它是一项殖民主义知识工程。

钱静怡：《日本二战后历史学脉络中的中世国家史研究》，《复旦学报》2023年第1期。

摘要：日本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世国家史研究先后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战后初期在唯物史观的影响下，中世国家史研究的主题是以幕府为中心考察日本封建国家的成立。至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权门体制论”的提出，长久以来盛行的公武对立史观得以克服，中世国家并非仅由武家政权构成的认识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此后在批判和继承“权门体制论”的过程中，“东国国家论”成为探究日本中世国家体制的另一重要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以幕府为中心的“封建国家论”，到20世纪60年代统一公武的“权门体制论”，再到20世纪70年代重提幕府独立性的“东国国家论”，战后日本的中世国家史研究呈现为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路径。永原庆二、黑田俊雄和佐藤进一这三位代表性学者，各自在不同时代先后引领了研究潮流，与日本左翼史学国家理论在战后三十年的阶段性发展轨迹相呼应。

杨洪源：《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发生学探究》，《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0期。

摘要：基于近年来新的考证和发现的文献，从发生学上重新考察马克思创立

唯物史观的思想历程，有助于彰显马克思哲学的根本变革意义。青年黑格尔派是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重要参照系，“复原”他们之间的三次思想论战过程，本身即是对唯物史观形成过程的呈现。其中，马克思在围绕“犹太人问题”同鲍威尔的持续论战中，初步建立起人的解放理论和以群众为历史主体的群众史观。此时，马克思所秉持的是现实人道主义的立场。他在与鲍威尔及其伙伴所代表的思辨唯心主义的论战中，实现了对唯物主义史的初步考察，并将现实的个体的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随后，马克思又一次通过批判青年黑格尔派主要成员的新观点，正面阐释了社会和历史的前提及动力机制、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分工的后果与发展前景、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等，完成了唯物史观的创立。

丁燃：《本雅明“意象化思辨”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新阐释》，《世界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

摘要：与同时代西欧各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有所不同，本雅明既反对以实证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来解读马克思主义，也反对以激进政治和历史进化论来解读马克思主义，他用了一种独特的“意象化思辨”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进行辩护。本雅明将“潜存的超验意志”纳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主张以批判性、反思性与非体系性的意象化思辨，激发作为世界历史主体的大众和无产阶级重新认识共产主义，突破历史宿命论，将革命契机置于当下，使共产主义成为新的社会历史聚合形式，完成人类解放之道路。

沈坚：《简论20世纪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学月刊》2023年第11期。

摘要：马克思主义与年鉴学派20世纪法国历史学曾对世界历史学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深刻地影响了法国当代史学的面貌。纵观20世纪的历史图景，大多数学者都会同意以下观点，即还没有任何一个学术流派如同年鉴学派这般对历史学产生过如此深刻的影响。他们在历史研究方法上追寻跨学科的对话；他们扩展了历史学家赖以介入过去的资料来源和问题；他们反对狭隘的、政治的和传记式的历史叙事方法；他们追求描绘全景式的整体史。这些特点和其他诸多革新彻底地改变了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范丁梁：《20 世纪德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波荡与回响》，《史学月刊》2023 年第 11 期。

摘要：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政治遗产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自我理解与形象塑造也大相径庭。在德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命运多舛。从威廉二世的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纳粹德国、分裂的东西德到再统一的德国：政权的频繁更迭与全面对峙，虽然在某些阶段为马克思史学拓展了生存空间，但在更多时候带来的却是敌视与压制。

费晟：《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流变及其特点》，《史学月刊》2023 年第 11 期。

内容简介：马克思主义史学曾经积极助力澳大利亚本土历史学科的发展，几经挑战与流变后，今日澳大利亚学界依然承认其启发性。澳大利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劳工史领域取得了最为丰硕的成果。它发轫于本国工人运动及国际共运的热潮，也持续影响了工运实践，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了特性鲜明的学术共同体，其发展史本身就印证了唯物史观的重要判断。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促进了澳大利亚史学的整体发展，也成为国际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

杨力：《二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妇女史的发展》，《史学理论研究》2023 年第 5 期。

摘要：二战结束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日本史学界占据重要地位。作为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重要分支的妇女史，其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945 年日本战败至 20 世纪 60 年代，是战后马克思主义妇女史的“首次开花期”。第二阶段从 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妇女史范围逐渐扩大，同时多元发展。第三阶段自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呈现跨学科交流、引入和深化西方性别概念等特质。总体而言，战后日本妇女史的起步受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决定性影响，之后与民众史、欧美第二波女性主义思潮产生互动，其独特的发展路径不仅充实与丰富了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也给妇女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案例。

王晴佳、杨力：《情感史研究的跨学科实践——以日本情感史发展为例的讨论》，《学术月刊》2023 年第 6 期。

摘要：近年来情感史成为一个新兴的史学流派在世界各地兴起，日本也不例外，其情感史的研究与西方相比，有着不遑多让之势。情感史在日本史学界的发

展，与其史学现代化和职业化的特点有关。自 19 世纪末开始，学院派史学之外的“新闻史家”和“民众史家”，十分活跃。二战之后，在民俗学、人类学的帮助下，“民众史”的发展颇具声势，并与法国年鉴学派阿兰·科尔班(Alain Corbin)的感觉史、感性史研究，交流密切。进入 21 世纪之后，情感史在日本学界进一步发展，新的刊物和论著不断涌现。这一形势的形成，与情感研究在其他学科的长足进步，关联密切，相辅相成。日本情感史研究的跨学科路径，既反映了情感史研究的共性，同时又兼具日本学术的特性，为情感史研究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实例，值得中国学界参考、借鉴。

赵汀阳：《历史性与存在论事件》，《中国社会科学》2023 年第 7 期。

摘要：创世史观的历史哲学，基于历史性的三维概念：(1) 创世性的存在论事件。以存在论为方法来解释人类文明的结构和秩序如何被创造出来，即解释结构—秩序的起源。这是历史性的本源维度。(2) 递归的问题。以“溯因逻辑”去发现和分析哪些问题在历史中不断递归出现。递归出现的问题必是文明的根本问题，也是推动人类不断发动创世事件的根源。这是历史性的溯源维度。(3) 历史的意义涌现。历史的意义在于未来性，是后效意义而基于过去、现实和未来的传递性。理解历史的意义涌现需要以“因果涌现”的方法去分析历史何以形成通向未来的传递性。这是历史性的传递维度。

王晴佳：《历史书写应否包含道德评判？——现代史学观念转向一瞥》，《世界社会科学》2023 年第 1 期。

摘要：1824 年，德意志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在其处女作中指出，历史书写需要走出道德训诲的传统，力求“如实直书”，客观治史。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史家查尔斯·比尔德将兰克的信条贬为“高尚的梦想”，此后历史书写能否包含道德评判成为史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血腥和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残暴，现代史家逐渐认定历史的书写必然承载一种道德责任感：史家需要同时面对生者和死者，因此历史与道德紧密相连，无法切割。但与后现代主义理论不同的是，他们并不认为历史书写可以随心所欲；相反，当代史家最新的努力是在摒弃以兰克为代表的近代史学传统之后，寻求如何重建历史研究和书写的“规范性”，以期更好展现史学与时代之间日新月异的互动和关联。

陈恒：《谁在叙述谁的全球史：不对等与历史书写的陷阱》，《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11期。

摘要：“全球史”是当下流行的一种历史书写方式。世界历史已得到客观表述，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似乎都拥有平等的发言权，学术正越来越被视为一种同质化的行为方式。但在历史书写的实践中所呈现的是西方历史学家可以忽略非西方历史学家的作品，照样可以写出杰出的著作；非西方历史学家认为有必要参考西方的历史著作，否则就缺乏学术含量。这种现象是一种不对等，更是一种不平等，这种不对等是一种“无知的不对等”，源自一种源远流长的“不对等概念”：“文明”与“野蛮”“自由”与“奴役”等已经根深蒂固地镶嵌在西方文明的基因之中，只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不断改变自身的表现形态，以一种更加客观的思想、观念、知识来呈现一种看似公平的“学术理想国”，实则在维护某种文化霸权。这些不对等观念在发展多样性的今天已备受质疑。质言之，全球史是西方史学发展的最新阶段，虽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我们如果认识不到其背后的思想逻辑、话语逻辑、叙事逻辑、发展逻辑乃至政治逻辑，就只能永远深陷“所谓西方文化的大叙事”之中。

刘德斌：《全球史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拓展》，《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7期。

摘要：面对百年变局的持续演进，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全球史研究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拓展带来了诸多启迪。它揭示了非西方国家被“西方的崛起”所遮蔽和简化的历史，并将当今世界的“底色”更为清晰地展现出来；它的研究主题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研究议题高度“契合”，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与时俱进和理论创新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知识背景；它重构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的努力不仅丰富了人们对民族国家的理解，也为反思和批判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不一样的世界历史话语。不仅如此，在全球史视域中，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为超越西方大国的兴衰逻辑提供了历史依据，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倡议亦为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注入不竭动力。

董欣洁：《全球史与国际关系研究的空间融合》，《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7期。

摘要：空间，特别是社会关系空间，既影响着人类的生产和交往，又在人类的生产和交往中演变生发，是全球史和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范畴和重要研究内

容。由于全球史与国际关系研究都注重横向交往，两者在空间上的融合，如国家之间交往形成的区域性跨国空间，正在凸显生产要素在人类交往中的基础作用，以及生产与交往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两种基本动力的开拓能力。互联互通、互利合作、相互依存的全球空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不同区域和层次的各种空间的融合，将汇总为“全球”与“国际”，动态地展现人类各种群体的发展形态和世界面貌，促使全球史与国际关系实现历史与现实的相互映照，为中国全球史和新型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奠定空间维度的共同基础。

王晴佳、蔡霁安：《放眼全球、再现亚洲：全球史在东亚的兴起、演变和前景》，《江海学刊》2023年第2期。

摘要：19世纪以来，民族主义思潮在东亚盛行，历史书写的传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其影响至今犹存。为了抵御西方强权，东亚各国的史家“开眼看世界”，开展了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其中重要的一支。二战结束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和日本都有了长足发展，进一步促进了世界史的发展，日本则还有其他学者、学派的介入。21世纪以来，全球史的兴起在东亚各国造成了很大的反响，促使世界史的研究进一步转型。全球史或全球史观为亚洲学者走向世界、呈现亚洲创造了一个契机。但全球史的盛行是否能改变民族主义的历史思维，仍然有待时日。

吴晓群、阿慧访谈整理：《驼铃：在学习与求索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道路上——张广智与西方史学史研究访谈录》，《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5期。

摘要：张广智，1939年生，江苏海门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顾问、《史学理论研究》杂志顾问。他长期从事史学理论与西方史学史研究，曾荣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上海市世界史学会终身学术成就奖等。本次访谈主要围绕张广智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走上史学理论与西方史学史研究的道路、开展研究实践求索及其对青年学者的殷切期望展开。

（五）国外期刊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论文

Adam Sutcliffe, *Hume, History, and the Uses of Sympathy* (休谟, 历史以及同情的运用), *History and Theory*, Vol. 62, No. 1 (2023).

摘要: 该文着重探讨了同情和反感在大卫·休谟的《英格兰史》(1754 - 1762) 中的角色, 联系于同情在休谟道德哲学中更为广泛的地位。在他早期的哲学作品中, 休谟认为同情是一种对他人感情的自然反应, 类似于音弦之间的共鸣。然而, 在他的《英格兰史》中, 他精心引导读者的情感反应, 促使他们对遭受苦难的人物产生同情, 例如查尔斯一世和苏格兰玛丽女王, 然而, 几乎与此同时, 激起读者对那些他认为危害社会且难以理解的宗教极端主义者产生强烈反感。继首先将休谟同情理论的出现置于 18 世纪早期的背景之后, 本文详细探讨了休谟情感管理的技巧, 这些技巧贯穿于《英格兰史》六卷本中。休谟在历史学中精心运用情感的做法表明与他的自然式人类同情哲学的某些方面以及他对历史写作的简短反思存在紧张关系。休谟将读者的同情引向特定的目标并反对他人。对此的仔细分析有助于揭示现代史学中对同情的处理, 休谟在这方面有着持久的影响。

Nico Mouton, *An Apologia for Arthur Lovejoy's Long-Range Approach to the History of Ideas* (为阿瑟·洛夫乔伊观念史的长期方法而辩护), *History and Theory*, Vol. 62, No. 2 (2023).

摘要: 阿瑟·洛夫乔伊观念史的长期研究方法很少受到赞赏, 而且大部分被摒弃了。洛夫乔伊受指控的谬误有很多。他的批评者指责说, 他将观念视为具有本质的永恒实体, 它独立于个体思想家, 与特定文本相分离, 与即时背景相孤立, 与思想变化相隔绝, 其它谬误暂且不论。本文为洛夫乔伊辩护, 反对这类攻击, 并认为他的方法仍然是可行的和有价值的。

Helen Zhao, *Counterfactual History: Three Worries and Replies* (反事实历史: 三种担忧与回应),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Vol. 17, No. 1 (2023).

摘要: 本文旨在阐明对反事实、替代性或假设历史的怀疑主义的核心所在。从表面上看, 反事实历史有着让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充分担心的理由。首先, 因为反事实过去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历史学家缺乏一个经验证据的重要来源。其次, 因为改写历史事件可能会不可预知地改变过去, 所以对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推断似乎只能从实际发生的事情的概括当中得到微弱支持。第三, 反事实的叙事似乎特

别容易受到一厢情愿的想法的影响。最后，通过对规范反事实叙事构建的认知价值的考虑，我整理了针对这些反对意见的论据，并捍卫了该项目的合法性。尽管如此，我仍希望表明，反事实历史绝不仅仅是一个“室内游戏”，它提出了一些深刻而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即历史学家是否有能力了解我们的过去，我在这里只讨论其中的一些问题。

Jonas Ahlskog, *Pre-Narrativist Philosophy of History*(前叙事主义的历史哲学),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Vol. 17, No. 2 (2023).

摘要: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叙事主义转向之前,历史哲学关注的是行动和主体。从柯林武德和奥克肖特再到狄尔泰和伽达默尔,前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家都认为,以动机为中心的行动解释构成了历史研究中不可化约的元素。本文重新审视了作为前叙事主义历史哲学重要洞见之一的以动机为中心的视角。这种洞见不仅在叙事主义转向以后的历史哲学中被忽视,而且从根本上被误解了。本文提出了两个相互关联的论点:(i)以动机为中心的视角正是历史知识的内在观念;(ii)以动机为中心的视角在认识论上先于回溯性的(重新)描述,后者一直是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焦点。作为结论,本文认为以动机为中心的视角和回溯性视角构成了两种整体的和不可化约的历史思维模式。

Esin Paça Cengiz, *Rethinking the Historical Film form: Trauma, Temporality and Indirect Representation in Historical Essay Films* (重思历史电影形式:历史散文电影中的创伤、时间性与间接再现), *Rethinking History*, Vol. 27, No. 3 (2023).

摘要: 在电影研究中,历史电影被视为一种描绘过去发生的事件和经验的形成式。然而,通过立足于卡鲁斯的间接再现概念,本文确定了一种新的历史电影形式,它不一定以过去为背景,而是涉及历史、记忆和历史再现的问题。本文将这种“历史散文电影”的新形式概念化,并通过分析《我父亲的声音》,认为历史散文电影并未显现出直接表现创伤事件的愿望,而是避免了电影这种媒介可以表现过去事件的实在的假设。为了实现此目的,它们通过设定在当下背景的叙事以间接地处理过去的创伤。该研究进一步认为,历史散文电影的主旨是探索话语领域,在这些领域中,过去的某些时刻被固定、叙述并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其他时刻则被忽视和未被解释。文章最后总结道,由于其非常规的形式结构,历史散文

电影缩小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时间距离，同时也为重新思考历史表现的意义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Eugenia Gay, *More Than Meets The Fact: The Universality Of History And The Colonial Mediation* (超越事实：历史的普遍性与殖民调解), *History and Theory*, Vol. 62, No. 3 (2023) .

摘要：本文探讨了调解如何不仅仅局限于所选择的格式，以传达先前进行的研究的结果，这些研究应该遵循历史学科的传统协议。相反，它认为调解是建立历史知识的基本部分，因为它假设历史编纂操作的每个部分都可以定义为“调解”。具体来说，它涉及殖民历史调解，这一概念指的是公开或隐蔽的议程、有意或未被注意的偏见、常识性假设、继承的学术和政治传统、概念星座以及或多或少知情的理论信念的结合，这些理论信念构成了历史解释所依据的潜文本，特别是在拉丁美洲。

Anne Fuchs, *On Futures And Endings: Narratological Reflections On Contemporary Forms Of Crises* (论未来与结局：对当代危机形式的叙述学思考), *History and Theory*, Vol. 62, No. 3 (2023) .

摘要：本文从叙事学的角度考察了现在与未来的关系变化。本文认为，在西方社会想象中，三种主要的叙事模式构成了当代临时性经验：现代危机叙事、世界末日叙事和长期危机叙事。文章的第一部分展示了十八世纪末出现的现代危机感如何通过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编织成一个统一的情节而沉淀为一个强大的叙事模板。第二部分重点关注西方社会想象和人文话语中世界末日故事的复苏。最后一部分强调了不稳定性美学对西方时间和时间性想象的特殊贡献。它认为，“慢性危机叙事”消解了现代危机范式的目的论叙事弧线，同时也回避了世界末日叙事的末世话语。

Sanjay Seth, *Reconceiving The Practice Of History: From Representation To Translation* (重新认识历史实践：从表现到翻译), *History and Theory*, Vol. 62, No. 1 (2023) .

摘要：历史不是对过去遗留给我们的资源的严格方法的应用，而是以特定方式构建“过去”的编码实践，本文试图描述这种编码的关键要素。现代历史将过去的物体和文本视为人类的物化遗骸，这些人类赋予了他们的世界意义和目的，

同时受到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的限制。他们的这个时代已经死了，只能再现，不能复活；过去只是人类的过去，它不包括鬼、神、灵魂或自然。如果正如本文所论证的那样，“过去”并不是独立于人们认识和表现它的方式而存在的，那么，在现代历史形式成为主导之前，人类发展和运用的许多不同的历史模式，就不能用“过去”来衡量，以比较它们在表现它时的准确性或充分性。本文的最后一节提出了一个问题：当我们为那些不认同现代学科的假设，但却拥有自己的历史性模式的人撰写历史时，我们在做什么？它问道，当我们书写前现代和非西方历史时，所产生的知识的性质和地位是什么？

William M. Reddy , *To Fly The Plane: Language Games , Historical Narratives, And Emotions* (飞行飞机：语言游戏、历史叙述和情感), *History and Theory*, Vol. 62, No. 1 (2023) .

摘要：西方对理性和情感的普遍区分（在西方影响的传统之外没有发现）往往掩盖了两种思维之间的重要区别：一方面是逻辑和数学推理，另一方面是有时被称为“情境意识”的思维，这种思维涉及努力同时考虑对一种情况的多种真实描述。正如评价理论所理解的那样，情感（即固有的认知和意图）是一种思维，它有助于——实际上，对这种意义上的情境意识至关重要。意图也属于情境意识。无论我们追求什么样的长期目标，当前的行动都必须适应当前的环境。人们面临着无数种描述任何时刻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方法，而第二种思维涉及努力识别这些真实描述的关键子集，人们可以通过有意的行动、程序或计划来做出反应。在这个意义上保持态势感知是“机组资源管理”（CRM）的目标，这是一种旨在确保航空安全的机组团队合作策略和情绪机制。维特根斯坦、安斯库姆、奥斯汀、哈贝马斯和丹托等人的哲学著作有助于解释船员资源管理的显著成功。本文通过简要讨论 1551 年至 1562 年间安托万·德·波旁和让娜·德·阿尔布雷特的信件来检验这种解释在非现代语境中的适用性。

Marc Dorpema, *Narrative, Emplotment, Power: on Agency and the Environment*(叙事、情节化、权力：论代理与环境), *Rethinking History*, Vol. 27, No. 3 (2023) .

摘要：代理、叙事情节和权力问题对于环境史学家的工作至关重要。为了扩大研究这些相互关联问题的方法论工具箱，本文在分析中对代理人和行动者进行

了区分，试图引导我们摒弃以人类为中心的代理人论述，转而更清晰地理解在进行和书写人类以外的历史叙事时所涉及的权力结构和过程。本文认为，要想更全面地了解权力是如何通过环境和环境所容纳的人而运动的，扩大权力的范围至关重要，本文通过对近期大量环境史著作的批判性阅读，或明或暗地论述了非人类权力的作用，从而证实了这一观点。在此过程中，本文探讨并质疑了国家与环境、人类与环境以及意识形态与环境之间的动态关系。

Teorie Vědy, *Quentin Skinner's Attempt to Clarify Collingwood* (昆廷·斯金纳尝试对柯林武德的阐明), *Theory of Science*, Vol.1, No.1 (2023).

摘要: 本文考察了昆廷·斯金纳的方法论命题，他对包括科学史和哲学在内的知识史的影响不容忽视。众所周知，斯金纳的方法是基于约翰·L·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尽管如此，将普通语言哲学应用于历史主题的想法本身就建立在斯金纳历史哲学的其他假设之上。本文着重于重建这一历史哲学，特别是将柯林武德作为其主要的灵感来源。这位著名的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撰写了许多关于历史技艺的鼓舞人心的文本。他死后出版的文本的复杂性，有时是矛盾的，需要仔细解读，因此许多哲学家认为柯林武德是一个晦涩难懂的思想家。本文认为，尽管斯金纳公开谴责柯林武德的“重演”概念，但他的历史哲学深受柯林武德对历史具体理解的影响。

Mark Ian Thomas Robson, *Acts Of Thought and Re-Enactment in Collingwood's Philosophy Of History* (思想的行动和柯林武德历史哲学的重演), *History and Theory*, Vol.62, No.4 (2023).

摘要: 这篇文章探讨了柯林武德最令人困惑的观念之一——在重现过去的思想行为时，我不仅可以复活该行为的命题内容，还可以复活思想行为本身。柯林武德思想的这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如果不被忽视，也是几乎被普遍拒绝。毕竟，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两种思考行为——比如说，卡罗尔周三在图书馆的思考行为和哈罗德周四在书房的思考行为——实际上是完全相同的？我探讨了这个人令人困惑的观点，尤其是柯林武德的论点，即思想行为可以具有延续性。我试图展示如何利用延续同一性的概念来消除柯林武德关于思维行为之间的字面同一性主张中的一些困惑。因此，我展示了哈罗德在周四可能会经历与卡罗尔在周三完全相同的思考行为。

Pedro Cristovão dos Santos, *Historians and Programmers in the 1970s: Formal Languages, the Writing of History, and Ideas of Science* (20 世纪 70 年代的历史学家和程序员：形式语言、历史写作和科学思想),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84, No.1(2023).

摘要：本文分析了历史学家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转向计算机进行历史研究后提出的一些问题。重点是通过研究计算机程序员同时在自己的领域中进行的辩论来丰富这一背景。尤其是讨论了使用形式语言来增强这两种实践的理论基础。第二，编程中的争论也得到了强调：随着历史学家转向计算机编程，程序员自己正在成为实践的历史学家，参与关于如何书写历史的方法论讨论。

Lou Cornum, *Seizing the Alterity of Futures: Toward a Philosophy of History across Afrofuturism and Indigenous Futurism* (抓住未来的交替：跨越非洲未来主义和本土未来主义走向历史哲学), *History of the Present*, Vol.13, No.2(2023).

摘要：这篇文章将人们对未来和少数民族未来日益增长的兴趣与反思小说的运动联系起来，特别是非洲未来主义和土著未来主义，以及这一类型重新想象历史和未来的方式。这些进展通过两本开创性的选集——《暗物质》（非洲侨民的反思小说集）和《漫步云端》（土著科幻小说集）——以及它们出版的社会条件进行解读。这篇文章利用沃尔特·本雅明的作品和他反对历史进步概念的写作，为历史哲学奠定了共同的基础，这种哲学用其他形式的反思想象颠覆了反思驱动的资本主义的独特未来。

Alexander Nachman, *The Cambridge 'Gang' Meets Iranian Intellectual History: Reimagining Conservatism in Context* (剑桥学派遇上伊朗知识史：语境中的保守主义重塑), *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Vol. 20, Issue 3(2023).

摘要：2016 年 5 月，伊朗人文刊物《今日文化》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剑桥知识史学院的文章。该杂志的学术讨论会虽然不是伊朗学者对剑桥学派的唯一干预，但可能是迄今为止对剑桥学派与伊朗知识史之间关系最复杂的探索。它讨论了 Hātam Qāderī 将剑桥学派视为一种英国和伊朗的保守史学潮流。这篇文章探讨了，剑桥式的历史是如何作为一种保守的方法来呈现的，学校对伊朗人的欢迎会告诉我们这种呈现的目的是什么？此外，Qāderī 和他的同行是如何试图通过与伊朗其他史学潮流的分歧来改革伊朗史学的？

Takuya Furuta, *J. R. Seeley in Japan, 1880s-1940s* (J·R·西利在日本, 1880年代-1940年代),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66, No.2(2023).

摘要: 本文探讨了 19 世纪末英国历史学家 J·R·西利在日本是如何被“利用”的。重点是他于 1899 年、1918 年和 1942 年出版的《英格兰的扩张》的三个译本。通过将每一个翻译放在上下文中,我试图澄清那些制作翻译的人所采取的意识形态行动。在第一次翻译的背景下,西利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提出了日本未来的愿景。然而,在第二种情况下,他成为了理解当今英国政策的一个镜头。在第三种情况下,他无意中诋毁了英国过去在印度的殖民政策。通过对这三个译本的比较研究,本文揭示了西利的帝国史的“潜力”和翻译的“创造性”两个方面,西利的作品在英语中并未被耗尽,从而为地方和全球的知识史做出了贡献。

Olaf Blaschke und Simon Potthast, *Veit Valentins‘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Revolution 1848-1849’ Eine Vorläuferin Transnationaler Geschichtsschreibung?* (维特·瓦伦丁的《1848-1849 年德国革命史》是跨国历史学研究的先驱吗?),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Bd. 316(2023).

摘要: 今天的当代历史研究必须是“跨国的”。事实上,自 2001 年以来,跨国方法有助于克服方法上的民族主义,并产生关于跨国行为者、思想和文化以及跨国空间的新知识。但跨国史学究竟有多新? 1967 年,罗伯特·K·默顿(Robert K.Merton)说:“因为他们不熟悉早期的作品,出生较晚的学者们的发现最终被证明是重新发现。”。至少在 1848 年的革命中,可以看出维特·瓦伦丁在 1930-31 年就已经富有成效地将跨国视角纳入了先锋派。诚然,在脆弱的魏玛共和国,这位民主历史学家还有其他优先事项。因此,他声称不受欢迎的革命是“超国家的欧洲革命”,但通过模仿、转移和改编其他模式,也包括德国模式,而反革命分子则形成了“第一个国际革命”。瓦伦丁在革命史学中被尽职尽责地称为“经典”,但他的两卷本著作显然很少被深入研究。事实上,它包含了对德国欧洲革命宪法和文化史的惊人数量的跨国见解。然而,最近一些没有意识到这些前辈的研究仍然宣称跨国史是一种新事物。这是一个披着新发现外衣的复仇者。但也与 1930-31 有所不同。

(六)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方向硕博毕业生论文

北京大学 2023 届硕博毕业生论文

类别	姓名	导师	论文题目
博士	刘丽	唐利国	本居宣长思想研究
博士	马丹	咎涛	杰巴尔提《埃及编年史》研究
硕士	李玥彤	李隆国	历史知识的大众化：德意志帝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研究
硕士	刘泽辉	李隆国	毛主义史家的破与立：拉纳吉特·谷哈早期学术与政治的联系
硕士	徐殊	朱玉麒	碑志入史：《新唐书》人物列传研究

清华大学 2023 届硕博毕业生论文

类别	姓名	导师	论文题目
博士	石烁	彭刚	英国斯图亚特王朝晚期的早期女性主义（1673-1714）
硕士	叶竞成	彭刚	大革命的幽灵——福柯的批判谱系学和政治现代性反思，1971-1984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2023 届硕博毕业生论文

类别	姓名	导师	论文题目
博士后	陈甜	夏春涛	新时代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研究
博士	刘江	左玉河	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所）研究
硕士	陈岩	刘巍	过渡时代政道之求索：以民、国关系为视角的梁启超政治思想研究
硕士	蒋厚伟	董欣洁	伊格尔斯的全球史学史书写：从反思史学传统到构建全球联系

复旦大学 2023 届硕博毕业生论文

类别	姓名	导师	论文题目
博士	阿慧	吴晓群	析约瑟福斯历史写作中的自我塑造——以《犹太战争》的相关叙述作为讨论中心
硕士	陈计宏	吴晓群	跨国史视野下 19 世纪早期美国留德学生的学术旅行 ——以班克罗夫特在哥廷根为讨论核心
硕士	张赟超	张智	基佐与 19 世纪法国学界关于族源问题的历史书写
硕士	伍繁启	张智	拉法格对劳动的批判及其法国语境

中国人民大学 2023 届硕博毕业生论文

类别	姓名	导师	论文题目
硕士	储子豪	张瑞龙	先秦时期“三公”说的产生与发展
硕士	孙乙森	姜萌	史学理论视域下的历史政治学
硕士	孙夏杨	姜萌	“开通民智”与“叛逆邪说”：清末趋新潮流中的“演说”
硕士	郑磊	伍婷婷	作为事件、记忆和研究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拍摄

北京师范大学 2023 届毕业硕博毕业生论文

类别	姓名	导师	论文题目
博士	娄梦然	瞿林东	从制度史撰述看清前期的统治理念——以《清朝文献通考》为中心的考察
博士	郭露凝	张越	清末民初日文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译研究
博士	张杰	张越	《史通》的近代史学接受史
博士	夏玉丽	董立河	约阿希姆的普遍历史观念研究
硕士	赵胤琦	汪高鑫	明代学校历史教育研究
硕士	胡龙	张越	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早期发展研究（1929-1937）
硕士	汤阳	张越	以传载史：清末新式史传与“新史学”思潮（19世纪末到1911年）
硕士	崔高翔	周文玖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再审视——以西周封建论为例
硕士	付涵宾	周文玖	沈约《宋书》的特色与成就
硕士	李理	董立河	“人类世”时代的历史哲学与历史实践
硕士	杨凝凝	王志刚	从清史到《清史稿》——一项历史编纂的过程史探究

南开大学 2023 届硕博毕业生论文

类别	姓名	导师	论文题目
博士	扈晓冰	姜胜利	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
博士	吴东铭	孙卫国	朝鲜王朝官方修史制度研究：1392-1800
硕士	李昕洋	孙卫国	明清时期的女性史家与史学（1368-1911）
硕士	杨睿雯	崔岩	沈约史学思想中的个人意识研究
硕士	杨书青	朱洪斌	“嘉定三屠”的历史记忆及其演变理路
硕士	杨子瑄	朱洪斌	历史知识社会化视野下的历史写作与知识传播——以巴巴拉·W·塔奇曼的史学实践为中心

山东大学 2023 年届硕博毕业生论文

类别	姓名	导师	论文题目
博士	范静静	王学典	古史辨与今文经学关系再研究
博士	韩博韬	王学典	庞朴学术思想研究
硕士	李方艳	王学典	“历史主义的挫折”——1962 年“孔子学术讨论会”研究
硕士	康辉	陈峰	《新建设》与新中国十七年人文学术研究的嬗变
硕士	吕兰海	陈峰	新启蒙史学的一翼：刘泽华学术思想研究
硕士	王琼	郭震旦	文本与史实之间：中古禅代书写研究
硕士	耿雪珽	郭震旦	中国传统地权分化研究的史学史考察（1944-2022）
硕士	刘之湄	李扬眉	循着顾颉刚的“故事眼光”重审“层累说”——兼与钱钟书的史学观念及治学方法论比较
硕士	袁一心	杨华	四十多年来的西方瘟疫史研究
硕士	邱尤龙	法帅	经史关系视域下朱熹天理史观研究
硕士	王际洋	法帅	庞朴文化观探析

武汉大学 2023 届硕博毕业生论文

类别	姓名	导师	论文题目
博士	杨德会	谢贵安	先秦记注制度研究
博士	王新杰	谢贵安	近代武汉大学史家与史学研究（1893——1949）
硕士	魏圆圆	谢贵安	清代殉明忠烈的历史书写研究

兰州大学 2023 届硕士生论文

类别	姓名	导师	论文题目
硕士	郭柯鑫	赵梅春	从延安版到修订本：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研究
硕士	李栋良	朱慈恩	民国时期大学中国史学史及相关课程研究
硕士	田启良	朱慈恩	宋代别史类目著录及撰修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 2023 届硕博毕业生论文

类别	姓名	导师	论文题目
博士 后	贾鹏涛	李孝迁	童书业年谱
博士	孙光耀	王东	中国孔庙学研究
博士	王郝维	李孝迁	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史学研究
硕士	李颖	王东	李黎非及其《中国近世史》研究
硕士	王艺群	李孝迁	叶蠖生与通俗历史读物
硕士	舒鸿翔	李孝迁	史学与社会学：法国瑟诺博司与西米昂的论战
硕士	杨睿	王应宪	周木斋史学研究
硕士	王晨睿	王应宪	曹伯韩与历史通俗读物
硕士	李涵	王传	近代日本学界唯物史观史著在中国的传播——以三种中国史著述为中心

华中师范大学 2023 届硕士生毕业论文

类别	姓名	导师	论文题目
硕士	徐文康	尤学工	清初“贰臣”形象历史书写研究
硕士	汪伟亚	尤学工	《史疑》、《续史疑》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 2023 届硕博毕业生论文

类别	姓名	导师	论文题目
博士	于敏	周巩固	美国学界的清史书写趋向研究（1980-2020）
博士	刘洋	王邵励	美国《公众历史学家》杂志研究（1978-2022）
硕士	乔炎	周巩固	男性史在英美学界的兴起及其理论旨趣
硕士	陈浩	周巩固	当代数字史学公众化趋势研究
硕士	田原	王邵励	美国公共卫生史学新趋向研究（1990-2010年）
硕士	王森	武少民	论朱维铮的中国史学史研究
硕士	薄文梅	武少民	论黄宗羲《明儒学案》的历史编纂学特色
硕士	万莹	武少民	从《宋论》看王夫之的历史观

上海师范大学 2023 届硕博毕业生论文

类别	姓名	导师	论文题目
博士	殷开辉	陈恒	雅典瘟疫研究（公元前 431-前 426 年）
博士	田志涛	陈勇	南高学人的日本史研究
博士	陈艺瑞	陈勇	抗战时期四川历史教育研究
硕士	杨阳萌	陈勇	章太炎的管子学研究
硕士	桂思佳	陈勇	《留东学报》研究
硕士	孙启航	陈恒	美国区域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硕士	常哲荣	梁民愷	历史为谁而存在——爱德华·汤普森的史学研究

安徽大学 2023 届硕士生毕业论文

类别	姓名	导师	论文题目
硕士	孔维劲	周致元	邱濬史学思想研究
硕士	刘佳益	朱寒冬	梁方仲史学研究
硕士	董斌	陈金锋	严中平的经济史研究

宁波大学 2023 届硕士生毕业论文

类别	姓名	导师	论文题目
硕士	罗茵宁	钱茂伟	当代村史志类型研究（1980-2020）
硕士	罗婧璇	唐燮军	逯耀东年谱
硕士	罗子玉	郑洁西	《四夷广记》“东夷”类记研究
硕士	方钱隆	童杰	两浙海防类考续编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 2023 届硕博毕业生论文

类别	姓名	导师	论文题目
博士	朱守政	邓京力	“新西部”·“城市”·“全球”——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国环境史的三次转向
硕士	苗志浩	邓京力	大卫·卡尔的历史经验理论研究
硕士	孙忠鹏	江湄	司马光《稽古录》史学价值探析

四川师范大学 2023 届硕士生论文

类别	姓名	导师	论文题目
硕士	赵洪庆	刘开军	范文澜《正史考略》研究
硕士	谭于	刘开军	抗战语境下的《责善》半月刊研究

天津师范大学 2023 届硕士生论文

类别	姓名	导师	论文题目
硕士	汪业霞	李友东	全球史的跨国史转向研究
硕士	连艺晨	李友东	J. A. 曼根的体育史学理论研究
硕士	潘泽月	吴德义	黄光昇与《昭代典则》
硕士	胡心洁	吴德义	张恒寿学术探研

河北大学 2023 届硕士生论文

类别	姓名	导师	论文题目
硕士	钟佩伶	杨倩如	基于“数字史学”理论方法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实践（1950-2022）
硕士	朱小霞	杨倩如	《汉书》英译研究
硕士	王静	申慧青	“战国策派”史学特征研究

河南师范大学 2023 届硕士生论文

类别	姓名	导师	论文题目
硕士	张文静	王记录	民国时期中国史家“历史研究法”著作研究
硕士	张帅统	王记录	正史《方技传》编纂研究
硕士	刘嘉诚	李峰	《资治通鉴》载汉元帝年间史事书写研究

扬州大学 2023 届硕士生论文

类别	姓名	导师	论文题目
硕士	钱彩虹	马约生	张芝联史学研究
硕士	李昊	雍正江	蒋孟引史学研究
硕士	刘暄祯	许志强	陈衡哲世界历史思想研究

淮北师范大学 2023 届硕士毕业论文

类别	姓名	导师	论文题目
硕士	张雅倩	李 勇	曹永和史学研究
硕士	王安	雒有仓	董家遵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硕士	王白云	吴 航	清光绪朝“会典馆”研究
硕士	廖洁仪	吴 航	论罗香林的近代历史人物研究
硕士	彭兴隆	曹金发	万历《合州志》研究
硕士	王莹	牛继清	论程瑶田的水地研究

三、史学理论与史学史重要会议

哈佛大学数字人文国际会议

3月14-16日，美国哈佛大学举办以“业界工具：通往未来”（Tools of the Trade: The Way Forward）为主题的数字人文国际会议，讨论技术与媒介变迁下东亚数字人文研究的最新研究进展与未来发展方向，以及在此过程中数字研究工具对于人文研究的价值与影响、图书馆及相关机构的发展策略等问题。来自中国、日本、美国、加拿大、欧洲各国的学者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和数字人文项目。

“大历史视阈下的国家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

3月18-1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大历史视阈下的国家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会议旨在以宏观的视野，在长时段、广尺度的时空情境中就国家治理相关问题开展研讨。来自科研机构、高等院校、新闻出版单位的五十余位海内外学者应邀与会。会议讨论聚焦政治治理、经济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边疆治理、民族治理、军事治理、灾害治理、基层治理等中外历代国家治理中的关键环节，以及“两个文明”、协商民主、文化建设、“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等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中的重要问题，涉及中国史、世界史、党史党建、政治学、法学、外交学等多个学科，既有视野宏阔的理论阐释，又有精细周密的史实考辨，既有对历史的回顾和追溯，又有对现实的关怀和分析。报告人充分陈述了各自观点，评议人结合相关领域学术前沿作了中肯点评，并提出了具有建设性和启发性的修改建议。各分会场讨论热烈、气氛活跃、节奏紧凑、新见迭出。（历史理论研究所微信公众号）

第四届历史理论研究所青年学术研讨会

3月28-3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联合主办的第四届历史理论研究所青年学术研讨会在西安举办。开幕式由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李军教授主持，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所长夏春涛研究员，西北大学省委常委、副校长吴振磊教授，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陈峰教授致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西北大

学历史学院 70 余位专家学者与会。中国古代史会场讨论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领域。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会场讨论内容涉及抵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灾害治理的现代转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史学思想及其影响、唐代唯物主义思想研究、《史记》《汉书》史表研究等问题。（历史理论研究所微信公众号）

第三届外国史学史青年论坛

4 月 7-9 日，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的第三届外国史学史青年论坛顺利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大学、兰州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全国二十多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围绕外国史学史和史学理论以及中外史学交流与比较等问题展开交流研讨。论坛特别邀请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何平教授以及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徐波教授就外国史学理论中的经典学术问题作报告。

第 25 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

4 月 15-16 日，“第 25 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在济南举办。会议由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史学理论研究》杂志与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联合举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近 120 位专家学者围绕着“古今中西之间：历史学的传承与创新”的会议主题展开热烈讨论。会议涵盖了当前中国史学理论界老、中、青三代，是近年来国内规模最大的一次史学理论研讨会。

与会学者围绕反思和激活马克思主义史学、继承和发展求真致用的史学传统、批判地借鉴和吸纳西方史学、构建中国史学理论体系等重大史学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进一步梳理总结了史学理论与史学史领域的发展历程和经验，包括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古代史学、中国近现代史学、外国史学各个研究方向取得的重要进展，明确了未来的发展方向。相较于往届会议，本届会议呈现出诸多亮点：史学史研究较之理论研究更加密集，而史学理论研究侧重于历史

理论研究；史学家及其思想仍是与会学者研究的重要对象，但在研究视角上多有创新；中外史学交流与互鉴在各个研究领域均受到与会学者的高度重视；基于老一辈学者的培养和引导，中青年学者成为推动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发展的主体力量。（《中华读书报》2023年7月5日版、《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5期所刊会议综述）

“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国化”学术研讨会

4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室、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左玉河工作室联合主办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国化”学术研讨会在扬州大学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夏春涛，扬州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韩杰出席开幕式并讲话。左玉河研究员以“阐释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国化的历程及其特点”为题作大会主旨报告。来自历史理论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学者赵庆云、张德明、李政君、刘力耘、张连勇、程源源、王炜焯、王维佳等，围绕唯物史观与“十七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路向、中国学者对唯物史观的多样性阐释（1937-1949）、《史学要论》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位置、20世纪唐代唯物主义思想研究、中国式现代化与共同富裕的关系、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新推进、“四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术论争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思想转变等问题进行了精彩的报告，探讨了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在中国的演变。（历史理论研究所微信公众号）

中西文明比较研究暨刘家和先生从教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4月22-23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主办的中西文明比较研究暨刘家和先生从教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廖学盛、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瞿林东、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郭书春、陕西师范大学教授赵世超、北京大学教授钱乘旦、清华大学教授刘北成、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韩震、东北师范大学教授韩东育、复旦大学教授黄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徐建新、苏州大学教授柴念东等先后在大会发言，北京大学教授马克垚与复旦大学教授张广智作书面发言。发言学者高度肯

定刘家和先生在 70 年教学生涯中，对推动中国历史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做出的重要贡献。来自美国、加拿大、新加坡和国内数十所高校、科研院所和媒体的近百位学者参会，就中西文明比较研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世界古代史、中国古代史、刘家和先生的学术思想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北师大历史微信公众号）

历史理论研究所社会形态问题座谈会

4 月 27 日下午，社会形态问题座谈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举行，乔治忠、李世安、吴恩远、王启发等近 10 位专家在此次座谈会，围绕对社会形态问题的看法发言，历史理论研究所部分青年学者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若干研究生参加了座谈会。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张顺洪主持，认为马克思主义“五形态说”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是科学的理论。我们要努力坚持和丰富“五形态说”，要进行深入的研究，提高理论水平和理论说服力。（历史理论研究所微信公众号）

《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之十一：层累说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

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文史哲》编辑部重要回信精神两周年之际，《文史哲》编辑部主办的第十一次人文高端论坛“层累说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于 2023 年 5 月 7 日在济南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教育大学、日本埼玉大学、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山东大学以及中华书局、中华读书报社、中国新闻社山东分社等海内外高校、科研与出版机构的近三十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讨论。围绕会议主题，与会嘉宾从“层累说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多向度推进”“上古史重建的路径与方法”以及“顾颉刚与中国现代学术”等不同角度，各抒己见，进一步深化了对“层累说”这一中华文明范畴内重要学术命题的认识，也有助于从实践层面推进对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整体研究。

在本次论坛上，《文史哲》杂志还与《中华读书报》联袂发布了 2022 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这也是两家机构第八次进行此一评选活动。“植根自身经验与历史文化传统，‘中国式现代化’成为统摄全局的重大命题”“远古

历史无法仅凭考古‘自证其身’，中华文明探源仍需多方发力”“叙事史学受到公众热捧，历史撰述呈现多元化取向”等人文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成功入选。及时总结人文学术领域的新进展、新现象、新问题，推动人文学术研究的繁荣与进步，提升公众对人文学术的关注，始终是此项活动的宗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官网）

“新时代中国口述历史的发展与动向”学术研讨会

5月1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口述历史专业委员会主办，廊坊师范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左玉河工作室承办的“新时代中国口述历史的发展与动向”学术研讨会在河北省廊坊市成功举办，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科研院所的50余名学者出席会议。来自多学科、多领域的与会学者围绕口述历史前沿动态、口述历史理论探讨、中国各地口述历史实践、本土化的口述历史理论、口述历史的规范与方法、口述历史的学科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报告。学者们提交的论文主题广泛，涉及体育口述史、音乐口述史、旅游口述史、建筑口述史、军事口述史、科技口述史、教育口述史、妇女口述史、四史口述等丰富多彩的内容，展示了新时代中国口述历史的最新动向。

为推动中国口述历史的规范化开展，本次会议还发布了由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口述历史专业委员会制定的《中华口述历史工作实务规范》(试用版)，包括口述历史工作规范、口述历史学术规范、口述访谈者工作守则及口述访谈者工作纪律四部分，并附有口述历史访谈协议书、口述历史工作人员保密协议、口述历史资源采集、收藏与使用协议、口述历史访谈者伦理声明、口述历史口述者伦理声明、口述历史作品授权书、口述历史访谈摄录技术标准等7个文件，可供国内各行各业的口述历史工作者参考使用。（历史理论研究所微信公众号）

第三届复旦大学西方史学史论坛

5月13日，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西方史学史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三届“复旦大学西方史学史论坛”在复旦大学举行，会议主题为“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史家、方法与理论”。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四川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贵州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淮北师范大学、苏州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复旦

大学、《史学月刊》编辑部、《江海学刊》编辑部等单位共计四十余位专家学者与会。（澎湃新闻）

山东大学第三届“历下论学”博士生论坛

5月14日，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第三届“历下论学”博士论坛在知新楼A1916会议室成功举办。论坛主题是“中国历史学本土化思潮的回顾与展望”。来自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和山东大学的12位博士、硕士研究生参与了本次论坛。中国史学研究所所长陈峰教授到会致辞，并与郭震旦教授共同作为评议人进行指导。与会青年学子分别就龚自珍的史学折变与经学路向、清末民初知识学人对“亚洲”的关注与认知、梁启超的中国通史撰述、吴晗与第三版《朱元璋》的撰写、中国现代史学的酝酿等问题各抒己见，展开讨论，对于拓宽学术视野，促进学术交流，启迪研究智慧，起到了积极而有效的作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儒果儿”微信公众号）

第十届中国公众史学研讨会青年论坛

6月15日下午，第十届中国公众史学研讨会（青年论坛）在宁波大学召开。与会成员围绕“现代传媒技术与公众史学”主题进行相关探讨交流。会议由宁波大学教授钱茂伟主持。本次会议分为两组，分别进行汇报，由主持人钱茂伟各自点评并在会后总结。从选题来看，涉及了公众五史的方方面面，个人史、家族史、单位史、社区史、专题史；从方式上说，涉及了口述史与影像史。参会人员采取报告人依次汇报，其余人提问探讨的方式进行。汇报人从选题背景、论文框架、研究过程、结论与意义等方面进行讲述，各评论人针对汇报内容从论文的格式、内容、资料收集与整理过程以及研究方法等角度提出问题与建议。汇报结束，主持人钱茂伟就文章框架结构、问题意识、观点阐释、解决途径、研究启迪等方面做了会议总结。（公众史学微信公众号）

“吕振羽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研讨会

6月22日-24日，“吕振羽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研讨会在邵阳市召开，

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共中央党校、清华大学、吉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 30 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一大批著名专家、知名学者出席，共收到论文 60 多篇。本次学术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共邵阳市委宣传部、邵阳学院联合主办，旨在深入探讨吕振羽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贡献，弘扬吕振羽史学研究的科学精神及爱国主义的优良品质。

研讨会上，华东师范大学胡逢祥教授、湖南师范大学朱发建教授、长沙学院戴开柱教授、淮北师范大学李勇教授、清华大学舒文副教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王波助理研究员、中央党校周励恒讲师、吉林大学王丽华研究馆员、湖南省教育厅原副巡视员邓江祁教授、湖南工业大学原纪委书记陈邵桂教授、湘潭大学吴克明教授、西北大学兰梁斌副教授、邵阳学院彭忠信教授等专家学者先后做主题发言，回顾吕振羽先生的生平、阐释吕振羽先生的思想、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卓越贡献。（《湖南日报》2023 年 6 月 24 日）

第十届中国公众史学研讨会

7 月 1 日，宁波大学公众历史研究会主办，天下史馆(西安)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承办的第十届中国公众史学研讨会在西安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 20 多位学者参与了研讨会。

会议分为四个环节，三场主题报告会，一场圆桌会议。时间十分紧凑，几乎没有时间休息。在古色古香的会议室内，在“天下史馆：天下人的数字史馆”符号化讲坛上，专家学者纷纷汇报自己的最新思考，预示公众史学的最新发展趋势。专家们精彩汇报，精准点评，一样不少。在圆桌会议阶段，专家们就会议所列举的主题，就听会一天所想到了问题，继续畅所欲言。最后达成几点共识：下一步要成立高校口述史联盟，举办口述史大赛，成为学会的“一赛”。同时拟共同推进万名“数字史官”培训工作，制订职业培训计划与职业认证标准，争取早日让口述历史成为一个文化生产新职业。（公众史学微信公众号）

2023 国际数字人文大会

7 月 10 日-14 日，2023 国际数字人文大会（ADHO Digital Humanities Conference 2023, DH 2023）在奥地利格拉茨市举行。本次大会由全球数字人文组织联盟主办，格拉茨大学承办，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研究者参加。国

际数字人文大会是国际数字人文社区最为盛大的活动，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交流机会，以促进未来的合作。2023年会议主题为“合作即机遇”，特别关注东南欧数字人文社区，将对“邻国间的相互赋权与合作如何将区域专业中心转变为国际性研究网络”这一话题作进一步探讨。

“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文献研究”工作坊

8月16-17日，“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文献研究”工作坊在湖南长沙顺利召开，本次学术会议由湖南师范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联合主办，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办。会议开幕式由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朱发建教授主持。

“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文献的调查、整理和研究(1900-1949)”是2018年度获准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华东师范大学胡逢祥教授为该项目首席专家，我校朱发建教授是该项目的子课题负责人之一。本次研讨会包含大会主题报告、小组论文交流、圆桌会议研讨等环节，围绕“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文献书目整理与研究工作进展”“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文献与史学史研究进展及趋向”两大主题，进行较深入的交流探讨。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本次会议主题鲜明、针对性强，有利于促进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淮北师范大学、厦门理工学院、浙江工商大学等校的十余位专家学者在会上发言。我校历史文化学院多位教师参加会议进行了论文交流。（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网站）

第三届新时代史学理论论坛

8月30—31日，由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共同主办，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共同承办的第三届新时代史学理论论坛在吉林长春召开。论坛主题是唯物史观视域下的中国历史理论构建，旨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推进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来自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辽宁社会科学院、吉林省社

会科学院、广西社会科学院等机构，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武汉大学和国防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等高校的 70 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围绕新时代史学理论建设、完善、发展相关问题开展研讨交流。

本届论坛分设新时代的中国史学、中外重要历史理论问题、“四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中外史学史研究四组分论坛。其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基本概念、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华文明的历史底蕴与现代价值、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世界变迁格局中的中国主体性构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意义、国家治理理论的建立演进、新时代历史学传统与新兴学科的创新发展、西方历史理论对中国学术话语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及新中国的奋斗经验和历史成就、马克思主义重要史学家的学术思想、历史虚无主义解析批判等议题备受与会学者关注。（中国历史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首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视角中的历史书写研讨会

10 月 13 日，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研究阐释习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学深悟透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文明研究交流互鉴、探索新时代历史书写思想和实践的新进展、促进历史理论研究的新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中外文明比较研究室举办了首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视角中的历史书写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中国边疆研究所、首都师范大学等科研机构的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届会议。（历史理论研究所微信公众号）

第二届“时代与史学——中国与世界的对话”学术研讨会

10 月 14 日，由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与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共同主办的第二届“时代与史学——中国与世界的对话”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市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教师教育中心顺利召开。本次会议历时一天，由三场专题报告组成，与会代表 30 余人。大会以“史学与世界对话、与时代对话”为中心议题，致力于打破历史学科内部壁垒，构建兼具中国特色与国际视野的历史学研究范式，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鉴于此，本文拟以此次会议的专题顺序进行综述。

本次会议以“中国与世界的对话”为出发点，探讨当今时代下的历史学如何打破学科桎梏，如何建立自身的话语体系的问题，充分反映学术性与时代性的紧密关联。从会议的具体发言来看，在研究主题与方法上都呈现出多元化与前瞻性的特点，这些研究不仅能够积极吸收国外史学研究中的前沿性成果，与之形成批判性的对话效应；而且能够立足于本土的学术传统，充分地挖掘传统学术中的有益因子。（光启国际学者中心微信公众号）

中国史学史青年沙龙第一期：“近百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历程”

10月21-22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举办第一期中国史学史青年沙龙顺利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南开大学、西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苏州大学、云南大学等高校及《天津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报》等报刊、学术期刊的30多位青年学者参加了此次沙龙，这也是中国史学史学界首次举办此类学术活动。

本期沙龙的主题是“近百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旨在反思中国史学史近百年的发展路径，面对新挑战，展望新方向，推动新时代的历史研究。活动分为上午场与下午场，上午场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尤学工教授主持。他介绍了此次活动的发起意图和筹备情况，并对各位学者的到来表示了欢迎与感谢。随后，与会学者们围绕“近百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方法与取向”以及“史学史与跨学科、跨文化研究”两个议题展开热烈讨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谢贵安教授对学者们的发言进行了评议。下午场由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刘开军教授主持，中心议题为“国际视野下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以及“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展望”。个人发言之后，学者们以圆桌会议的形式进行了思想交锋，频发妙论，高见迭出，碰撞出了炽热的思想火花。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李传印教授对下午场的学者们发言、讨论进行了评议。（《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12月7日）

第四届全球文明史研讨会

10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中外文明比较研究室举办第四届全球文明史研讨会，主题为“20世纪以来的文明形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

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所、政治学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当代中国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和厦门大学等科研机构的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届研讨会。

本届会议是一场真正跨学科、多学科的学术盛宴。建立在世界史、中国史、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综合视角上，涵盖了史学理论、区域研究、专题研究等众多领域的这种文明研究新视野，对中外文明比较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具有积极的助益。（历史理论研究所微信公众号）

侯外庐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学派的构建：侯外庐诞辰 120 周年学术研讨会

10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承办的侯外庐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学派的构建——侯外庐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高翔主持会议并讲话。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肖永明教授、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谢阳举教授进行致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湖南大学、西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等30余所高校与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共提交论文60余篇，围绕侯外庐先生的学术思想、侯外庐学派的传承发展和思想史议题，做了精彩发言。本次研讨会不仅回顾了侯外庐先生的生平细节，还梳理了他将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的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围绕着外老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家的学术影响，以及传承侯外庐学派，拓展了许多新的学术议题。（古代史研究所微信公众号）

“理论与史学论坛 2023”学术研讨会

10月27-29日，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室主办的“理论与史学论坛 2023”学术研讨会在厦门举行。来自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淮北师范大学、河南师范大学、兰州大学、郑州大学、河北大学等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近30位学者参会。与会学者围绕研讨会主题“思想·实践·理论——新时代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就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国古代历史

理论、中国史学史跨学科研究趋势、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多层面研究、通史编纂的理论与方法、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认识、西方史学史研究的新趋向、中国传统史学与国家观、史学发展与中华文明形态的构建、史学功用与国家治理等内容展开热烈讨论。大会总结及闭幕式由郑州大学吴漫教授对本次研讨会作出总结。（历史理论研究所微信公众号）

第三届“新时代历史思潮研究”学术研讨会

10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历史思潮研究室主办的第三届“新时代历史思潮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于沛研究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乔治忠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汪高鑫教授、湖州师范学院湖州发展研究院李学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姜萌教授、宁波大学历史系钱茂伟教授作主旨发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西北大学等多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2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发表精彩报告并就相关问题进行热烈讨论，共同为新时代历史思潮研究、历史思潮学科建设等议题建言献策。在圆桌会议主题讨论环节，乔治忠教授、张秋升教授、李学功教授等12位专家学者围绕“新时代历史研究中国本土化思潮”命题展开讨论。（历史理论研究所微信公众号）

山东大学第四届“历下论学”博士生论坛

10月28日，山东大学第四届“历下论学”博士生论坛在知新楼A1618会议室成功举办，论坛主题为“史学、经学与思想：中国古典学术的继承与开拓”。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中国农业博物馆和山东大学的15位博、硕士生及青年学者与会。与会学者围绕禹益启传说的多元地域异辞、“秦亡汉兴”的天命观与《秦始皇本纪》的书写、《书集传》的形成与南宋《尚书》学的演进、江永的《春秋学》特点、早期经学文献的附注形态、《史记集解》的传播与讹窜、国家图书馆藏内府本《钦定续文献通考》的纂修细节与版本沿革、传统史书论赞的文体争议及其称谓变迁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在夯实专业基础和学术规范的同时，也进一步明确了未来

研究的规划与方向。（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儒果儿”微信公众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年度工作会议：“西方历史理论：观点与流派”

11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在北京召开年度工作会议，会议主题为“西方历史理论：观点与流派”，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西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多家高校和科研单位的2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本次会议。学者们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研讨，并就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关系、西方历史理论对构建中国历史理论的启示、如何推动历史理论研究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历史理论研究所微信公众号）

“中韩史学与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

11月4日，南开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中韩史学与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在天津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全国三十余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五十余位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与会学者从多视角、深层次地探讨了中韩史学交流、中国史学史等领域的诸多问题，在时间上涵盖了从魏晋南北朝到现当代的长时段，空间上涵盖了中国、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东亚世界的广阔区域，展现出宏阔的学术视野。（南开史学微信公众号）

首届全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青年论坛

11月10-1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青年工作组、《史学理论》编辑部与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共同主办的“首届全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青年论坛”在南京召开。论坛以“传承与发展：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建设百年反思”为主题，邀请国内30余家高校和科研院所近60位青年学者及《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求索》《求是学刊》等期刊杂志编辑参会。

本届论坛得到青年学者积极响应,在保证论文质量的同时兼顾了参会学者地域的代表性,参与本届论坛的青年学者,包括了全国各地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并不限于国内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主要单位,体现了论坛团结全国青年学者,着力推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繁荣发展的宗旨。

本届论坛分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组、中国近现代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组、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组。会议讨论突出问题意识,在综合运用新的方法和视角基础上展开对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展现了青年学者锐意进取、不畏旧说的学术创新精神。与会学者深入探讨了传统史学的现代转型问题,有对近代以来的新史学发展的思考,还有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讨论,涉及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史学事件、史学人物等诸多层面。对古典史学、西方近现代史学、亚非拉地区史学、历史理论、历史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当代史学前沿等问题展开了深入且充分的交流。(历史理论研究所微信公众号)

中国史学理论的守正与开新全国学术研讨会暨张振珮先生《史通笺注》再版发行座谈会

11月11日,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中国文化书院、贵州大学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西南民族文化走廊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史学理论的守正与开新全国学术研讨会暨张振珮先生《史通笺注》再版发行座谈会举行。座谈会。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华书局、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四川大学、上海大学、河南师范大学、吉首大学、贵州省文史馆、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民族研究院、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贵州财经大学、贵州民族大学等省内外三十余所高校、科研机构、出版社的一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并进行学术交流研讨。与会学者就张振珮先生《史通笺注》的史学理论成就、《史通》研究和贵州地方文书的价值和意义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讨交流。(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微信公众号)

纪念范文澜先生诞辰 130 周年学术座谈会

在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诞辰 130 周年之际,11月15日上午,“纪念范文澜先生诞辰 130 周年学术座谈会”在中国历史研究院阳明厅举行。中

国史学会原会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金冲及，中国史学会会长、求是杂志社原社长李捷，中国史学会原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鹏，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耿云志，以及来自近代史研究所、历史理论研究所、首都师范大学等学术机构的 40 余位专家学者出席纪念活动。开幕式由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夏春涛研究员主持，金冲及、李捷先后致辞。近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金民卿研究员致闭幕辞。他指出本次座谈会是缅怀的会议、追忆的会议、学习的会议、传承的会议。未来要在四个方面做好传承：一是传承范老做学问的立场，将党性与个性、真理精神与党的原则有机结合；二是传承范老做学问的指导思想，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史学研究，充分运用唯物史观探究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三是传承范老的治学方法，做创造性的史学研究，不断进行自省和反思；四是传承范老的治学精神与境界，做扎实、高尚的学问，建设好、发展好历史学的中国学派。（近代史研究所微信公众号）

“‘天下’之上：‘中国-天下’建构之前结构探索”学术研讨会

11 月 18 日，历史理论研究所中华文明史研究室主办的“‘天下’之上：‘中国-天下’建构之前结构探索”学术研讨会在中国历史研究院远达厅召开。本次研讨会围绕罗新慧教授新著《周代的信仰——天、帝、祖先》所涉问题展开交流研讨，期以融通古今中外，于跨学科方向拓宽视野，从“政教”文明建构的角度探究“前轴心时代”“中国-天下”建构之逻辑前提及历史渊源等“前结构”议题，深化对中华文明史的贯通理解。研讨会由中华文明史研究室副主任刘巍研究员主持。（历史理论研究所微信公众号）

史学理论前沿工作坊：人新世时代的历史哲学

11 月 18-19 日，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主办的“人新世时代的历史哲学”史学理论前沿工作坊在中山大学中山楼 713 会议室召开。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厦门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山西师范大学的一批世界史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工作坊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顾晓伟主持。他指出，地质学家提出的“人新世”这个术语是地质时间与人类时间的一次事件性的交织，其叙事情节与启蒙运动以来的进步史观截然不同，具有鲜明的反乌托邦的

悲剧性色彩，其目的在于唤醒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微信公众号）

朱政惠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座谈会

11月18日，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中心联合召开的朱政惠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座谈会举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党委书记瞿骏教授、上海辞书出版社副总编张敏、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曹景文教授、朱政惠先生夫人林雪仙依次发言。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广西师范大学等各地院校及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座谈会。与会学者围绕“朱政惠先生的学术人生”、“朱政惠先生的教书育人”等主题展开了动人的怀思与讨论。

北京师范大学第三届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生学术论坛

11月18日至19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主办的北京师范大学第三届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生学术论坛在北京成功举办。本次论坛由开幕式、主题演讲、分组汇报、闭幕式四个部分组成，特别邀请到国内部分高校科研单位及期刊编辑部共九十余位专家、学生与会。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刘家河、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涛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董欣洁研究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朱洪斌副教授依次做主题演讲。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多家高校的60位研究生参加了此次论坛。同学们围绕中国古代史学、中国近现代史学、外国史学等论坛议题做了精彩的汇报，并听取评议人与点评老师的建议。（史学史学步微信公众号）

理论与现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讨会

11月23-24日，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省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理论与现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讨会在杭州举行。研讨会开幕式由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任虎主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邬国义教授、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袁成毅教授、淮北师范大

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李勇教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陈峰教授陆续做主题报告。来自杭州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江苏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各地高校科研机构及期刊杂志的专家学者和研究生相聚一堂，围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交流、“社会史论战”与“五朵金花”、中共革命史与中共党史书写、浙江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史学发展等主题展开了热烈的研讨和广泛的交流。研讨会闭幕式环节由主办方致感谢辞。

首届海外中国历史研究前沿论坛

11月25日，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的最新贺信精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海外中国学研究室与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济南联合主办了首届海外中国历史研究前沿论坛，来自国内高校、科研院所的3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25日上午的论坛主题报告由山东大学杨华教授主持，山东师范大学郭大松教授、山东大学郭震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吴原元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徐志民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薛轶群副研究员、山东师范大学刘本森教授，分别作了《借双眼睛看历史：外文资料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为方法的柯文：在学术前沿地带刷新中国史》《海外汉学研究史：一个亟待关注的学术话题》《中共海外支部研究刍议》《新世纪以来日本学界的晚清史研究述评》《欧美学界的中国抗战史研究》的精彩报告，从不同方面展示了对海外中国历史研究的思考。25日下午的小组报告分四场举行，从此次会议的70多篇来稿中精选出的23篇论文进行了报告。来自不同学科的与会学者，围绕海外中共党史研究，日本、欧美、拉美学界的中国历史研究，海外汉学与历史研究，海外中国历史研究的资料收藏与利用，海外亲历者对中国历史的观察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对海外中国历史研究在视角、观点、理论方法及史料运用方面的优点及不足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历史理论研究所微信公众号）

“历史时代与史学变革：20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学术研讨会

11月25日至26日，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与上海市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基地“人类历史重大理论问题话语体系建设”联合主办，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协办的“历史时代与史学变革：20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徐汇校区西部会议中心成功召开。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相聚一堂，围绕20世纪社会历史变革中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20世纪以来中外史学学术体系的发展与话语体系的构建、20世纪历史进程中的历史理论定向与史学理论转向、当代史学研究的新理论、新方法和新视野等主题展开热烈研讨、评议和交流。（《社会科学报》2023年11月29日）

历史理论研究所第五届青年学术研讨会

11月28日—30日，第五届历史理论研究所青年学术研讨会暨青年工作座谈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校密云校区成功举办，全所4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本次研讨会收到论文27篇，分为两个分会场进行研讨。第一分会场有14位发言人，分为三场，第一场的王祁、胡楚清、孟尧、张德明、廖云鹏探讨了不同文化视野下的中华文明同一性理论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第二场发言人赵鉴鸿、程源源、常文相、苑苑、庄亚琼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优秀的史学文化中的重点概念加以辨析；第三场发言中冯立和陈甜围绕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张建斌与卢晓娜基于自身专业所长的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些理论性见解。第二分会场有13位发言人，第一场的张连勇、宋儒、曲冠青、张舰戈、崔瑾的发言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阐释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探讨中国之治，尝试回答中国之间，时代之间和世界之间。第二场的孙广辉、庄新、黄畅、自中书的发言以文明交流互鉴为根本出发点，分别从文化交融中的制度创新辐射至17世纪起英国科学界的中国知识采集机制，拓展至海外的中医史研究，以及非洲国家的中国学研究。第三场的谭星、董家宁、张一博、王慧颖的发言以中国式现代化早期探索为主题，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为重点，以中国通史历史主义新史学的构建为主要内容，探讨中国话语的构建。点评嘉宾吴英、徐志民认为，第二分会场发言充分体现了思想之火花碰撞，感受到了年轻人刻苦钻研的精气神。学术研讨会上，报告者精彩的发言，点评者客观精准的点评，充分体现了我所青年学者学术转型之坚定、坚决

和坚韧，以实际行动积极响应了所领导关于科研转型的要求。（历史理论研究所微信公众号）

“历史写作的经验与技艺”工作坊

12月9日，由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史学理论研究所主办的“历史写作的经验与技艺”工作坊，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新三楼会议室如期举行。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十余位专家会聚一堂，围绕史学理论与史学书写的关系、史学思想与史学史研究的互动、全球史的书写范式、21世纪史学发展的前沿动态等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邓京力教授的演讲主题为《反思史学与实验史学》，其结合自身近年来的观察介绍了自己对于当今史学研究中一些前沿性问题的理解。（东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微信公众号）

2023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12月15-17日，“2023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主办。因天气和交通原因，会议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召开方式。来自世界各地五十余所高校、科研机构 and 学术杂志的110余位学者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会议。大会共收到论文90余篇。

大会共设“中国古代史学”“中国近现代史学”“外国史学”和“国际学者圆桌论坛”四个分会场，与会学者分别围绕中国古代史学与其他学术门类的关系，中国古代史学的研究对象及其特点，中国古代史学研究的新视野，多民族史学及中国古代史学之海外影响，中国近现代重要史家、史著、史学观点、史学思潮与流派，史书编纂、史学概念、史学方法与史料运用等近现代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基本问题，中西史学比较，中国的外国史学科建设，西方古典、中世纪及现代史学，西方重要史学理论命题等重要学术问题纷纷展开讨论，阶段性推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和积极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官网）

“中国古代佛教与史学”学术沙龙

12月16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古代后期史教研室与南开大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古代佛教与史学”学术沙龙举行。南开大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孙卫国教授致欢迎辞。西藏社科院贝叶经研究所副所长欧珠次仁研究员、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李子捷副教授主讲，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何孝荣教授、马晓林教授为与谈人，孙卫国教授、秦丽副教授等数十多名师生参加了本次学术沙龙。本次沙龙就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佛教与史学关系的深入探索等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沙龙最后，主持人朱洪斌老师再次对欧珠次仁、李子捷两位老师的精彩讲座表示感谢。（学忍堂史学微信公众号）

“历史虚无主义解析与批判”国际学术研讨会

12月21-2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主办，历史理论研究所中国通史研究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解析和批判”课题组承办的“历史虚无主义解析与批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本次会议是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发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号召的背景下召开的，会议在宏观视角下，从历史、文化等多个维度就历史虚无主义相关问题开展研讨，激浊扬清，正本清源，坚定发出新时代中国史学的正声。来自中国、日本、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苏丹、阿根廷、英国、俄罗斯、美国、索马里等国家和地区的80余位学者、国际友人应邀与会，并提交论文。

四个分论坛会场分别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由来、本质及新趋势新样态”“历史不容歪曲——中国近代史领域历史虚无主义辨析”“历史不容歪曲——党史国史领域历史虚无主义辨析”“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主题，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几十位专家学者围绕分论坛主题充分阐述观点，展开学术讨论。评议人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和前沿学术观点进行点评，并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历史理论研究所微信公众号）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组织之基与史学之魂”学术研讨会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推进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加强中共组织史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贡献史学力

量，12月23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组织之基与史学之魂”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召开。本次会议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与国际传播”基地、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历史学系、马克思主义学院和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联合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等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出版单位的近三十位学者共襄盛会。（华东师大历史系微信公众号）

四、史学理论与史学史重要讲座

(一) 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讲座

举办时间	题目	主讲人(单位)	主办单位
3月16日	从传记进入历史	曲柄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重庆大学
3月24日	方志编修与中国的史学传统	周勇进(中国地方志 指导小组办公室)	南开大学
4月11日	国外中国学发展趋势思考	梁怡(北京联合大学 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 首席专家)	深圳大学 外国语学院
4月14日	从“荣经陋史”到“六经皆史”： 宋明经史关系说的演化及意义之 探讨兼及语境与意义迁变的问题	向燕南(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吉林大学
4月14日	大众最迫切需要的知识：李平心 《中国近代史》再探	王应宪(华东师范大 学)	华东师 范大学
4月15日	跨学科研究与中国史学的现代转 型——以20世纪上半叶历史学与 社会学的跨学科研究为例	胡逢祥(华东师范大 学)	山东大 学儒学 高等研 究院
4月21日	当历史遇到理论——“汉民族形成 问题争论”的启示	张越(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杭州师 范大学
5月6日	中华传统文化的“传”和“承”	葛剑雄(复旦大学)	山东大 学儒学 高等研 究院
5月7日	传说的历史还是实证的历史—— 顾颉刚先生疑古学说的形成、遭遇 与价值	张越(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国家图 书馆
5月8日	世纪的诞生——二十世纪中国的 历史位置	汪晖(清华大学)	山东大 学儒学 高等研 究院
5月10日	先秦两汉的口头和书写现象及其 知识史意义	曲柄睿(北京师范大 学历史学院)	华中师 范大学
5月11日	《三国志·魏书》的史评与列传编 撰	曲柄睿(北京师范大 学历史学院)	武汉大 学历史 学院
5月12日	佣书成学：中古知识的结集、生产 与传播	曲柄睿(北京师范大 学历史学院)	浙江大 学

5月12日	史学史研究经验谈	王汎森（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华东师范大学
5月14日	“人人参与”与“人人入史”：公众历史的意义与方法	钱茂伟（宁波大学）	天津市委宣传部
5月16日	北美现当代中国研究与史料概述	吴一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研究系）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5月18日	书物的实践与表征——作为新文化史的书籍史和阅读史	韦胤宗（武汉大学文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
5月19日	承秦·过秦·摒秦——汉人秦论的三个维度	汪高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河南大学
5月20日	当代史学史研究的史料与视野	赵庆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南开大学
5月22日	中西史学之异同	汪荣祖（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6月6日	中古佛教史传的文体源流	陈志远（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南开大学
6月8日	四部学视野下的中国古代史学	汪高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6月8日	守正、传承和创新——编辑规范与史学期刊建设之思考	王旭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6月15日	近代海外汉学研究发展历程	方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德鲁斯校区历史系教授）	北京交通大学
6月19日	家谱编修标准解读及答疑	钱茂伟（宁波大学）	浙江舟山市图书馆
6月25日	史学论文的选题与写作——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王传（华东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6月29日	陈垣先生的史学及其成就	周少川（北京师范大学）	淮北师范大学
7月12日	中国史学叙事的风格和话语	朱露川（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9月14日	中国史学现代转型中的‘古今中西’之争	胡逢祥（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9月27日	美国中国学的主要研究取向之反思	侯且岸（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
10月12日	中国传统史学的特点和价值	谢贵安（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
10月15日	陈史与《陈书》修订	景蜀慧（中山大学）	南开大学
10月25日	从“文化传播”到“文化触变”——以关公崇拜之东传朝鲜为中心	孙卫国（南开大学）	北京大学
10月27日	儒家思想的社会科学化与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王学典（山东大学）	山东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院
10月29日	从梁启超到白寿彝——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历程	周文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
11月3日	中华文明三大认知体系的建构、发展及其启示	郑杰文（山东大学）	山东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院
11月3日	重思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兼论近代中国学术的日本渊源	潘光哲（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南开大学
11月17日	史学史研究的增长点	李红岩（中国社会科学院）、张越（北京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11月26日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历史反思与再出发	陈峰（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杭州师范大学
11月28日	史学的起点与逻辑	马俊亚（南京大学）	安徽大学
11月29日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南北谱系（1919—1937）	张雷（香港岭南大学）	山东大学研究生院
12月1日	历史研究的动机、问题意识和选题策略	李勇（淮北师范大学）	江西师范大学
12月9日	知识转型与中国现代新学科的建立——以逻辑学为中心的考察	左玉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12月22日	龚自珍学术思想新探：诸子与经史佛学之融摄	杨济襄（台湾省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12月22日	追寻中国史学的“元叙述”：一个比较文化的视角	王晴佳（美国罗文大学）	首都师范大学
12月26日	谈谈中国传统史学中的“褒善贬恶”观念	王记录（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师范大学

(二) 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讲座

举办时间	题目	主讲人(单位)	主办单位
3月16日	历史书写应否含有道德评判? ——近现代史学观念比较	王晴佳(美国罗文大学历史学系)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4月19日	亚里士多德的“ousia”与韩非的“理”	蒋重跃(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4月21日	唯物史观研究的守正创新	吴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江西师范大学
4月25日	西方学术话语中的历史精神	于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5月8日	对话与交流:历史大变局中的史学新形态与实验史学	于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邓京力(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
5月9日	历史大变局中的史学新形态	于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5月11日	中西比较视野下的“李约瑟难题”	张绪山(清华大学历史系)	首都师范大学
5月22日	史学写作的问题意识、理论应用及史料使用	李剑鸣(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5月25日	微观史和全球史:来自不同领域的协同作用	夏德明(德国哥廷根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5月26日	从地方史到国家史:美国史学的起源、发展与变迁	徐良(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东北师范大学
6月2日	克服汪达尔主义:法国革命的遗产话语与实践	黄艳红(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	四川大学
6月6日	反思历史与实验史学	邓京力(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中山大学

6月9日	全球史书写多元实践与中国视角的全球史	刘文明（首都师范大学）	首都师范大学
6月15日	图像与欧洲中世纪图像学	张惠明（中国国家画院）	华中师范大学
6月15日	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历史学的生存论转向	王利红（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东北师范大学
6月15日	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的档案史料及其使用方法	路平（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	上海师范大学
6月15日	全球视野下的中东史研究——以马穆鲁克王朝研究的理论、方法为讨论中心	王新刚（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上海师范大学
6月20日	过去的异化与现代历史意识的产生	张旭鹏（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9月24日	布罗代尔与白乐日：在世界史中研究中国史	莫里斯·埃玛尔（Maurice Aymard）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10月18日	19世纪德国地区史书写的功能转向	邢来顺（华中师范大学）	首都师范大学
10月20日	西方汉学对口传文化与书写文化的辩论：以《诗经》为例	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美国芝加哥大学）	山东大学研究生院
10月27日	二战后东欧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比较经济社会史流派及其成就	宁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10月30日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需要解决的三个问题	吴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
11月1日	中外古代史家笔下的丝绸之路	杨巨平（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11月1日	当代历史研究的长时段转型——文明史研究范式及重点领域	何平（四川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11月2日	中日史学现代化之异同	王晴佳（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	东北师范大学

11月4日	朝鲜近代启蒙史学与史家金泽荣	曹中屏（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
11月4日	精读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之建议	乔治忠（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
11月8日	历史学的民主化：后现代之后的历史研究	俞金尧（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上海师范大学
11月13日	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形成	吕洲翔（爱尔兰国立梅努斯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11月15日	生成式人工智能、低代码数字史学和美国史学	万澍（美国布法罗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11月17日	历史化：德国近代史学的一个特质与它的问题	胡昌智（东海大学历史学系）	华东师范大学
11月20日	希罗多德的“探究”是何以成为“历史”的	吴晓群（复旦大学）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1月24日	史学主体性和史家的主体意识：基于《历史研究》70年世界史论文的思考	于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	上海师范大学
11月26日	全球知识语境中的“庶民研究”	张旭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上海师范大学
11月29日	人类文明史中的中古时代	向荣（复旦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12月7日	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	吴晓群（复旦大学）	河南大学
12月9日	精神分析与西方巫术史研究	陆启宏（复旦大学）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2月10日	多维度开展区域国别研究——以非洲史学史为例	张忠祥（上海师范大学）	西北大学
12月11日	历史理论对于历史书写的意义和局限	董立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东北师范大学
12月16日	从梵文佛典到汉文大藏经与佛教史学：对中印佛教史研究方法的一种思考	李子捷（西北大学）	南开大学

12月16日	谈“轴心时代”理论的起源与目标——一项观念史的考察	王大庆（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12月18日	陈寅恪与学衡派	王晴佳（美国罗文大学）	南京大学
12月21日	数字化、人工智能和历史学的未来	王晴佳（美国罗文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12月22日	海洋史、作物史的兴起和当代史学的全球性	王晴佳（美国罗文大学）	北京大学

五、史学理论与史学史重要项目

题名	作者	单位	项目类别
泛非主义与非洲一体化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	张忠祥	上海师范大学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东学西渐”与11至13世纪欧亚北非大陆的知识流转研究	徐善伟	上海师范大学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百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建构研究	张越	北京师范大学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通史	吴汉全	杭州师范大学	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
中东史学通史（五卷本）	韩志斌	西北大学	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
新编中国史学史	乔治忠	廊坊师范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
中共党史学知识体系建构研究	耿化敏	中国人民大学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百年流变及其影响研究	徐良	江西师范大学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20世纪美国城市史学演变研究	曹升生	安徽师范大学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中国古代起居注新探	陈爽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中国古代褒贬史学的发展与演变研究	常征江	天津师范大学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从边疆域外行记看10—14世纪“天下一中国”观的变化与再形成	江湄	首都师范大学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中国古代史学话语体系下的《明	闫瑞	南昌大学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史》序与论赞研究			
清代《三国志》文献综合研究	刘国宣	南京师范大学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视阈下的民国史学评论研究	杨俊光	温州医科大学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20 世纪中国古史重建的文化人类学路向研究	赵满海	曲阜师范大学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台湾历史教育与民族认同建构研究（1945—2024）	林小芳	福建师范大学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公元 6 世纪前中西古代史学批评文献辑录与比较研究	陈安民	西南大学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法国中共党史研究的著述整理与评析	王瑶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海外“中共观”的流变与应对研究	刘佳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近代中国史家对唯物史观解释体系建构研究	李政君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学术建制与中国现代史学学科体系的建立研究	刘承军	山东师范大学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从夏鼐档案看考古学对 20 世纪中国古史重建的贡献	汤超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朝鲜《尚书》学研究（1392—1910）	朱岩	扬州大学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吉尔吉斯斯坦历史教科书中的涉华史实与叙事研究	张世才	新疆大学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以色列“新历史学家”对巴以冲突的历史书写研究	姚惠娜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伊朗萨法维时期的史学史研究	金鹏	延安大学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大一统”视阈下	武文君	吉林大学	国家社科基金青

清代辽金历史书写与研究			年项目
欧美学界中共观演变的学术史考察（1978—2022）	崔哲	山东大学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章太炎“新史学”思想体系研究	崔庆贺	河南大学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翦伯赞的通史撰述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研究	王庆婷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20世纪英国历史理论研究	李任之	清华大学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美国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史学思想研究	林漫	广西师范大学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冷战时期美国学在亚洲的传播与影响研究	石可鑫	福建师范大学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史学理论视阈下的“记忆转向”研究	刘颖洁	武汉大学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中国近代史学方法论建构与实践路径研究	陈永霞	贵州大学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
拉丁美洲的中国学研究	王晓阳	兰州交通大学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
宋代史家的前代史撰述研究	曹鹏程	四川省社会科学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清代《汉书》校读与注释研究	陆骏元	浙江大学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新地图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潘晟	南京师范大学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知识史视角下的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研究	张茜茹	华东理工大学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杰克·古迪的比较历史人类学研究	陈建	临沂大学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日本藏“前四史”古写本残卷整理研究	苏芑	南京师范大学	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项目
《史记疏证》整理与研究	陶生	渭南师范学院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

近代南洋教科书整理与研究	贾江溶	河北医科大学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近代史学转型视野下《史通》“再发现”研究	刘海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辞海》百年编修出版史研究	陈来虎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历史记忆的意识形态叙事功能研究	刘晓慧	山东大学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研究（上）	汪高鑫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研究（下）	王记录	河南师范大学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比较视野下的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研究	张昭军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20世纪中外历史书写中的“现代”话语研究	王成军	东北师范大学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六、逝世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领域学者

冯天瑜（1942-2023）

2023年1月12日，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冯天瑜逝世，享年81岁。冯天瑜，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中国史学会会长、湖北省地方志副总纂，1986年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参与构建现代学术意义的文化学及中国文化史学，沿着微观辨析与宏观把握相结合，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的理路，致力中国文化生态、中国文化特质、中外文化互动等论题探讨，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发表多篇论文，出版《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国文化史断想》、《中华文化史》（合著）诸书。从微观、中观课题入手，致力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研究，扬弃外因论的“冲击—反应”模式，考析中国文化近代转换的自身资源和内在动力，《辛亥武昌首义史》（合著）、《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合著）、《晚清经世实学》（合著）为其结集；《张之洞评传》考辨“中体西用”模式在中国文化近代转型间的思想张力及其限定性；《中华元典精神》提出“元典”概念及螺旋式上升的“文化重演律”，为学术界肯认与采用。发掘异邦史料，进行中—西—日近代史比较，《“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为其结集。开展“历史文化语义学”探讨，《新语探源》、《“封建”考论》从概念古今转换、中外对接考察文化近代转型。论著获中国图书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网站）

胡宝国（1957-2023）

2023年2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胡宝国逝世，享年66岁。胡宝国，山西定襄人，胡如雷先生之子。1982年毕业于河北师院历史系，同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1984年12月毕业留校任教。1989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主要著作有《汉唐间史学的发展》《虚实之间》《将无同：中古史研究论文集》。（澎湃新闻）

何顺果（1944-2023）

2023年3月8日，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何顺果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北京逝世，享年78岁。何顺果教授1944年7月出生于四川省忠县，1964—1969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史专业，后留系任教，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教授，2007年10月退休。何先生长期从事美国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近40载教学生涯中，开设了“欧美近代史”“美国史研究”“美国边疆史”等多门课程，受到学生广泛欢迎。著有《美国历史十五讲》《世界史：以文明演进为线索》《人类文明的历程》《美国边疆史：西部开发模式研究》《美国“棉花王国”史》《美国史通论》《美利坚文明论：美国文明与历史研究》《美国史研究》等多部著作，其中数种在北大出版社出版。何先生还曾担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会理事、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专家等，为世界史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北京大学出版社微信公众号）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 1928-2023）

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于2023年10月21日逝世，享年95岁。她是新文化史与微观史写作的里程碑式学者，专长为欧洲近代早期历史研究，新文化史与微观史写作的里程碑式学者，曾被誉为“当今在历史写作方面最具有创造力的人之一”。她也是跨学科历史学的支持者，毕生专注于将历史学与人类学、民族志和文学理论等学科相结合。

娜塔莉·戴维斯，1928年生于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后在密歇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她曾在美国布朗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但其职业生涯主要集中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生前为普林斯顿大学荣休 Henry Charles Lea 历史学教授。她是第二位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女性。她的研究重点集中在社会和文化历史，范围从中世纪末到十八世纪。她因能够利用被忽视的资源讲述以个人为中心的强有力的故事而闻名。著有《马丁·盖尔归来》《档案中的虚构》《电影中的奴隶》《边缘女人》《骗子游历记》等，曾因杰出的史学成就荣获霍尔堡国际纪念奖（2010）等奖项。（《新京报》）

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 1929-2023）

2023年11月22日，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法兰西公学院院士、埃马纽埃尔·勒

华拉杜里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逝世, 享年 94 岁。勒华拉杜里 1929 年出生于诺曼底, 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1973 年起担任法兰西学院近代文明史讲席教授。勒华拉杜里是年鉴学派第三代的代表性人物, 著有《朗格多的农民》《公元 1000 年以来的气候史》《历史学家的领地》《蒙塔尤——1294-1324 年奥西克坦尼的一个山村》《历史学家中间》, 参与编写《法国经济和社会史》等。
(澎湃新闻)

伊懋可 (Mark Elvin, 1938-2023)

2023 年 12 月 19 日, 历史学家伊懋可 (Mark Elvin) 于剑桥逝世, 享年 85 岁。伊懋可 1938 年生于英国剑桥, 1968 年从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在格拉斯哥大学、牛津大学、巴黎高师和海德堡大学任教, 在哈佛大学担任过访问研究员。1972-1989 年在牛津大学教授中国史并担任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多年, 从 1990 年起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任中国史和亚太区域史教授和召集人。他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史、文化史和环境史, 著有《象之退隐: 中国环境史》《中国历史的模式》《中国文化地图》《另类历史: 从欧洲视角看中国论文集》《华人世界变动着的历史》《帝制后期中国的城市》《积渐所止: 中国环境史论文集》等。伊懋可教授提出了“中国学之问”: 中国何以在达到“中古经济革命”之后, 未能实现欧洲式的科学变化与组织变化? 2005 年获得汉学领域的最高奖“儒莲奖”。(澎湃新闻)

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院相关职能局、中国历史研究院领导

发: 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顾问、理事

主 编: 杨婉蓉 张德明

编辑人员: 陆启宏 梁民愆 朱洪斌 王应宪 屈宁

曹小文 朱露川 张一博 程源源 敖凯

封面、封底设计: 黄畅

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秘书处

2024 年 2 月 28 日印发